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国际交往家



毛泽东说：

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

写在前面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其 60 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纵横驰骋，叱咤风云，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他不愧是 20 世纪的世界性伟人。他的业绩永载史册，他的英名万世流芳。毛泽东非常重视国际交往，他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各国具有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在宝塔耸立、延水奔腾的延安窑洞里，在巍峨雄壮、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内，在古朴典雅、清幽静谧的丰泽园中，在波涛万顷、苍松蓊郁的北戴河海滨，在竹林滴翠、烟波浩渺的西子湖畔，他会见了来自五大洲的党政要人上千名。在同这些著名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时而引经据典，语惊四座，震聋发聩；时而谈笑风生，妙语连篇，意趣横生。为了让读者了解毛泽东在同外宾交往中的博大胸怀，领略他的深邃的思想，学习他的崇高的精神品格，我们编写了《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一书。

本书收集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各国外宾交往的纪实文章 26 篇和毛泽东外事活动大事年表。在这些外宾中，有名贯世纪的世界史上的巨人，有披荆斩棘、开创基业的革命家，有在重要关头起过关键作用的政治家，有浴血疆场、战功显赫的将军，有成就卓著、誉满全球的学者、作家、有默默无闻、终老桑田的普通士兵。他们与毛泽东，有的是历经沧桑、饱尝忧患的挚友，有的是求大同、存小异的同盟者，有的是仅有一面之识。却有美好印象的一般朋友。毛泽东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和豪气；分析了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战略构想和基本原则；揭示了人民革命的发展规律，论证了人民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分析了双边关系中的利害得失，争取和团结了国际盟友。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处处闪耀着他智慧的火花，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表现了他伟大的胸襟，超人的胆识和幽默的性格。

本书篇目按洲、国家的地理位置排列，同一国家按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时间先后排列。本书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力求文笔生动。但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全，对某些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因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由刘万镇、李庆贵同志统稿，由曾宪法、罗运潮同志审定。在编辑过程中，窦恩勇等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有关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4 年 11 月 22 日

唇齿两相依 鲜血凝友情 ——毛泽东与金日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鸭绿江彼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无比激动，立即责成外务相朴宪永致电周恩来，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性胜利，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意志的，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6日，周恩来复电朴宪永，两国外交关系从此正式建立。中国和朝鲜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史，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这是毛泽东与金日成共同开创的篇章，是真挚友谊的篇章，也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共同谱写的篇章。

鲜血凝成的友谊

1950年10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中南海颐年堂紧张进行。毛泽东认真听取着每一位同志的发言，手中的烟一支接一支地续燃，表情也比平时显得庄重和严肃。室内的气氛被缕缕上升的青烟压得异常沉重。

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整顿和发展，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今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的却是一项将要震惊世界的议题——是否派兵入朝作战。

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海军、空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美国直接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命令其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领土台湾。

面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毛泽东于6月28日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时命令已在东北集结的第十三兵团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不测。毛泽东认真分析了8月份朝鲜战场的形势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行动，认为美国很可能孤注一掷，在仁川登陆，切断人民军的运输补给线和退路，使其腹背受敌。鉴于形势紧迫，毛泽东当即建议把这一考虑通知金日成，提请朝鲜方面注意。

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军第七师和海军陆战队在仁川登陆，进而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北侵犯。当时朝鲜处境十分困难，战火已烧到鸭绿江彼岸，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同年10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文章，再次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罪行，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朝鲜战争的严正立场。

此时在仁川登陆得手后的麦克阿瑟有些得意忘形，对于中国的警告更是不以为然，狂妄地声称：“我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更多的在于政治恫吓，中国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以为他们的战争“赢定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毛泽东深知将要做出的决定对于中国、朝鲜和整个世界的影响，必须认真考虑每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会议讨论得很激烈。毛泽东没有直接发表意见，说：你们说得都有

道理。但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散会后，毛泽东把刚从外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留下，两人一同走进菊香书屋。

“形势危急喽。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已越过三八线，对我们提出的‘越过三八线我们就要管’的警告，人家不理睬。”彭德怀说着，毛泽东把一封电报递给了他。这正是那封10月1日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电报。电报结尾处的几行字，引起彭德怀的特别注意：“……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给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你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看完电报，彭德怀更觉事态严重。接着，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出兵援助的考虑，并分析了美军战线长、后方远、不义之战等不利因素。请他回去好好考虑。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发言说：“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因此，出兵朝鲜是必要的。”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研究和论证，毛泽东最终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入朝作战。8日，毛泽东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毛泽东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作为志愿军中的普通一员，入朝作战。

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之时，苏联驻华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原来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事，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决定暂缓出动。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停地在室内踱步。毛泽东考虑良久，最后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斯科，亲自向斯大林通报：中国暂缓出兵。

周恩来离京去莫斯科后，毛泽东三天三夜没睡觉，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就无空中作战条件，很难白天作战。如果中国真的暂缓出兵，朝鲜难以阻止美国侵略军的进攻，情况会更加严重。他左思右想，最后毅然决定：通知周恩来转告斯大林，不管苏联方面是否出动空军，中国都要出兵。

10月18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当彭德怀来到大榆洞附近一个矮小潮湿的矿洞时，金日成出来迎接，激动地紧握住他的手。

“金日成同志，你好！毛主席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彭德怀热情地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

“你就是彭德怀呀！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了。”金日成充满深情地说，“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援。请转达我对毛泽东主席的问候，感谢他派来你这位大将军来援助我们。”

紧接着，金日成与彭德怀开始分析战场形势，认真研究作战方案。在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夺取了两个战役的胜利，给气焰嚣张的美国侵略军以狠狠的打击。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当他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两位领导人脸上都堆满了微笑。金日成的微笑充

满了他本人及全体朝鲜人民对毛泽东及全中国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而毛泽东的微笑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首战告捷后胜利的微笑。

宾主落座后，双方领导人首先研究了中朝军队统一指挥问题，决定成立中朝联合军政司令部。接着就下一步作战方针、战略、部署、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认真的切磋。会谈中，金日成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作战英勇；毛泽东则感谢英雄的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分析说：志愿军是“中国先进阶级的部队，当她明确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他边说边习惯地把手有力地向前一推，“战士们是为祖国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说完，毛泽东转向金日成：“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金日成深表赞同地回答：“对！志愿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气概。还有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正确指挥。”

“还有朝鲜人民军嘛！我们是并肩战斗。”毛泽东接着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听罢激动地表示：“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太巨大了，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听后连连摆手：“我们是战友嘛，一家人莫说两家话。倒是要感谢社鲁门，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纸老虎。”

毛泽东的幽默谈吐，引得金日成及在场的人开怀大笑。

然而，在这所有人的笑声中，唯有周恩来的笑，开心之余还夹杂着几分伤感。因为只有他心里才明白，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已经发生了。

1950年11月25日10时，几架美国F—80战斗轰炸机突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朝鲜大榆洞镇轮番轰炸，倾泻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顿时，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变成了一片火海。正在值班的毛泽东的儿子、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参谋、俄文翻译毛岸英同志在这场大火中不幸遇难。

彭德怀面对毛岸英被烧焦了的遗体老泪纵横。这是从不轻弹的将军泪啊！他忧伤得在洞里转了许久许久，才用那只颤抖的手，起草向毛泽东报告这一不幸消息的电报。他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手中的笔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拿了几十年枪的手却怎么也拿不稳那只沉重的笔，他嘴里不停地叨唠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太大意啦……怎么向主席交待呀！”

短短一封电报，他整整苦思了两个小时。最后，他重重地放下手中的笔，命令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彭德怀发来的电报首先被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总理未曾读完就已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了。他知道这对毛泽东将意味着什么。从杨开慧到毛岸英，毛泽东已失去几位亲人了，实在不该让他经受这样大的打击呀！周恩来向身边工作人员下了一道死命令：任何人不能把岸英牺牲的消息过早地报告毛主席。然后擦干眼泪若无其事地向毛泽东书房走去。

抗美援朝战争打到1951年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毛泽东、金日成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向毛主席说明朝鲜战场情况，确定新的作战方针，彭德怀于2月下旬返回了北京。一到北京，他直奔中南海，听说主席正在西山，就又马不停蹄地一路奔去。车到西山，

他刚要迈进毛泽东的别墅就被工作人员叫住了：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说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卧室。

就在这时，卧室里传来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大将前方归，理当即召见。”说着，毛泽东披衣下床。

彭德怀急匆匆地向主席汇报了朝鲜战场形势，请示了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说明了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原因。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彭德怀领了“尚方宝剑”刚要起身告辞，突然想起了毛岸英牺牲的事。

“主席，我要负荆请罪，我没有照顾好岸英，他……”

“岸英怎么了？”毛泽东听后一惊。

彭德怀此时也愣住了。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事已如此，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

“主席，岸英……他牺牲了。二次战役开始前，敌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岸英……”

“你莫要讲……莫要讲。”毛泽东向彭德怀摆了摆手。

“主席把岸英交给我，我没照顾好，对不起主席。”彭德怀还想继续检讨。

“你莫要讲嘛！”毛泽东再一次打断了彭德怀的话，静静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久，才慢慢吐出一口气：“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彭德怀沉重地离开了主席的卧室。

毛泽东久久地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那棵萧疏的垂柳，慢慢地吟起那首《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默默自语道：“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一场历时三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啊！英雄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打败了美国的侵略，保卫了朝鲜，保卫了祖国，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英雄的业绩将永远留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当美国谈判代表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毛岸英及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已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中朝两国人民为赢得这场正义战争而洒下的腔腔热血，已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胜利后的握手

1953年11月12日12时，一列火车缓缓驶出天津站，向着北京的方向疾驰而去。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微微发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的中年人凭窗而坐，方正的脸庞挂满微笑。他就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

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于11月11日上午乘专列由中国边境城市安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毛泽东主席、周恩

来总理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沿途各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曾分别率众前往车站迎送。未到北京，金日成已深深感受到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此时此刻，金日成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中朝两国一江之隔，历史上两国人民为了各自民族的命运，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特别是在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以生命和鲜血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此次访华，要把朝鲜人民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下午3时整，列车驶进北京站。欢迎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朝鲜人民的使者——金日成首相的到来。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握手致意。随后，金日成首相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登上汽车，在数千群众的欢呼声中驶出车站，驶向长安街……

11月13日。冬日的阳光柔和地照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暖融融的。毛泽东一改夜间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点上一支香烟，走到外屋的客厅中。按照周总理和外交部商定的礼宾安排，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两位领导人除谈了中朝友谊外，主要谈了在朝鲜战后坚持恢复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与金日成已非初次见面，但金日成此次正式来访在毛泽东心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份量。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沉重的打击，迫使美国谈判代表于1953年7月26日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民用生命和鲜血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包围中国的企图。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把三千里锦绣河山变成了战争的废墟，恢复和重建工作对朝鲜人民来说，既是巨大的经济任务又是政治任务，因为，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于朝鲜本身的繁荣和强大。中国人民必须一如既往支援朝鲜人民的经济建设。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必须以新的形式发扬光大。这正是毛泽东与金日成此次会见的主题。毛泽东热情称颂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认为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金日成首相对三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和交谈，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为中朝两国谈判公报和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奠定了基础。

按照毛泽东和金日成此次会谈中商定的原则，11月14至22日，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相互谅解、诚挚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工作协商，双方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中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当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字后，

整个大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互致祝贺的欢呼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两双巨手象友谊的桥梁，把中朝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谈判公报突出强调加强中朝友谊对于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伟大意义，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对朝鲜战后重建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关注。鉴于朝鲜方面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开支巨大，中国政府决定将 1950 年元月 25 日美军发动侵略战争开始到 1953 年底这一时期内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 1954 到 1957 年 4 年内，中国政府再拨款人民币 8 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中国政府还将协助朝鲜政府修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铁路交通，并供应机车、客车和货车；派工程技术人员去朝鲜有关部门协助工作；请朝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来华学习。

1958 年 11 月，金日成再次应邀来我国访问，22 日抵达北京，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代表团来访。

席间，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欢迎金日成首相访华，称赞中朝友谊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崇高友谊，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战胜的。金日成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打开了新的局面。他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金日成表示，朝中两国人民在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同一道路上永远是相互合作的兄弟，永远是共命运的战友，朝鲜人民为巩固同中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为了庆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毛泽东与金日成互相祝贺，北京市民一万人隆重集会与金日成及朝鲜代表团一道，共同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11 月 25 日，金日成一行飞抵武汉，受到了 20 万武汉市民的热烈欢迎。当天，毛主席就亲切会见了金日成一行。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金日成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地说：“欢迎太热烈了，我们实在不敢当！”

毛泽东谦逊地说：“你们是贵宾，我们欢迎你们。”略一停顿，看了看面含微笑的金日成，诚挚地说：“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相互之间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我们对你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也同你们对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

会见中毛泽东还向金日成表示：中国对朝鲜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毛泽东打着手势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到各自国内情况时说：“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欧洲不同，它一不穷，二不白。”

金日成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朝鲜已注意到毛主席在《红旗》上发表的关于一穷二白的文章：“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这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1955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关于新旧人民币和回收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从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新币 1 元等于旧币 10000 元。

两位领导人还就各自国内的经济建设情况，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气氛是那么的和谐融洽，交谈是那么的亲切友好。不知不觉间已到吃饭时间，毛泽东设宴招待了金日成一行。他们边吃边谈，兴致极高，时间仍觉不够，便宴结束时，两人相约留一些话明天再谈。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第二次会见了金日成。晚上，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朝鲜贵宾，尔后又共同观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12月16日，毛泽东同出访越南归来的金日成进行了第三次会谈。

12月8日，返回北京的金日成同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晚上金日成在灯火辉煌的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金日成首相深情地说：这次访问中国，我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进行了真挚友好的会谈，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关系问题。正如今天所签署的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所说的那样，在一切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的确，中朝两国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正如周恩来在欢送金日成离京回国时所说的：“我们的帝国主义敌人是共同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共同的。雄伟的长白山和美丽的鸭绿江又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将世代发展下去，我们两国人民国际主义的伟大诗篇将永存史册。”也如同金日成所说：“同甘苦、共患难的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在我们今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斗争中，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友谊天长地久

1961年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莫斯科。他将飞赴北京，去完成一次在中朝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使命。

60年代初的中朝关系已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巩固和发展这种用鲜血凝成的两国友谊和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亲密关系已成为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心愿，而把它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正是毛泽东与金日成等中朝领导人将要携手完成的共同工作。

上午四时，金日成乘坐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和金首相在欢迎仪式上相互致词。随后，金日成首相在刘少奇、周恩来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汽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洋溢着中朝两国的友好情谊。

当天下午，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和由他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宾主在充满兄弟情谊的气氛中进行了友好交谈。晚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欢迎来自友好邻邦的尊贵客人。

7月11日，周恩来总理、金日成首相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正式签字。它标志着中朝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金日成首相所说：“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把两国人民在为共同目标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兄弟友谊和同盟关系用文字形式固定下

来，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7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水光潋滟、花红柳绿的西子湖畔会见了到杭州访问的金日成首相及其一行。周总理、陈毅外长等参加了会见。

毛主席高兴地对金日成说：“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周总理在旁插话说。金日成见毛主席对《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如此关心，激动地说：“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毛主席点了点头，赞许地说：“这很好！”

金日成对世界局势一向十分关注，他关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

毛泽东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状况，谈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并联系中国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中国见过三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他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三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两位领导人敞开心扉，侃侃而谈，从尼赫鲁、戴高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朝鲜、越南到社会主义阵营，纵观世界风云，涉及诸多问题。

毛泽东把中朝关系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合作看成是关系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件大事。他客观、辩证的分析 and 充满乐观自信的态度，深深感染了金日成和在场的每一个人。

毛泽东转回话题对金日成说：“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害处。”金日成爽快地回答。

“我看还有好处。”毛泽东豪迈地说，“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周恩来听后急忙说：“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同志边说边笑：“我也等不到那时候了。”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说完，几位领导人开怀大笑。这笑声它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藐视，充满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

金日成首相这次访华时间虽然短暂，但成果却很丰厚，特别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对捍卫朝鲜人民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对于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对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归国途中特致电毛泽东主席说：他这次访华使“以友好和同盟的坚实的纽带连接起来的朝中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毛主席就派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参加了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带去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对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用血肉结成的不可分割的战斗友谊，对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学习，亲密合作的兄弟情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誉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象金刚山一样与天地长存，象鸭绿江一样源远流长。

1962年4月，彭真同志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朝鲜，再次向金日成转达了毛主席的诚挚问候。彭真一行受到金日成首相和朝鲜人民的热情

接待。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说：中国贵宾的来访，“如同亲兄弟重逢一样高兴。”

1962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应邀来华访问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翌年6月和9月，中朝两国又实现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互访。两国缔约后频繁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协调了两党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中朝友谊正象彭真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所说：“这种友谊的生命，将同地球的生命一样永久；这种友谊的光辉，将同日月的光辉一样灿烂。”

相知自有真情在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的考验，经历了两国缔约后更加迅速和深入的发展，两国人民在毛泽东和金日成共同开创的友谊之路上携手并肩，阔步向前。然而，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中朝两国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但金日成首相仍坚信：只要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在，中朝关系一定会重新好起来。中国依然是朝鲜的大后方，中国安定了，朝鲜也会安定；中国不安定，朝鲜也会受影响。他衷心希望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能很快好起来，这对朝鲜人民和中朝关系有利。

1967年4月，金日成主动提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倡议，并派当时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崔庸健访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朝鲜方面的倡议表示积极的支持和响应。1967年5月，崔庸健带着金日成的重托，带着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北京，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党、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积极友好的会谈。崔庸健的北京之行，为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96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在即。北京的大街小巷，已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周恩来忙完国庆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又随手拿起了办公桌上各国来华代表团名单，心中不免有些沉重：这样多的外国朋友来华参加国庆20周年庆典，而近在身边的邻邦朝鲜更应邀请前来。他把想法报告了毛泽东，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时间已是下午3时，高国庆子夜只差短短的8小时了。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与朝鲜方面联系，正式邀请朝鲜派人来华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说明，如果因为中国邀请得晚，朝方来不及派人来华，朝鲜驻华临时代办参加，我们也表示欢迎。

金日成得知中国邀请朝鲜派人参加国庆活动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朝鲜将以崔庸健为首，组成代表团赴华。9月30日晚11时，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未能参加中国国务院举行的国庆宴会。

10月1日，崔庸健和毛泽东及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了北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会见了崔庸健副主席。毛泽东充满真情地说：“我们应该搞好关系嘛！上次你来（指1967年）谈的情况我都看了，你们的方针对，金日成的方针对，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崔庸健相机建议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华，毛泽东听后非常赞同：“我真

诚地欢迎金日成来，或者可以派周恩来总理去朝鲜。公开访问，内部访问都可以，然后再请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崔庸健返回朝鲜后，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和邀请。金日成非常高兴，连声说：“毛主席最了解朝鲜的情况。”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一层乌云，迎来了中朝关系阳光明媚的春天。1970年4月，毛泽东派周恩来总理正式访问朝鲜，受到了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金日成主席的盛情招待。两国关系又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5年4月18日，金日成主席再次应邀来到中国。毛泽东把金日成此次访华当作中朝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人民满怀友好情谊，再次以极其隆重的方式欢迎这位来自兄弟邻邦的伟大使者。

当友谊的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亲切问候，并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

北京春正浓，红旗舞东风。金日成在邓小平的陪同下乘坐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金日成抵京不久，82岁高龄的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金日成走进毛泽东的书房，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主席好啊！”

“欢迎你！”毛主席也紧紧握住金日成的手。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金日成动情地说。

“很欢迎！”毛泽东诚挚地说。

金日成把陪同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团员们同毛泽东亲切握手。宾主落坐后，毛泽东说：“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答道：“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毛泽东用英语说：“Welcome（欢迎）！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两位领导人就国际形势进行了友好交谈。毛泽东介绍说，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交谈中，毛泽东转过话题，风趣地指着自己身体的每一部位说：自己说话不好，眼睛不好，腿不好。但，我能想，能睡觉，这两个好。就可以了。

金日成听后说：“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说完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早。”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啊：你叫我不去啊？”毛泽东幽默地说道。

“我不希望你去。”金日成发自内心认真地回答。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忙解释说：“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他想借此让毛泽东得到几分宽慰。

毛泽东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几年，现在又

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我们也欢迎他。”

这时，工作人员走进书房报告毛主席，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还有几位团员还没同毛主席握手，请示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来！”

金日成忙转身对吴振宇交待了几句，关切地对主席说：“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说着就要起身告辞。“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我们吃饭用筷子。”

这时，又有三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他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说完，毛泽东起身要送客人，金日成担心毛泽东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

毛泽东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外宾走出了书房。

此次会见，毛泽东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金日成讲，但自己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也许他要等待机会，下次再同金日成谈。然而，又有谁能料到，这次会见竟是毛泽东与金日成的最后会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旅途。

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传到平壤，金日成失去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友而无比悲痛，朝鲜人民和兄弟的中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迅速作出了《关于毛主席逝世的联合决定》，称赞毛泽东“是为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而献出全部精力、任何时候都诚心诚意地支援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金日成在致中共中央的唁电中说：“毛泽东一向把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诚心诚意地支援我们，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他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

长自山青松耸立，鸭绿江江水滔滔，毛泽东与金日成共同开创的中朝友谊，象松柏一样长青，象江水一样奔流。

（文勇）

战地黄花分外香

——毛泽东与浅沼稻次郎

浅沼被刺杀，震惊了日本列岛，社会党举行党葬，各界集会和游行，抗议杀害浅沼委员长。

彤云密布，秋风萧瑟，蒙蒙细雨从低沉的乌云里撒落下来，微微叹息，瑟瑟颤动，簌簌地发出哀怨的低吟。整个东京，都被这如愁的秋雨笼罩着。

1960年10月20日，日本社会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公会堂，全党举行哀悼故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葬礼。祭坛正面悬挂着浅沼先生的大幅遗像，“浅沼委员长不死”的几个方块大字摆放在祭坛正前方。哀乐低回，庄严肃穆。日本众议院议长清濑一郎、参议院议长松野鹤平、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末广、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总评议长太田薰以及其他各工会、文化团体、民主团体、摔交协会、恩师、亲朋等代表和家属2600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佩戴丧章，参加了葬礼。在附近的日比谷公园露天音乐堂为未能参加党葬仪式的人们设立了烧香处，工人、学生、妇女和一般市民4000多人冒着霏霏细雨，前来这里烧香致哀，在缠绵的秋雨中，荡漾着国民葬的气氛。

浅沼委员长是在8天前，在这里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的。政党领袖被刺杀而死，这在战后的日本尚属首次。

10月12日下午，日本正面临大选前夕，公民选举联盟在日比谷公园公会堂主持召开了自由党、社会党、民社党三党首脑竞选演说会。时值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之后，外交政策自然成为政治论战的中心主题。浅沼委员长在公会堂讲坛上，用宏亮的声音压倒右翼分子的嘲笑和嚎叫，慷慨激昂地向听众说：“美日安全条约问题是日本最重要的问题，为了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日本应当要求美军撤退，要求把美国占领的全部地区归还日本”。浅沼委员长义正词严、充分反映广大日本人民保卫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讲话，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喝彩和热烈的掌声。为了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和阻挠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浅沼大声疾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只有一个，尽快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池田内阁死抱着与台湾的条约不放，在联合国跟着美国后面跑，反对承认中国的代表权……”

这时，突然从听众群中窜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少年，从最右侧的通道冲到讲台前，他跳上讲台，抽出腰间的利刃，对准正在讲演的浅沼委员长胸部，猛刺两刀，殷红的鲜血顿时喷溅出来。浅沼委员长用手按着喷满鲜血的胸部，怒视着凶手，呻吟着慢慢地倒了下去。刺杀浅沼的刹那间，在场的人都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茫然无措，当他们醒悟过来时，赶紧制服凶手，但浅沼委员长已倒在血泊之中，虽立即把他送到附近医院抢救，为时已晚，在医院中死去。据日本警视厅调查，凶犯名叫山口二矢，现年17岁，日本大东文比学院一年级学生，是日本大爱国党党员，亚洲反共青年联盟盟员，其兄也是右翼分子。凶犯供认，他早就打算刺杀浅沼委员长，一直在窥视机会，在过去的3天中，他就策划着这个暗杀阴谋。

浅沼委员长被刺杀，震惊了日本列岛，也震惊了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浅沼遇害的当天，东京的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家庭妇女纷纷自发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强烈抗议杀害浅沼委员长”，“不容许恐怖活动。”

翌日，将近 35000 名各界人士在日比谷公园举行抗议大会，要求为法西斯主义敞开大门的池田内阁辞职，撤除与刺杀浅沼案有关官员。会后在国会大厦、首相官邸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5 日，日本 400 万工人在全国 800 个地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大罢工，抗议美日反动派杀害浅沼委员长。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日本自治相、国家安全委员长山崎岩因浅沼被杀案引咎辞职。

浅沼遇害后，我国周恩来总理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也于 10 月 13 日，纷纷致电日本社会党，吊唁这位“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浅沼稻次郎委员长。

葬礼在悲哀沉痛中进行。社会党总务局长矢尾喜三郎致开会词，全体参加葬礼的人们以悲痛的心情齐声合唱“同志，你没有死”，悲愤壮烈，催人泪下，葬礼仪式上，还宣读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中国各团体负责人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的电唁。最后，参加葬礼的人合唱追悼歌，并相继向浅沼先生灵前献花。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到街上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杀害浅沼的罪行。

浅沼稻次郎先生于 1898 年 12 月 27 日出生在东京都三宅岛。1923 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曾领导过矿山的工人斗争和农民运动。1925 年 12 月成立农民劳动党任首届书记长。1945 年日本社会党成立后任组织部长、书记长，连续 7 次当选为众议员。1960 年 3 月被选为该党委员长。浅沼先生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在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斗争中是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1957 年和 1959 年曾两次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浅沼说：恢复日中邦交是 9000 万日本人民的一致愿望。毛主席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

北京的春天，虽然风大沙多，比不上江南明媚艳丽，但春风毕竟吹绿了大街小巷的枝头，吹开了路边墙角的迎春花，给北京涂抹上春天的气息。

在这浓郁的春季里，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于 1957 年 4 月 12 日来北京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日本社会党历来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为改变当时处于极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57 年 1 月，日本社会党召开的第十三次大会上，就把拥护宪法、反对军事基地、要求收回冲绳和恢复日中邦交四大人民运动确定为该党的活动中心，而且在决议中明确表示：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说法，尽快恢复日中邦交。4 月 11 日，浅沼书记长来北京前，在东京羽田机场发表声明，指出“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 12 年，日中两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束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恢复日中邦交是 9000 万日本人民的一致愿望。”他表示“准备在没有外交权利的在野党所具有的限度内采取行动”。

浅沼一行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毛主席虽和浅沼未曾谋面过，但对浅沼的情况早已略有所闻，所以，一见浅沼先生便风趣

地说：“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在来京之前，在东京就读过毛主席的传记，知道毛主席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进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浅沼本人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也从事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相似的经历，更加渴望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伟人。现在，见毛主席是那样的亲切随和，坦诚友好，心中激动不已，对过去未能阻止侵华战争，非常抱歉。战后，日本虽进行了民主改革，但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主席对浅沼先生这种自责精神表示赞赏，谦逊地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毛主席认为，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中日恢复邦交一事，浅沼认为，两国在国内互有困难问题。这就是中国还未能解决台湾问题，日本还处在美国的从属地位。他深信，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的，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说：“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成功。”

“赞成你的意见，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接着话题一转说道：“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毛主席认为，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要求撤除军事基地的斗争谈到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他说：“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七年、八年、十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但是，“你们可以出本来开矿，约定多少年以后，再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可以供给你们煤和生铁。”

毛主席精辟的分析，坦诚而幽默的谈吐，很快缩短了和日本朋友之间的距离，会谈的气氛也活跃起来。浅沼说：“日本经济是依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毛主席说到这里，加重语气，“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坐在浅沼旁边的胜间田清一也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

毛主席说，现在“世界大变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并辩证地指出，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悟的作用。

毛主席还就有关裁减军备、取消军事集团、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禁止原子弹氢弹等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毛主席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鲜

明的观点、深入浅出的阐述，给日本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毛主席接见之前，浅沼等还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进行了坦诚而友好的会谈。4月22日，浅沼书记长和张奚若会长发表了共同声明。23日，浅沼在告别宴会上说这次访华，“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将有助于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和世界和平。”

浅沼回国后，于5月7日发表广播演说，感谢中国的友好接待，通过访问，他深感日中邦交早日正常化的必要性。鉴于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历史上的关系和现在的种种情势，认为由两国政府正式、而且全盘地开始谈判恢复邦交的时期已经来到。所以要求日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早日开始恢复邦交的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日本社会党是在野党，没有执政，所以也没有外交权，只能鼓励政府和唤起国民舆论。准备从5月8日起在全国各地举行报告大会，展开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

毛主席坚信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要讲和的。浅沼决心要搞国民外交，使政府改变政策，早日恢复日中邦交。

1959年3月18日，刚刚抵达武汉不久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便接到毛主席要接见他们的通知，全团欢欣雀跃，匆匆驱车前往东湖。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是3月7日飞抵北京的。在京期间，浅沼委员长于12日举行讲演会，详细介绍了日本社会党打开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作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著名讲话。1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会见了全团。代表团还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会谈，17日发表了共同声明。18日中午才乘机到武汉访问。想不到刚到武汉，毛主席就接见他们。

浅沼一行乘坐的车队从闹市区驶出，向市郊的东湖急速前进。东湖是武汉著名的风景区，环境幽雅，风光旖旎，这里湖水潋滟，岸柳低垂，树枝绽绿，新桃争艳，秀美的珞珈山倒映湖中，交相辉映，妩媚多姿。三月的东湖，充满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迷人春色。车队在这样如诗如画的环境中沿湖边徐徐行进，使人赏心悦目，有超凡脱尘之感。

浅沼坐在车中，想起1957年岸信介登台组阁以来，不仅破坏了他的前任鸠山和石桥两届内阁以积累方式建立起来的日益发展的日中友好关系，改变了有自主倾向的外交路线，而且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了露骨的敌视政策和行为，撕毁了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妄图染指台湾等等，好不容易打通的渠道又被堵塞，两国关系几乎完全中断。岸信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受权发表声明，谴责岸信介敌视中国的错误态度，并宣布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反击措施，这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震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贸易界人士挺身而出，为扭转两国关系的这种极不正常状态而奔走呼号。在此情况下，日本社会党中央执委会于1959年1月决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以巩固和发展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消除人为的障碍。想到这里，决心要为恢复日中关系的正常化竭尽全力。

车队在临湖不远的一幢别墅式的楼房前停了下来，在接待人员的引导下，客人们鱼贯地步入客厅。毛主席一见浅沼便迎了上去，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毛主席请客人们入坐后高兴地说：“欢迎你们，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委员长见到毛主席还是那样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不禁想起前年来北京时和毛主席会见的情景，激动地说：“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说到这里，无限感慨，他说：“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一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接着，浅沼介绍了这次访华的目的、代表团在北京的情况以及当前日中关系的人为障碍。

浅沼的讲话，得到毛主席的连声赞许：“讲得好，讲得很好。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接着，毛主席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对当前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也认为是暂时的。毛主席说：“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毛主席娓娓而谈，深邃而明晰的分析，深深地吸引着在座的日本朋友。毛主席拿起一支烟，把它点燃，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说：“贸易总有一天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毛主席哈哈一笑，笑得那么爽朗，充满了自信，也感染了客人，使谈话更加亲切自然。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浅沼委员长笑着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作法。”毛主席很自然地联系中国历史，插了一句。

浅沼接着说：“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就很好。”浅沼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将来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取得完全独立，日中邦交恢复，想把日本经济和中国的长期计划结合起来，同时也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合作。那时，日本将不属于任何集团，用经济合作的办法来保障日本的中立。

毛主席赞同浅沼的话，认为两国关系搞好了，可以作生意，对两国都有好处。毛主席说：“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相互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作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将来总要作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作生意。社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听了毛主席极其幽默而又寓意深刻的谈话，浅沼表示，两国的关系中断

了，只能靠国民外交进行来往，决心回国后要搞国民外交，使得政府改变政策，早日恢复国交。对毛主席在百忙之中还接见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毛主席把日本客人送至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委员长也未曾想到，这次会见竟是他最后的一次。

浅沼委员长为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主张日中友好的爱国行动，使日本右翼势力大为不满，就在他第二次访华时，右翼势力就扬言要对浅沼先生下毒手。但是他为了日本的民族利益，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仍然坚决地勇往直前。1960年10月12日，他宏愿未了，壮志未酬，就被右翼分子所刺杀。但是浅沼先生的血没有白流，他终身为之奋斗、希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宏愿，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英明决断，在他遇害12年之后，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不正常状态。1978年又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浅沼先生地下有知，看到今日中日两国的密切关系，人员互访频繁，经贸不断发展，友谊之花开遍两国人民的心田时，定会含笑九泉。

（刘万镇）

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毛泽东与田中角荣

田中首相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直飞北京

1972年9月25日，在中日关系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这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载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团的日航DC—8型专机，于8时10分从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起飞，带着恢复日中邦交的希望，径直向远距3000多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首相首次访华。

在头等舱里，田中首相坐在松软舒适的靠椅上，俯视机翼下如絮如烟的茫茫云海，思绪万千。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尤其是日本受到的震动更大，无异于晴空霹雳。华盛顿决定同北京改善关系，竟事先未与其同盟国的日本打声招呼，进行“越顶外交”，这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感。加之，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都极大地调动了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国内要求政府修改对华政策，尽快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自民党内对佐藤内阁持批评的人也与日俱增。中日关系已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

这时，日本自民党正面临下届总裁的改选，党内各派活动频繁，争夺激烈。作为总裁竞争者的田中角荣志在必得。他审时度势，决定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选举时的主要对外政策，并积极进行活动。1971年7月和1972年1月，田中曾先后请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等草拟日中复交的可行性方案，并同桥本多次交换意见。1972年3月，田中向田川诚一吐露心声时说：“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指“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是正确的。”同年4月21日，田中与大平正芳、古井喜实彻夜长谈时表示，“如果我当上总理，请大平君任外相，全力以赴地打开日中关系。”5月18日，古井访华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对周总理说：“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如果田中就任首相，一定会着手进行日中复交，那时大平将以某种形式协助，构成理想的体制。”差不多与古井同时访华的公明党副委员长二宫文造也向周总理表示：“在田中出任首相和日中复交问题上，公明党将予以全面合作。”

1972年7月5日自民党举行临时党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总裁，田中以282票对190票的优势当选。当天，他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将以认真态度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翌日，田中被国会指定为总理。7日组阁，任命大平为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要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以便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大平外相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不能想象‘日台条约’还会继续存在。”平时遇事慎之又慎的大平，此刻作出如此积极的姿态，

指1972年4月13日中日友协与日本民社党访华团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认为恢复中日邦交，日方必须承认：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等三项基本原则。

实在令人瞩目。7月13日，田中将自民党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并扩大其成员，在自民党参众两院431名议员中，有249名议员参加了该协议会。

田中内阁在日中关系上的积极姿态，中国政府十分迅速地作出了反应。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时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实际上是中日两国总理通过新闻媒界进行的第一次对话。

现在田中将身负重任，去实现日中复交的历史业绩，同中国首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结束两国漫长的不正常关系历史的一页，感到责任重大。想到这里，田中对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以闪电般的速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完成了此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不禁流露出喜悦之情。要路通桥成，还需从战略高度出发，英明决断，心诚志坚去努力完成。他环视了谨言慎行的挚友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以及其他人员，增强了此行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开拓这条日中复交的通道，在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金桥”，经过了多少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才有今天的状况。这两个多月的艰难曲折，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佐佐木为田中访华铺设了轨道， 周总理说：“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

7月的北京是最炎热的季节，大火流金，真有点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为了沟通中日两国对邦交正常化的看法，冒着酷暑，顶着骄阳，于7月12日来北京访问。临行前，他专门拜会了田中首相，了解新内阁对华的基本态度，探寻对复交三原则，尤其是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真意。佐佐木坦率地问田中首相：“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佐佐木为了慎重起见，又叮问一句：“如果周总理问到，就照那样转达可以吗？”田中明确地说：“一定实行。”

与此同时，中国在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方面，当时还受到“四人帮”的干扰。为此，负责此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事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组成日本组，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有时就在毛主席住处开会，向毛主席汇报。

7月16日、19日，周恩来总理两次会见了佐佐木。佐佐木向周总理透露了他和田中首相谈话的内容，转达田中首相要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并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周总理当即表示：“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吧。”佐佐木立刻补充了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希望务必邀请。”周总理再一次回答说：“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略一思索，接着说：“田中首相访华时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考虑到田中首相乘专机来访，“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在会见中，周总理还深情地对佐佐木说：“社会党没有外交权限，我们当然只能和具有外交权限的田中首相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所以有今天这样的

形势，是日本人民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请向日本人民转达我的谢意。日中首脑会谈不要过多地拘泥于往事，将以向前看的姿态探讨问题。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是使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与一亿一千万日本人民建立永恒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一次历史性握手。”周总理这种诚恳笃实、坦荡无私的品德和细致入微的体贴，使佐佐木非常感动。

7月21日，佐佐木回东京后，立即向田中首相汇报，使田中了解了中方的态度，坚定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心，同时也切实感到有必要迅速拟定出日本方面对日中谈判的见解。

正当田中首相积极进行日中复交的准备时，中国方面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于7月3日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萧向前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新的首席代表。7月11日，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208人的上海歌舞团到日本访问和演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赴日的最大歌舞团，受到日方破格的接待，田中、大平对它也很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国意图，同中国对话的一个重要渠道。

孙平化到日本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陈杭处长也相继访日。据说陈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之所以说田中内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萧向前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

7月20日，日中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在东京新日本饭店为孙平化、萧向前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大平外相、三木国务相、中曾根通产相和自民党的桥本干事长、铃木总务会长、樱内政调会长等党政要人应邀出席，这是前所未有的。孙平化在宴会上说：“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仅是气氛，而能够使之开花结果。”这次活动，可以看作是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预先接洽。接着，大平在22日和孙、萧二人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首相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我。现在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8月11日，大平在大仓饭店再次会见孙、萧时，正式转达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还答应在首相同中国方面会谈时愿从中进行斡旋。次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8月15日，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萧向前时表示：接受周总理邀请，将于9月下旬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商谈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基本就绪。8月16日，孙平化完成了所负使命，率上海歌舞团乘日航和全日空两个航空公司的专机直飞上海。这实际上是周总理特意为田中、大平访华直飞北京安排的一次预演。

**《竹入笔记》使田中喜形于色，
“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2丁目3番地1号的首相官邸，田中首相一大早就来到他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昨晚从中国返回东京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来访。田中内阁成立不久，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带回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但是27年来，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完全是一片空白，加之还存在“日台条约”等问题。田中、大平对起草日中

谈判草案心中没有底，于是，竹入便充当田中个人的“密使”，访问中国。

竹入与田中私交甚笃，在田中组阁之前，曾向田中进言，希望田中认真着手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期待田中在总裁选举中获胜。现在，田中请他出访北京，他当然衔命前往。竹入访华前，曾与田中、大平先后四次磋商，就结束战争状态、具体实施三原则，尤其是台湾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以及条约形式等涉及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逐条加以确认，将其归纳为 20 条意见。7 月 25 日，竹入偕公明党政策审议会会长正木良朋飞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共约 10 多个小时。8 月 3 日晚才返回东京。第二天便匆忙来到首相官邸，向田中报告此次北京之行的情况。

田中一见竹入进来，便快步迎了上去，热烈握手：“竹入君，辛苦了。看你的神色，此行一定有所收获。”田中首相迫不及待地问。

宾主落座后，竹入详细地向田中汇报了这次访华的情况。他说：在北京同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总理认真听取了他转达田中、大平的想法和要求，在最后一次会谈时，周总理出示了事先打印好的中方方案说：“已经毛主席批准”，上面有毛主席的签名。周恩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我拼命地记录。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中方这个方案考虑了日方的立场，对日方的意见给予了关照。在会谈中，周总理还明确表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仅横遭日本的侵略，而且被索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为此，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念及此，我们不忍心让日本人民遭受痛苦，所以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竹入在汇报过程中，大平外相也走了进来。

竹入说着，将笔记本呈递给田中首相。田中迅速看了一遍，不由得喜形于色，连声说：“周恩来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并把笔记本交给大平。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平外相，这时也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忙将笔记本装进口袋，对竹入说，谢谢你，“今后看首相决断了。一俟定夺，我这个外务大臣就要排除万难去干，我发誓！”嗣后，便拿着笔记本匆忙赶回外务省。

竹入笔记本记载了如下内容：

两国的战争状态以共同声明的方式告终了；日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两国建交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纠纷问题；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权利；在缔结友好条约之前，先缔结航海、气象、渔业、邮电、科技等协定；关于台湾问题，要求日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废除日台条约，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等。

这就是后来被日本报刊称为的《竹入笔记》，它实际上是中国方面所设想的中日复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要点。

日本在研究了中方关于中日复交的要点的基礎上，拟订了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草案。但是一直作为大平外相智囊、参与起草草案的古井喜实还是放心不下，认为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归属等三原则的重要问题，与中方认识有很大差距，为确保会谈成功，古井建议将日方草案送交中国，作最

后调整。大平接受了这一建议。

9月9日，古井喜实受大平委托，携带日方草案，和田边诚一等率领日本备忘录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总理认真研究了古井带来的日方草案，于9月12日会见了古井一行，再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并深情地对古井等人说：“今后邦交正常化了，即使是互换大使，备忘录贸易也取消了，民间贸易还必须越来越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为了扩大日中友好关系，也必须开辟困难的道路、曲折的道路，我想对各位先生来说，这些工作正等待你们。”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对为中日友好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是非常关切和信任，中国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古井等人深受感动。

古井访华前不久，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于8月30日晚乘机飞抵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的胡瓦岛（即檀香山），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会谈中，日方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得到了美国的谅解。美国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将不试图向日中政府提出任何意见。”9月1日发表了《日美联合公报》，公报不仅赞同田中访华，而且对台湾问题也只字未提。事后，大平外相感慨地说：“夏威夷会谈进展顺利”，至少飞赴北京的单程票已经到手。

小坂肩负先遣队的使命访华， 为田中北京之行作好了最后准备

9月18日，华灯初上，白天喧闹的天安门广场渐渐地静了下来，但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却灯火明亮，气氛热烈。身着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虽然日夜操劳，显得有些消瘦，但他那大而明亮的双眼仍炯炯有神，平时严肃的脸上，今天也绽露出喜悦的微笑。他频频同日本客人举杯。今天下午，他刚同日本自民党代表团会谈过，取得完满的结果，现在特为该代表团访华成功举行宴会。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率领的日本自民党代表团是由23名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组成的，于9月16日抵京，此行主要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最后准备，负有先遣队的使命。小坂来京前，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于9月8日在自民党本部召开全体会议，就日中复交谈判的基本方针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归纳为五项较为抽象的原则。与此同时，党内亲台势力也大肆活动，激烈反对日本同中国恢复邦交。为了妥善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安抚台湾帮，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首相一面派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代表团访华，为他打前站，同时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参加该团，请中国方面施加影响，对他们做工作；一面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率团出访台湾，安抚蒋经国，实际上是安抚党内的台湾帮。

宴会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周总理在宴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我们要向前看。促进和发展中日友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对田中、大平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热情地赞扬说：“这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我们深信，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一定能排除干扰，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且无限深情地说：“当前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发展，是两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广大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各阶层朋友和组织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对于为中日友好播了种子的日本朋友是永远

不会忘记的。”周总理情真意切、通情达理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席间，周总理还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小坂夹菜，使小坂深受感动，不禁想起下午同周总理会谈时的情景。这是一次完全公开的会谈，除代表团全体成员外，随团记者也列席参加，历时约40分钟。在会谈中，周总理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9月18日，41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对于日本自民党内某些人鼓吹“不能抛弃台湾”和“两个中国”的谬论予以严厉的驳斥。同时对于田中内阁在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予以适当的照顾和体谅，但强调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能颠倒过来。对椎名特使赴台，周总理也说“他担当了很困难的角色，对此给予同情。”周总理还意味深长地说，通过互相交谈，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也可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坦诚真挚、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代表团中台湾帮的议员也大受感动，全体站起来热烈鼓掌，使会谈气氛变得轻松、友好。

小坂等人通过同廖承志等开诚布公的会谈和周总理的谈话，不仅就相互尊重对方立场，加深友好关系事宜达成了协议，而且也使代表团内部的不同意见已趋统一，都表示赞成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小坂这次访华，达到了预期目的。

小坂完成了使命，起到了为田中访华铺路的作用，于9月20日回国。回国当天，就在东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日中两国的百年友好，给田中首相铺路这个访问中国的目的已经达到。”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至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田中表示：“务必要使访华成功。”

周总理说：“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

北京机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悬挂在停机坪前主杆上的中国五星红旗和日本太阳旗迎风招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国旗首次与中国国旗同时在机场上飘扬。11时30分，田中首相乘坐的专机徐徐在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专机停稳后，舷梯靠了上去，铺上了红地毯。不一会，机舱门打开，身穿深灰色西服系着素色领带的田中首相，出现在机舱门口。他面带微笑，显得很兴奋，一面向前来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一面缓步走下舷梯，同迎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相互敌视了20多年的亚洲两个大国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到一起了。

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田中首相同前来迎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一一握手致意。军乐团奏起中日两国国歌，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乘坐插有两国国旗的红旗高级轿车，驶往城西静谧优雅的钓鱼台国宾馆18楼。

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就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进行第一轮首脑会谈。中方有周总理、姬鹏飞外长、廖承志（顾问）、韩念龙副外长、陆维钊亚洲司长；日方有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

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田中首相在会谈中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务必要使这次访华成功，以实现邦交正常化。周总理强调，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中日两国应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保持世代友好、和平的关系；日中双方应求大同存小异。周总理还表示，中国人民深受赔偿之苦，所以也不愿日本人民尝此苦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我们放弃赔偿的要求。在会谈中，田中首相还详细地说明了自民党内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并坦率地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到他这次访华的成功与失败。第一轮首脑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田中首相表示，“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

然而在进入实质性会谈时，一开始就遇到困难。26日上午姬外长与大平外相会谈时，由于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次郎死抠条文，把“日台条约”作为依据，使会谈陷入僵局。会谈中，高岛认为在《联合声明》中毋需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中国放弃赔偿要求”。因为在签署“日台条约”时，已经结束了与中国的战争状态；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对台湾归属问题，高岛认为日本已经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依据，日本政府没有资格谈论它的归属问题。当然，日本政府知道中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可以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等等。对高岛的上述论调，中方当即予以反驳。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轮首脑会谈。周总理严正指出，高岛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并不是田中和大平先生的本意。“如果照此理解，我真不明白各位是吵架来了还是实现正常化来了”。周总理说，所谓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说法，“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和日本人签订的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周总理特别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问题。针对田中首相在昨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轻描淡写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这句话，坦诚地指出：“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首相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并表示，“如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在会谈中，周总理等还对《联合声明》逐条阐述了中国方面的原则考虑。这轮会谈，用二阶堂进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当晚，姬外长与大平外相再次举行会谈，高岛局长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了接触。在此基础上，日方对所提方案进行了调整，并起草了妥协方案。

27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由于中方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灵活，日方也因田中首相从政治高度作出决断，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使分歧点逐渐缩小，难点逐一解决，从而对《联合声明》的内容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如“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认为是在中日恢复邦交时结束的，而日方则认为是在缔结“日台条约”后结束的，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最后，周总理提出正文中用“不正常状态”一词代替“战争状态”，但在前言中把

“战争状态的结束”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连结在一起写。经周总理这么一调整，双方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关于复交三原则的第三项“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问题，日方认为，如果把这一条写入声明，就将意味着日本的外交，特别是20年来的对台关系是虚伪的，这会引起自民党内和国会内的极大混乱。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明日方重申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那么第三原则就可以不写入《联合声明》中，而以其它的形式解除“日台条约”和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日方一再保证随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将采取适当形式立即宣布日台外交关系自然中断。

在整个会谈中，周总理对原则问题一丝不苟，但在运用原则时又灵活变通。周总理曾说：“从我们的处境出发，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如不坚持这个立场，即使建交了也不巩固，人民也不会支持。”所以，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把坚定的原则同灵活的策略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这个大局出发，使一些棘手问题迎刃而解。田中首相高度评价周总理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说他“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毛主席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

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高级红旗轿车车队，从钓鱼台国宾馆开出，在沿途的警卫下，经木樨地、沿西长安街，急速地向中南海驶去。27日晚饭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方：“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8时刚过，周总理前来国宾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北京的秋夜，凉风习习，绿树婆娑，在华美的路灯衬托下显得更加美丽。坐在车中的田中首相，心潮起伏，这三天的会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紧张激烈，但经过两国领导人英明决断，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出发，互谅互让，总算基本上达成一致。现在毛主席要接见，可以断定会谈已越过最困难的关口，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可。

车队绕过红墙，驶进中南海，沿着湖边的林荫雨道，徐徐前进。这里环境清幽，道旁的南海在夜幕笼罩下，湖面上闪烁着点点波光。车队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停了下来。这是一座18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园内老槐苍柏，极其宁静。田中等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步入毛主席的书房。房间不算太大，四周排列着巨大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马列著作和各种学术专著。在书架前侧，摆放着四个落地灯，房子正中，几把沙发摆成了半圆形。毛泽东主席见田中首相他们进来，便迎上去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候，然后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坐。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毛主席以他独特的诙谐和幽默，立时消除了客人们来时的紧张心情。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田中首相很有礼貌地说。

“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毛主席说。

周总理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田中首相也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侧过脸，对着大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用手指了一下坐在周总理旁边的姬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消除了隔阂，使彼此更加接近了。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

田中首相接着大平外相的话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全谈。”

“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毛主席关切地问。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首相真诚地说。

毛主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毛主席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一提到历史，就特别有兴趣，娓娓道来。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日本首相也蛮有兴趣地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毛主席把话题引到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上来。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田中首相表明了美国对他访华的立场。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毛主席说。

“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田中进一步阐明了美国的态度。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主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主席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田中首相说着，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主席点烟，然后自己把烟点上。

毛主席用英语说了句“Thankyou（谢谢）。”然后，悠然地吸了口烟，柔和的青烟，冉冉地向四周飘散。毛主席转过头问周总理：“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总理回答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首相赞许地说：“你们速度很快啊。”

“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田中首相兴奋地回答，接着坦诚地说：“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主席专注地听着田中首相的谈话，饶有兴趣地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说到这里，毛主席爽朗一笑，对田中首相说：“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啊。”

田中首相激动地说：“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中，毛主席谈吐随便，言简意赅，以安详而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以风趣幽默的语言，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毛主席的话，不装腔作势，亲切自然，充满魅力，引人入胜。田中等人和毛主席谈得那么和谐亲切，就象老朋友话家常似的，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兴趣所至，不时发出阵阵朗朗笑声。田中首相见毛主席侃侃而谈，精神旺健，由衷地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毛主席诙谐地笑着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周总理关切地说，并用手指了靠墙的书架。

田中首相随着周总理的手扫视了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一提到书，毛主席就特别兴奋说：“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指了指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六册）递给田中首相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首相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毛主席递过来的书，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三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起身和客人一一握手，并把客人送至门外。

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回到国宾馆，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主席会见的情况后，一个个笑逐颜开。因为，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会见时的友好态度，说明毛泽东主席已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地举杯祝贺。

事后，大平外相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这样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中日两国领导人用东方特有的方式， 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

国庆前夕，北京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已高高挂起，建筑物上垂悬着庆祝节日的标语，许多公共场所摆放着姹紫嫣红的鲜花，整个北京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内喜气洋溢，在东大厅里，枝型吊灯光彩夺目，地板上的红地毯分外鲜艳。正面屏风前的长条桌上，铺着墨绿色台布，桌子正中，“Y”型底座上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周总理和姬外长、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并排而坐，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两国领导人各自从砚盒里取出毛笔，在《联合声明》的中、日文文本和英文副本上庄严地签了字。然后两位总理站起来相互拥抱，互换文本，最后又紧紧握手。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碰杯声和互为祝贺的欢笑声。

签字仪式一结束，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立即赶到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对《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做了说明。当大平外相谈到“日中结束不正常的关系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时，突然话题一转，以坚定的口吻说：日台关系“在联合声明中虽没有

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这就是说，日本与台湾正式断绝了外交关系。

毛泽东主席 27 日接见田中、大平的当晚，大平外相和姬外长又接着继续会谈。这次会谈进展顺利。对田中首相在宴会祝酒词中关于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问题如何表述，最后采用大平外相的提法，即“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同意日方的表述方案，但必须在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后面，加上“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有关条款。其它分歧点也相继得到了解决。最后由外交部顾问张香山、亚洲司长陆维钊、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长陈杭和日本外务省高岛条约局长、桥本中国课长、栗山条约课长、丹波实条约课首席事务官等对条约文字进一步斟酌。你一言、我一语，直至 28 日清晨，终于完成了《联合声明》的全文。

28 日下午 3 时 40 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举行第四轮首脑会谈，最后确定《联合声明》条文。这次会谈仅用了 50 分钟。会谈结束时，周总理亲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亲笔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总理。中日两国领导人用东方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恪守信义的决心。当晚，田中首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由于问题都已解决，只待第二天签署《联合声明》，在会谈时那种紧张激烈的心情已经消失，所以会场上气氛热烈友好，到处欢声笑语，互道辛苦。田中首相显得特别兴奋，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刻。

签字仪式结束后，田中首相回到国宾馆，对自己在这届内阁中，这样快就完成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伟业，感到非常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和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又举杯祝贺，互慰劳苦。大平外相感怀赋诗：

长城延延六千里 汲尽苍生苦汗泉
始皇坚信城内泰 不知抵抗在民心
山容城壁默不语 荣枯盛衰凡如梦

并用毛笔书写后赠给二阶堂官房长官。

《联合声明》签署后，田中首相急于向自民党汇报，调整党内意见。在周总理陪同下，于当日下午飞赴上海访问。9 月 30 日由上海归国。田中首相走进机舱前，站在舷梯上向前来送行的周总理深深地鞠躬，以表达他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意。田中等返回东京时，受到了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政府和朝野各党首脑的热烈欢迎，这在战后是很少有过的，这表明日中复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对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最公正的评价。

《中日联合声明》的签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日两国人民 20 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两国领导人远见卓识，英明决断的结果。它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标志着中日两国之间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正常状态的结束，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确定了两国间的一种新的信赖关系，奠定了亚洲和平的基础。郭沫若副委员长为祝贺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业绩，特写了《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昔鉴真盲目，浮游东海；
晁衡负笈，埋骨盛唐。

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
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
洋。

喜雾雾云开，渠成水到，
秋高气爽，菊茂花香；
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
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刘万镇）

同志加兄弟 ——毛泽东与胡志明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们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中国和越南，领导本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引导本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谊。正如胡志明主席在30年前指出的那样：“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

追求共同的理想

1911年，西贡开往法国的轮船上。

年仅21岁的胡志明忙完一天的厨房杂务，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向轮船驶进的相反方向望去，西贡的景物早已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想起被法国殖民统治者占领的祖国，想起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人，一种坚定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走遍世界，寻求真理，解放受苦受难的越南人民。

胡志明就是带着这样的抱负来到法国的。在法国，他做过杂役、厨师；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各项政治活动，并于1920年12月加入法国共产党。他还同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者周恩来等人建立了关系，介绍赵世炎等人加入了法共。

几乎在胡志明旅居法国的同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也正在中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7月，大约在胡志明加入法共半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毛泽东与胡志明成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同志和战友。他们虽未曾谋面，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追求与目标，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胡志明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说：“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胡志明在广州除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外，还为筹建越南共产党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他组建了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创办培养越南革命干部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编印《青年》周刊，宣传革命理论，指导越南国内的革命斗争。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刘少奇、彭湃、李富春、邓颖超等有较密切的联系。如“特别政治训练班”就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附近，训练班不开伙，学员都到讲习所去吃饭。中越同志经常交流，关系密切。训练班除由越南同志讲课外，也请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湃等中共领导人为越南同志讲课。所以，胡志明在196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而写的《中国革命与越南革

命》一文中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

1926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期。1月1日至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国民党湖南省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并代表国民党宣传部在会上作宣传报告。胡志明获准在会上讲演，李富春任翻译，他痛斥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的种种罪行，号召越南人民起来斗争，呼吁中国人民支援越南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胡志明也被迫离开中国，曾在广州受训或工作的部分越南同志，则参加了中国的广州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与井冈山斗争。越南河内革命博物馆至今仍陈列着当年越南同志参加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物——“闽湘赣边区斗争纪念章”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志明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园。不久，中共中央按照胡志明的意图和要求，安排他以中共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实地考察和工作。当时，叶剑英正应邀在衡阳给国民党军进行游击战训练。胡志明到达衡阳后，和叶剑英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一起开会学习，一起交流抗日战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经验，彼此真诚相待，合作默契。

1940年法国巴黎沦陷后，胡志明立即召集海外部的同志共同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国内。他要求在中国的越南干部，包括准备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范文同、武元甲全部到广西工作。因为广西地处边境，活动条件好，可利用当地较宽松的政治条件，化名进行一些合法活动。胡志明等在桂林活动的同时，还在龙州乡下办训练班；在高平边境选择北坡作为回越领导革命的秘密立脚点；在靖西建立秘密交通枢纽。胡志明在靖西同越共国内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同志长征、黄文树见了面。

1942年8月，胡志明准备再到重庆找中共同志，不幸在进入广西边境时被捕入狱。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将军帮助获释，遂留在广西活动。1944年9月重新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1945年8月在日本战败、宣告投降的同时，越党在河内北面的新潮举行全国会议，决定总起义。8月19日，越南首都河内的起义成功。9月2日，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

胡志明和毛泽东在这段时间中，虽然几乎没有直接联系，然而，胡志明在讲中越革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中国抗战的胜利也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1951年2月越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志明在政治报告中说：“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从而使我們取得了许多胜利。”并称颂毛泽东是“英明的、当之无愧的兄长和朋友。”

慷慨无私的援助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进行抗法斗争的越南人民和胡志明主席。12月5日，胡志明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祝贺。翌年1月18日，中越正式建交。此时，越南仍在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仍控制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胡志明

为了同毛泽东交谈抗法斗争的形势，请求中国给予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秘密离开越南，徒步走了 17 天，才走到中越边境，这对于一个六旬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后经中国有关部门的安排，于 1 月底始抵北京。但毛泽东、周恩来已去苏联访问。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热情接待了这位从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并把胡志明主席来京的消息电告毛泽东。2 月 3 日，根据胡志明希望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愿望，经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积极与苏联方面联系，并安全把胡志明送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胡志明主席拜会了毛泽东，并同斯大林、毛泽东就越南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会谈。3 月 4 日，又随毛泽东、周恩来一道返回北京。

回京后，毛泽东认真考虑了胡志明主席提出的经济、军事援助问题。当时，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企图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个方向构成合围，形成钳击之势，威胁中国的安全，而越南正是实现这一态势的重要所在。在国内，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创伤还未来得及医治，国民经济急待恢复，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山河待整，百废俱兴，面临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要解决这些困难，都需要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越南，英勇的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美国的援助，占领了越南全国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封锁了中越边境，企图包围、分割以至消灭抗法斗争根据地。胡志明面临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毛泽东清楚意识到，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支援越南人民争取抗法斗争的胜利，不仅是对兄弟党和国家斗争事业的支持，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也利于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中国的企图，对维护中国的独立、安全和今后的经济建设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纵观全局，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接受胡志明同志的请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从人力、物力和军事上给越南人民以无偿的援助。

鉴于罗贵波同志已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先期赴越，毛主席、党中央又决定任命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组成军事顾问团赴越工作；不久，又派陈赓为代表，赴越协助组织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中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各项工作。

派遣中央联络代表和军事顾问团赴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它直接关系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关系到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并研究规定了顾问团的工作任务、指导思想及工作方法。顾问团出发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到京的顾问团成员，为顾问团规定了两大工作任务：一是要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毛主席说，派顾问团是胡志明主席要求的，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要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特别要搞好同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别做工作。

毛主席还指出，帮助人家，只凭主观愿望出发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要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行。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越南民族是一个好民族，几年来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道路。他还语重心长地对

大家说：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艰苦，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有牺牲危险，要克服困难。

罗贵波赴越后，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他们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与越南领导人一起调查研究情况，认为通往中国的主要路线都在法国殖民军的严密封锁之下，援助物资无法运达，应首先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接着又同随后到达的顾问团及陈赓同志一起，制定了具有扭转战局作用的边界战役计划。在中越两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边界战役首战告捷，战果辉煌。击毙、俘虏敌军近万人，收复了5个市，13个县镇，使中越边境的大片越北地区获得解放，扩大和巩固了根据地，打通了运输线，中国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胡志明主席评价这次战役时说：我们打了两个大胜仗，第一是我们消灭了敌人，并解放了高平、东溪、七溪；第二是我们看清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边界战役的巨大胜利，加深了毛泽东与胡志明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情谊。1951年2月，胡志明在越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这是我们越南革命者应该牢记和感谢的。”

亲如手足的兄弟

1955年6月23日清晨，胡志明主席身穿礼服，头戴礼帽，气宇轩昂地站在睦南关下。他摘下礼帽，抬头望了望雄伟的关楼，用手轻轻地捋了一下腮下的银须，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的陪同下，步入了睦南关。胡主席此次来华，是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65岁高龄的胡志明，步履矫健，满面春风，举止间充满了兴奋和喜悦。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英雄的越南人民可谓双喜临门——奠边府战役告捷，日内瓦协定签字。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以越南人民的胜利、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失败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6月25日，胡志明主席乘机飞抵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上万群众隆重热烈的欢迎。当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相互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主席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胡主席在毛主席等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顿时，机场上欢声雷动，彩旗飞舞，来自云南、广西的僮、瑶、苗、哈尼等少数民族的青年，身着各色民族盛装，跳起欢快的民族舞，欢迎尊贵的友好邻邦的使者。

当天中午，毛泽东便会见了胡志明主席，热情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对外来侵略，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主席对毛泽东主席及中国人民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两位领导人亲切交谈，无拘无束，话题涉及两党、两国关系、亚洲和世界局势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

6月2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主席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宴会从始至终，充满了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胡志明主席在宴会上致词时还特别强调：中越两国“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兄弟”，近年来，两国关系愈趋密切，越南在抗战时期和恢复国民经济时期，都不断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同情和支持，中

越友谊和密切关系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任何人也不能离间和阻挠的。

在京期间，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还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签署了联合公报。此外，胡主席在毛泽东主席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34 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所到之处，都洋溢着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7 月 8 日，胡志明主席离京赴蒙古、苏联访问。21 日，当胡志明主席途经北京归国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亲切告别。

胡志明此次访华，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访问。访华期间，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 8 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用于协助越南修复和新建铁路、码头、公路桥梁和纺织、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机具、造纸等方面的建设。此外，中越在技术合作和文化联系等方面，也达成了合作的协议。通过这次访问，使中越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两国合作更加广泛，从而大大加深和发展了中越两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友好关系。

真诚团结的愿望

1960 年 8 月，胡志明主席再次来到中国，在北戴河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下榻在中共中央在这里的别墅中。

当时，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有关合同，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图纸，使中国 40 多个部门的 250 多个建设项目被迫中断，在经济上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1960 年 6 月，苏共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并逐步扩大。对此，胡志明非常焦虑，他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尽快对话，消除隔阂，恢复团结。他怀着这个目的来到中国。

8 月 10 日，胡志明起得很早。昨晚没有睡好，总想着中苏关系问题，很想和毛泽东谈谈。他见毛泽东的房间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便独自一人去海滨散步。

毛泽东也整整一夜没有怎么睡。早起后，想去看看胡志明主席，同他聊聊，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主席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海边。

当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赶到时，两位老友已就中苏两国关系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苏联不喜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建设上不能强迫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接着他列举了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做法，批评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同时，也表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待苏联。他说：“我们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怕，天是不会掉下来的。”

毛泽东对胡志明主席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

胡志明主席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认为“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个人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说得好，我们也要注意批评方式。”毛泽东说。

胡志明主席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随手拿起一盒烟，举在眼前说：“以请人抽烟为例，把烟递过来请人家抽，人家乐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说：‘抽烟吧！’有人就不乐意了。”边说边把烟丢在桌子上。

胡主席接着说：“其实还不是一样，但各人的习惯不同。西方人对后一种方式总会不乐意。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讲话的方式使人不乐意，效果不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赞同胡主席的说法：“要用科学的语言，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加上同志性！”胡志明补充说。

交谈中，两位领导人还就即将于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方法及苏联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误解等交换了意见。

这时，太阳已跳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万点金星。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并肩走下海，挥臂劈水，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

毛主席、胡主席上岸后，与前来海滨看望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一同进餐，话题也轻松了许多。

胡主席热情地邀请中国党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越南国庆纪念活动和党的代表大会。并风趣地对毛泽东说：“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毛泽东同志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毛泽东问。“12度。”阮春水在旁回答道。“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红河。”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公开，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胡主席笑着说，“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混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又一次会见了从苏联返京的胡志明主席，听取了胡主席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情况的介绍。胡主席情真意切地希望中苏两党尽快举行会谈，以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挽救面临危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主席被胡志明主席这种精神所感动，紧紧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谢谢胡志明同志，为团结奔走万里。感谢你！”

然而，由于苏联坚持大国霸权主义态度，不可能解决中苏两党两国存在的种种问题。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必要的妥协，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但苏共仍以“老子党”自居，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使争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胡志明主席的极力劝说，并未阻止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

1969年9月2日，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一生的老人，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中苏和解，他带着这一善良愿望，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反美斗争的后方

1954年7月法国与越南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后，美国便取代了法国，继续对越南南方进行殖民统治。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为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又开展了伟大的抗美斗争。

1964年8月3日，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往越南海域，美国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8月5日又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从而把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到了越南北

方。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翌年3月，美国第一批作战部队——3500名海军陆战队到达南越岘港空军基地，准备实施更大的军事行动。

面对美国侵略者的猖狂进攻，胡志明向毛泽东发出了援助的请求，并派黎笋来华具体商谈。毛泽东认真分析了越南战场形势和当时的国际局势，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无条件的满足越方的要求”。同时，通过刘少奇与黎笋的会谈，就有关援越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胡志明主席。胡主席对毛泽东说：“我这次到中国来，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听后说：“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他还向毛泽东举了个例子说，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寄捐款给胡志明，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胡志明说：“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情谊。”他还介绍说：“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的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把万人。”毛泽东分析说。

胡志明对毛泽东的分析表示赞同。他说：“美国来十把万人，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只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蝗、蜂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两位领导人还就越南战场形势和具体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他们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对眼前的困难充满了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在吃饭时，毛泽东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胡志明嘴上说欢迎，实际上并不同意，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我就是要去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看到轰炸了。”毛泽东仍固执地说。

胡志明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婉转地说：“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对胡志明的心意是非常理解的，但还是说：“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还是坚持己见：“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

毛泽东屡遭婉拒仍不灰心，胡志明坚持原则毫不动摇。可谁曾想到，越南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未结束，胡志明还没来得及在越南的土地上接待这位恳切要求访越的老朋友，便离开了战斗的土地，离开了心爱的祖国和人民。也许这是两位伟人一生交往中的一件憾事。

对于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胡志明和越南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黄文欢同志在1979年11月，曾发表文章回顾说：“根据胡主席的请求和两国政府的协议，自1965年10月起，中国的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达30多万人，来到越南北方工作。中国同志击落了许多敌机，修筑了成千公里支前运输线，并保证道路畅通无阻。成千中国战士牺牲在越南的土地上。1970年7月，在完成的任务之后，这些部队已全部撤回中国。”在物质方面，从中越正式建交后，“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二百亿美元，在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和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等等”。“中国帮助越南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供应了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中国援助了越南五百多万吨粮食。”中国石油刚刚能够自给的时候，“就尽力供应越南近二百万吨汽油。同时，还援助越南三千多公里的油管，使越南能够铺设输油管道，把中国的汽油送到越南南方。”在战争年代越南人民的日用品，也是中国援助的。“中国还援助几亿美元现金，供越南机动使用，而当时中国正十分需要外币来建自己的国家。”

源远流长的友谊

中越两国国土相连，山水相依，奔流不息的红河发源于中国云南大理，在越南境内长达500多公里，它象一条友谊的纽带，把中越两国人民世代代连在一起。特别是近代，在抗法、抗日以及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中，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交往日益频繁；毛泽东与胡志明更是亲如兄弟，彼此支持。

胡志明主席曾多次来我国访问或途经中国顺道访华。他不仅同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交往，深厚的友情，而且对中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感到亲切。1959年8月，他在苏联休假后，专程从新疆入境，经酒泉、兰州、西安，转道庐山和北京，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时间和路程都较长的参观、游览和访问。8月1日，胡志明入境时，从飞机上看到旭日东升，朝霞满天，群山起伏，甚为壮观。到宾馆后，即兴用汉文写诗一首，诗云：“遥望天山风景好，紫霞白雪抱青山。朝阳初出赤如火，万道红光照世间。”回越后，又用第三者口吻写了长篇游记发表。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胡志明主席情真意切，非常尊敬。1960年5月，胡志明70寿辰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联名致电祝贺，称赞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同时，毛主席还派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专程到越南为胡志明祝寿，祝词是用16句诗

写成的，最后四句是：“中越相依如唇齿，后方前线互支援。一柱南天欣顽健，英雄肝胆福寿全。”

1961年7月1日，胡志明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发表署名文章《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高度评价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称颂它是“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世流芳。”

胡志明晚年多病，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关心，曾多次把他接到中国广东和北京，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1969年初，毛主席、周总理得知胡志明病重时，又立即决定派专机、送专家、护士赴越南协助治疗。8月23日，胡志明主席病情加重后，中国又派出了第二个专家组赴越，紧接着，26日第三个专家组飞赴越南。当时，胡志明病情再度恶化，专家组一下飞机便直奔主席府，投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又派出了第四个专家组。9月2日9时47分，当第四个专家组的专机仍在赴越途中时，这位为越南人民奋斗一生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杰出战士、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悲痛万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战友和亲如手足的兄弟；越南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悲痛之余，周恩来考虑到胡志明逝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誕生日是同一天，立即给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发去署名电报：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没有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事情正象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越南公布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是9月3日。越南党不愿把胡主席的逝世日与共和国的誕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与忌日纪念活动不好安排。

9月4日，周恩来受毛泽东之托，亲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悲痛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周总理真挚的话语，使在场的人更加悲痛。

9月6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到越南驻华使馆进行吊唁，对胡志明不幸逝世表示无比沉痛的哀悼。毛主席献的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半个世纪以来，胡志明在其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为革命的献身精神，高尚的革命品德，一直为中国人民所崇敬。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唁电中所说：“胡志明主席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越南革命的具体实践。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事业。”“胡志明主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支持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岁月里，他几次来到了中国，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中越两国革命胜利以后，他为加强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战斗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和团结，是经得起考验的。”“胡志明主席逝世了，但是，他的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将永远留在越南人民的心里，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永远留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里。”

（张翼文勇）

“五·二〇”声明的由来 ——毛泽东与黎笋

1970年5月11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地处北京城西玉渊潭附近的钓鱼台国宾馆，仍像往日那样，宁静、优美，既无“文化大革命”群情激奋的场面，又无市井喧嚣的繁华景象。这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幢幢别墅似的楼房，错落在绿荫丛中，一池清水在夕阳的照射下，跳动着万点金星。负责接待越南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中联部和中央警卫局的全体人员，刚刚忙完一天的紧张工作，大家正轻松地坐下来用晚餐。突然，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通知，说毛主席晚上6时45分将会见黎笋同志一行。大家立即放下碗筷，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并马上把毛主席的这一决定，通知下榻在这里的越共中央代表团。不久，接待组的同志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正在118厅向毛主席汇报。

晚上6时30分，黎笋一行的车队准时从钓鱼台出发，车队顺畅地急驶着。当时，我担任毛主席会见时的速记工作，坐在前卫车上。五月的北京，和风轻拂，绿柳摆枝。但我在车上无心欣赏这美好的夜景，只是幸福地一心想着：我又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又可以聆听他老人家那亲切、幽默、风趣、富有高度哲理和博大精深的谈话了。同时又想到：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悍然下令美军入侵柬埔寨，将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今天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可能要发表重要谈话。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紧张起来。这时，只听见坐在我身旁的魁伟军官那宏亮的声音在报话器里响着：“01，01，车队已进西南门！”我连忙回过神来，待前卫车刚一停下，立即挟着皮包，第一个奔进宏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这时，迎面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急步向我走来，于是，我停住脚步，汪东兴主任上前握住我的手说：“速记同志，今天主席的谈话很重要，一定要记录好！”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毛主席同黎笋热烈握手拥抱、合影留念、互致问候之后，毛主席即开门见山地对着黎笋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一思索，又接着说：“还是大国怕小国。一有风吹草动，它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它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了，开炮就打。”毛主席说着开怀大笑起来，周总理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这笑声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蔑视和对人民必胜的信心。

毛主席继续风趣地说：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

毛主席收注笑容，脸上渐渐地显露出严肃的表情，他有力地一挥手，愤然地说：你来杀我，难道我不可以杀你吗？

黎笋点了一下头，赞同地说：正是这样，光是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3万人。

毛主席说：现在美国人分配不过来，在全世界铺的太广。所以，死人它是很伤心的。死几万人对它来说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侧过身来，对着黎笋，若有所思地说：刚才讲到究竟谁怕谁？小国、小民族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它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文学家，叫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做“黔驴技穷”，说明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时只有 70 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也可以谈，但主要还是打。

毛主席纵观世界形势以后说：当前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

时间不知不觉地悄悄流逝，已是晚上 8 时 15 分了。周总理抬手看了看表，向毛主席示意会见时间已经到了。毛主席会意地点点头，结束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和谈话。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根据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起草了“五·二〇”声明，这就是 1970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在首都百万人集会上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

（吕辉祥）

释迦牟尼骑牛

——毛泽东与凯山·丰威汉

1970年7月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这是自同年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悍然下令出兵入侵柬埔寨，将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以来，毛主席会见的第二批来自反美前线的兄弟党领导人。见到前线来的战友，毛主席格外高兴，谈话内容广泛而深刻，从老挝的民族，谈到中老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从印度支那的斗争形势，谈到整个世界的反美斗争。宾主之间，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和谐亲切。不知不觉，原定的谈话时间到了。周总理抬手看了看表，毛主席似乎没有看见，饶有兴趣地问凯山：“我不大懂，万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凯山说：“老挝的象很多，过去国王举行庆典，都要有大象，尤其是白象，是最名贵的。”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今天解决了我一个问题。”

接着，毛主席操着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一个迷人的、然而又非常难以听懂和记录的故事。他说：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其中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北朝，信奉佛教。有一次开法会，由一位高僧登坛讲经，讲到中间，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迦牟尼平时出门骑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释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莲台之上，出门时则骑白象。这个提问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释迦牟尼出门骑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说骑牛吗？高僧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这个人。说完，毛主席大笑起来，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凯山等外宾也都跟着大笑起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也不明白“音貌奇特”是什么意思。当时翻译同志也没有听懂，示意请周总理、康生帮忙。总理和康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林彪、黄永胜则低着头，大概更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翻译同志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口中念念有词地应付几句。我很佩服翻译同志的应变能力，下来后问他，当时是怎么翻译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就应付过来了。

由于毛主席谈话时湖南口音很重，我把“音貌奇特”误听成“音麻奇踏”，所以，回来后对这一句关键的话怎么也弄不懂，无法整理下去。我查找了《辞海》、《辞源》，也找不到“音麻奇踏”这个词。急得我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脑海里不断地翻腾着：“这怎么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整理到半夜，我猛然想起，不如到北京大学去碰碰运气，那里的知名学者很多，请教请教权威——当时所谓的“反动权威”，也许能找到答案。

天一亮，我便匆匆忙忙驱车赶到北京大学。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学校领导已“靠边站”，由支“左”的部队负责。我找到在北京大学支“左”的部队的一位政委，向他说明来意，请他为我请一位语言或熟悉佛学方面的专家。过了一会，政委从“牛棚”里带来一位低着头、目光呆滞、神情沮丧的老教授。我立即迎上前去，伸出手去跟他握手。老教授习惯地往后退。我连忙说：教授同志，昨天毛主席会见外宾，有一句重要的话我没有弄懂，特地来向你请教。老教授一听是毛主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所谈的问题要向他请教，立即抬起头，眼睛一亮，露出了大学问家特有的智慧光芒。我把毛主席谈话前后意思给他讲了一遍，请他查一查“音麻奇踏”是什么意思。老教授略一思索，便肯定地说：明天上午就能查出结果。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来到北京大学。老教授对我说：《启颜录》是隋朝

人侯白写的一本笑话集，原书已散失，今存敦煌卷子本与后人辑本多种，约收集笑话百余则。据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说，《太平广记》引用甚多。说着他便递给我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音麻奇踏”即“音貌奇特”，“奇特”可以理解为骑牛。他说：“音貌奇特”的“特”字有两说，一是指公牛，《玉篇》云：特，牡牛也；一是泛指牛，樊绰的《蛮书》云，有一家生了一犬，初如小特。所以“奇特”即“骑牛”之意也。此处“音貌奇特”本意指释迦牟尼长相风度奇特，可是提问的人偏说释迦牟尼骑牛这不是很好笑吗？当时我的心立即高兴得狂跳起来，紧紧握着老教授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我对政委说：老教授为整理毛主席的谈话立了功，建议组织上尽快解放他！

回到家里，我很快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对着记录稿，心潮起伏，深感毛主席的学识是多么博大精深啊！

（吕辉祥）

烈火炼真金患难见知己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

毛泽东非常欣赏唐朝著名诗人王勃写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他光辉的生涯中，为了实现他救国匡世、造福人类的伟大抱负，他在国内外广交朋友，广结知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就是他的一位朋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帝国主义封锁中国、孤立中国的时候，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虽然弱小，但坚持执行中立政策，支持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当1970年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是中国挺身而出，排除各种障碍，和各友好国家一起，坚决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抗美民族解放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在1970年柬埔寨沧桑巨变中，西哈努克遭受了苏联的冷落，但受到了中国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主席多次会见西哈努克。毛泽东和蔼的面容，亲切的话语，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寒冷的莫斯科

三月的莫斯科仍然是隆冬季节，天经常是阴沉的，凛冽的寒风刺入骨髓，有时还纷纷扬扬飘下鹅毛大雪来，人们仍然是裘皮裹身，皮帽盖顶。

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访问法国之后，于1970年3月13日风尘仆仆地抵达莫斯科。飞机停在莫斯科机场的跑道上，迎接他的是一位身材颀长、面孔清瘦的老人，他就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尼·维·波德戈尔内。

波德戈尔内对柬埔寨形势的发展非常清楚。连日来，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对西哈努克的阴谋。3月8日在柴桢省举行了游行示威；3月11日，在朗诺的弟弟朗农上校指挥下，以50名便衣军人为核心的一群人袭击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金边使馆。他们还在柬埔寨国内大造推翻西哈努克的舆论，形势已经很严峻。对于柬埔寨形势的发展，克里姆林宫的首脑们——列·伊·勃列日涅夫、阿·尼·阿西金和尼·维·波德戈尔内本人研究过，他们并不想坚决支持西哈努克，但还要做出支持西哈努克的姿态。在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对西哈努克说，“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莫斯科休息一夜，于明天早上飞往金边。”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信任您。您确实是贵国人民不可缺少的领袖。”然后他又强调说，“但重要的是，您得直接飞回柬埔寨去掌管国家事务，不要让它落入朗诺和施里玛达手中。您必须采取措施，不让柬埔寨逐渐陷入被美国人接管的局面。您必须阻止朗诺和施里玛达给正在为自己的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南越人民制造各种困难。”

西哈努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告诉波德戈尔内，他将按照原定日程访问莫斯科，然后按原计划访问中国。

西哈努克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柬埔寨的国内形势在急剧变化。3月16日、17日，朗诺利用陆军和卫队逮捕了亲西哈努克的20余名高级文官和军官，

当时朗诺任政府首相，施里玛达任政府副首相。

并封锁了金边机场；3月18日，在坦克包围国民议会大厦的情况下，强制议员投票废黜西哈努克，选举郑兴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建立了朗诺——施里玛达的军事独裁。

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几天谈判之后，西哈努克于18日下午离莫斯科动身去北京。在乘汽车去机场的路上，苏联总理柯西金转身对西哈努克说：“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西哈努克回答说：“这意味着我已经被废黜了！”柯西金问西哈努克：“您打算怎么办？”西哈努克说：“我当然要进行反击。”柯西金接着说：“您可以绝对信任苏联对您的斗争的支持。我们将永远支持您，而且支持到底。您将会看到中国人对这采取什么态度。当您在金边掌权时他们是帮您的，但是您现在不再掌权了，您将会看到他们会怎么办！”西哈努克听后仍然坚决地说：“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柯西金回答说：“不管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

温暖的北京

北京的3月，阳光和煦，小草泛绿，嫩柳垂金，玉兰待放，一派明媚的春光。19日中午，当西哈努克走下飞机后，周恩来总理带着毛泽东主席的重托，健步走上前去，与西哈努克热烈地拥抱。西哈努克深深地呼吸着北京的新鲜空气，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颗忧郁的心，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

西哈努克初识周恩来，那还是在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孤立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一些国家的代表在前两天的会议上说了不少对中国不友好的话。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镇定自若，沉着应付。下午4点多，会议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在数以百计的记者的簇拥下，在水银灯的光芒里，周恩来安详地跨上了讲台，以坚定洪亮的声音发表演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整个会议显得特别宁静。周恩来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豁达文雅的风度，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赞赏西哈努克的发言，尤其是赞赏那个轰动一时的“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为中柬友好关系拉开了序幕。此后，西哈努克与周恩来总理又有多次接触。在西哈努克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位能干、精明、富有正义感的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善良的友人”。

现在，时过境迁，老友重逢，大家都感慨万端。在热烈的拥抱之后，周恩来以深情坚定的语气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您是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

汽车缓缓驶出了机场，继而平稳地急驰在北京的宽阔的柏油路上。周恩来亲切地对西哈努克说，“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西哈努克回答说，“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周恩来坚定地宣布说，“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并且提醒西哈努克说，“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迁到挫折。”西哈努克充满信心地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

其傀儡。”

在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下，西哈努克积极地稳步地推进着抗美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了庄严声明，宣布建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由西哈努克亲王担任阵线主席。在西哈努克的倡议下，4月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某地召开了有柬埔寨、老挝、越南南北两方领导人参加的三国四方会议，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号召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专程前往会议地点，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出席会议的三国四方领导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深厚的友情

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悍然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伪军侵入柬埔寨领土。这无异于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上又浇上了汽油，使得柬埔寨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柬埔寨局势的这一变化，使北京的西哈努克官邸，充满了愤怒和焦虑的情绪。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到天安门城楼共度佳节。

5月1日，落日的余晖，把蓝天抹上了一片片鲜红的彩霞。华灯初上，把银白色的光芒撒向天安门广场。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在红霞、银光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西哈努克亲王的座车急速地向天安门驶去。西哈努克在车上回忆起1956年2月首次访华的情况。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那一天，西哈努克的专机徐徐降落在碧波荡漾、湖光山色的颐和园附近的西郊机场上。西哈努克在五颜六色的花束、纸条和彩旗的包围中，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走下飞机，并在周总理陪同下绕场一周。西哈努克在机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古老的关系已经有了大约1000年的历史。”“由于我们取得了完全的独立，今天我们才有优越的条件前来同柬埔寨最古老的朋友——中国重建友好关系。”周恩来则在15日晚设宴招待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周总理在宴会上说：“中柬两国人民有悠久的友谊。”“中国人民一直把柬埔寨人民当作弟兄一般地看待，把柬埔寨看为亲密的邻邦。”

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毛泽东身材魁梧，气度恢弘，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毛泽东向西哈努克阐述了中国的政策，强调真正独立的国家不要让别的国家控制。他表示，中国赞成国家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说，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他认为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这种方针。

此次访问期间，西哈努克代表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毛主席、周总理最高勋章。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在国际的风风雨雨里，毛泽东与西哈努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西哈努克认为“毛泽东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的思想在日后好几代人里还是适用的”。毛泽东成为西哈努克最信赖的人。

西哈努克亲王的座车驶进了天安门，在接待人员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进入会见大厅。毛泽东见西哈努克进来，立即站起来迎接他。毛泽东

虽然显得老了，但依然头脑清晰，反应机敏，一双大手热情地伸过来，紧紧握住了西哈努克的双手，西哈努克非常激动。

毛泽东同西哈努克一起回顾往事。毛泽东的记忆力是非凡的。他提到了西哈努克 1956 年、1958 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西哈努克的原话，并问西哈努克当时的看法如何。他对柬埔寨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以至使西哈努克感到吃惊。毛泽东谴责了朗诺的背叛行为，并进一步向西哈努克询问有关柬埔寨的问题，他表示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对中国和美国的援助，西哈努克心里有鲜明的对比。美国的援助是有条件的，是要柬埔寨改变中立政策，美国人总是说，“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而中国的援助则是无条件的。中国把宽敞漂亮的前法国大使馆移交给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及其随行人员的官邸。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给柬埔寨人民以慷慨无私的援助。而当西哈努克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泽东总是回答，“我们不是军火商”。西哈努克想到这些，怀着感激和不安的心情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回答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愈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同西哈努克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毛泽东的谈话使西哈努克欣慰，给西哈努克以力量。

热烈的支持

5 月 5 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乔森潘任副首相。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分为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部分的总部设在北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得到将近 20 个国家的承认。

3 月份以来，西哈努克一直在寻求苏联的支持，但是西哈努克领导的这个政府没有得到苏联的承认。而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则坚定地站在西哈努克一边。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柬埔寨事态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思考着如何有效地支援柬埔寨人民。5 月 20 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5 月 21 日，北京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里，毛泽东正同西哈努克亲切地交谈。毛泽东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明了革命人民必胜的真理，他挥动着巨手满怀深情地说，现在是大国怕小国。毛泽东向西哈努克介绍说，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中国就不能胜利。西哈努克谴责朗诺发动政变，认为朗诺将推动印支人民走向革命，并再次感谢中国的支持。他说，印度支那三国决心战胜美国，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 300 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 8 万党员。他

又说，现在美国进退两难，退也困难，最好多呆一些时候。听着毛泽东富有哲理的谈话，西哈努克对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他乐观地说，呆长一些，会加强人民的革命斗志。

同西哈努克会见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广场万头攒动，一片沸腾，欢呼声、口号声震天动地。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他在声明中阐述了人民革命斗争的规律：“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西哈努克亲王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思念着他的祖国，他思念着物产丰富的故土，思念着金边，思念着水面广袤、金波粼粼的洞里萨湖，思念着闻名于世的吴哥窟，思念着热爱他、拥戴他的柬埔寨人民。他激动地说：“从1955年到1969年，高棉人民和我自己曾一起努力使我们可爱的祖国柬埔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欣然称之为‘烽火连天的印度支那和动荡混乱的东南亚的一个和平、稳定、独立和进步之岛。’”“但是，对这样的柬埔寨，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总是看了不顺眼”。他痛心地说：“美国人及其雇佣军出动了十万人反对我国人民。仅仅在几天的战斗里，柬埔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在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及其大炮等武器的轰击下，变成了一片废墟。”在痛斥美国及其走卒朗诺—施里玛达集团之后，他充满信心地说：“柬埔寨人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坚定地屹立着。因为柬埔寨人民已经揭竿而起，决心进行顽强的、毫不退缩的斗争，反对并彻底战胜一切卖国贼、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把他们从印度支那的土地上永远清除出去。”会后，北京举行了150余万人的声援游行。这一切，都鼓舞了柬埔寨人民的斗志。

胜利的喜悦

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下，柬埔寨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至1970年9月下旬，已经解放了2/3以上的国土，上丁、腊塔纳基里、蒙多基里、桔井、柏威夏等省部已全部解放，其他省有的解放了50%，有的解放了2/3。民族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金边，金边已经与其他地区完全隔离而陷于孤立。柬埔寨人民胜利进军的捷报不断传到北京。

10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华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城楼上20盏巨大的宫灯闪闪发光。四面礼炮齐鸣，五彩斑斓的礼花频频在天空开放，形成无数的花球，红色的，紫色的，银色的，绿色的……五光十色，闪烁烁烁，编织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一面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一面亲切的交谈。毛泽东仔细询问着柬埔寨战场的形势，西哈努克一一认真地做了回答，西哈努克告诉毛泽东，现在国内已经解放了2/3。毛泽东赞赏柬埔寨人民英勇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对西哈努克说，我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是通过斗争学的。他还幽默他说，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要打仗，是蒋介石要我打的。第一是蒋介石帮忙，第二是日本帮忙。如今是美国帮你们的忙。西哈努克听着毛泽东轻松幽默的谈话，心情很愉快，身上似乎也轻松了，眼睛似乎更明亮了。谈着，谈着，他们会心地笑了。

从 1970 年开始，西哈努克长期居住在北京。在华期间，他与毛泽东多次会晤、交谈。西哈努克在中国等国家的支持下，团结柬埔寨各界爱国力量，坚决进行反对美国及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斗争。经过五年多的浴血奋战，柬埔寨人民终于在 1975 年 4 月 17 日解放金边，在 4 月 19 日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共同的斗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里，中柬两国人民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

（仲潮浩）

中缅友谊的奠基者 ——毛泽东与吴努

胞波情谊，源远流长

1954年11月，北京已进入冬天。寒气袭人，北风呼啸。然而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却温暖如春，靠南面窗户处放置的两盆水仙花，生机勃勃，青翠挺拔，刚开放的几朵白色黄心的小花，散发出阵阵清香。在宽面的大办公桌上，堆放着一些夹着纸条的线装书和一摞待批的文件和材料。毛主席坐在桌前的靠背椅上，一边吸着烟，一边聚精会神地阅读即将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的有关材料。青烟袅袅，阵阵花香。毛主席弹了弹手中的烟灰，抬起头来，凝视着窗前的水仙花，沉思遐想。现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举，发展经济，建设家园，改善人民生活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缅甸总理吴努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即将来我国访问，商讨双边的重大问题，如果这次同缅甸谈得好，可以使四邻相安，有利于争取亚洲国家的和平共处，有利于新中国的和平建设。

毛主席对缅甸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对中缅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更为熟悉。中国和缅甸是山水相连，人民相亲的友好邻邦。流经缅甸全境的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在中国境内称怒江）均发源于中国，穿越西藏、云南的丛山峻岭，浩浩荡荡，奔流不息，从北到南，纵贯缅甸，汇入印度洋。滔滔的江水，带着中缅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的情谊，从远古的洪荒时代，流淌到今天。“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在长达2100公里的边界上，繁衍生息的两国人民，头顶一块蓝天，共饮一江清水，朝夕相处，友情无限，其部落关系、家族关系、亲戚关系，盘根错节，交往频繁。特别是近代，中缅两国有着共同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曾有过相互支援、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光辉历史，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大量国际援助的抗战物资，就源源不断地通过当时闻名中外的中缅公路，从缅甸运到中国云南昆明，再转运到抗日大后方四川，为了保护这条运输线不被日军切断，中国曾派远征军人缅，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大战结束后，缅中两国相继于1948年和1949年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两国又很快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缅甸人民把中缅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用血汗建立起来的这种亲密关系，亲昵地称为“胞波”（意即同胞兄弟）之情。

缅甸政府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国际上，始终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努力，并积极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牵线搭桥。这些正义的立场和行动，深受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和赞赏。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加上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威胁拉拢，挑拨离间，因此，缅甸当局对中国存有疑虑和戒心。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也关切地注视着中缅关系的动向和发展。所以，毛主席在处理缅甸问题时特别慎重。当时，国民党军李弥部的大批残匪，正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干着破坏、袭扰、贩毒、劫掠的勾当。为了尊重缅甸的领土主权完整，毛主席一再指示，无论如何不能过界搜剿，这一英明决定，赢得了缅甸政府

的信任和好评。

为了加强同缅甸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增进友情，1954年6月，毛主席特派周恩来总理首次应邀访问缅甸，同缅甸首任总理吴努进行了极为亲切的友好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倡导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声明强调，“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侵略和干涉的恐惧，将为安全感和信任感所代替。”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获得巨大成功，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吴努总理曾向周恩来总理表示，“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好的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对中国抱有的恐惧的相当大部分。”

毛主席掐灭了手中的香烟，将烟蒂丢进烟缸，站了起来，在屋内来回踱步，冬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了进来，照得室里暖和和的。毛主席思考着，吴努总理这次来华，会有不少问题，应该好好地同他谈谈，使他不虚度此行，有所收获。毛主席停住脚步，又重新坐到靠背椅上，拿起了有关缅甸总理这次来访的材料，仔细地研究起来……

真诚坦荡，互敬互谅

1954年11月30日至12月16日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冒着严寒，首次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以隆重、热烈和高规格的礼遇欢迎吴努总理一行。12月1日，吴努总理抵达北京的当晚和11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和颐年堂先后两次亲切会见了吴努总理一行，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谈话。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云、陈毅副总理以及我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和谈话。

毛主席深知吴努总理一直生活在炎热的南国，害怕寒冷，所以一见面就关切他说：“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总理显得有点拘谨，很有礼貌地向毛主席表示：“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泉源。”

“谢谢。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毛主席谦虚他说，并针对当时一些周边国家因受美国等的造谣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转过话题，开门见山地问吴努总理：“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吴努总理不明白毛主席提这个问题的用意，小心翼翼地回答。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主席自责他说着，略一沉思，情真意切他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毛主席胸怀坦荡，谦虚自责的态度，使吴努总理很感动，消除了来时紧张、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吴努总理也敞开心扉，坦诚他说：“很坦率他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主席专注地听着吴努总理发自内心的讲话后，真诚地说：“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所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总理点了点头，动情他说：“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是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的。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毛主席摆了摆手，体谅他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总理对毛主席如此重视中缅关系的友好情谊，非常感谢。他说，我们也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友谊，“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要重。”

两国领导人越谈越亲近，越谈越深入，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谈到华侨国籍问题，从政治避难问题谈到中缅两国边界问题，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到不久将要举行的亚非会议，气氛热烈友好，感情真挚融洽，无拘无束。

毛主席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毛主席略加思索后继续说道：“国家不应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毛主席将烟掐灭，挥了一下手臂，加重语气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象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表示我国同缅甸友好的诚意，毛主席以商议的口气，诚挚他说：“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五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五年，再进行五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

系更好，使我们的友好合作更发展。”

毛主席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剖肝沥胆的真情，人情入理的精辟分析，以及完全以平等的态度来商讨问题，使吴努总理更加信服和崇敬。他推心置腹他说：“坦率他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会为英国、美国的走狗。不过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毛主席在同缅甸政府领导人的接触中，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广阔的革命胸怀，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通情达理，真诚相待，慎重地认真处理同缅甸的有关问题，赢得缅甸总理吴努的敬仰和信服，不仅消除了吴努总理的疑虑，加深了相互了解，而且也为中缅友好事业奠定了坚实牢靠的基础，促进了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吴努总理这次访华是非常成功的。他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广州、武汉、北京、沈阳、鞍山、长春、大连、南京、上海、杭州等 10 大城市，认真地参观了工农业、著名大学、佛教寺庙，观赏了我国著名艺术家的精湛表演，游览了包括长城、中山陵在内的许多名胜古迹，广泛地同我国各界人士进行了接触，而且还同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副总理等我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和彼此有利的事项交换了意见，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这充分表现出中缅两国的友好合作有了发展，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正如吴努总理所说：“这一次的访问是极有兴趣和富有教益的，我特别高兴我能有机会同中国的领袖们会晤。”“今天，中缅友谊非常坚实的基础已经很好地和真正地奠定了。”“我现在带着要竭力促进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决心回到缅甸去。不但如此，我将尽我力之所能来促进世界和平。”吴努总理一行回到仰光后，在他的倡议下，缅甸文学宫出版了《中国纪实》一书，该书图文并茂，汇集了包括吴努总理在内的 7 名代表团主要成员的文章和吴努总理访华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彭真市长公开发表的讲话全文。这大大促进了中缅两国友谊的发展。

青山不老，友情长存

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从珍视中缅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出发，本着诚恳、平等、互谅的态度，同缅甸政府经过反复友好协商，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前半期，非常圆满地处理了许多复杂的双边事务，签订了航空运输、公路交通、邮政电讯以及贸易、文化、科技、经援、换货、支付等一系列协定和协议，顺利地解决了两国互设总领馆问题。两国的文化、和平、青年、工会、妇女等民间团体的友好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更为密切，其范围之广，次数之多，居当时中国与其它国家交往之首。据不完全统计，缅甸国家领导人吴奈温将军以国家总统、总理、执政党主席、总参谋长等身份，先后 11 次访华；吴努以政府总理、执政党主席的名义，前后 6 次来中国访问；其他领导人如吴巴瑞、吴觉迎副总理、苏瑞泰议长等也相继到中国访问过。我国领导人也多次去缅甸访问，国家主席刘少奇曾两次出访缅甸，周恩来总理 9 次访缅，邓小平、李先念、陈毅、贺龙、邓颖超等领导人也先后访问过缅甸。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以及两国各界人

士的广泛接触，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友谊，密切了两国关系。陈毅元帅用情深意切的诗句，描绘了当时中缅两国友好的情景：“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

1960年1月，缅甸总理吴奈温将军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两国总理经过亲密友好的会谈，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组织联合委员会对边界进行实地勘察。这两个条约和协定的签订，为亚洲人民和睦相处树立了一个榜样，也为世界各国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正如吴奈温将军所说：“我们在短促的逗留期间，就缔结了近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边界问题的协定，还商议和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我相信上述协定和条约的缔结，将作为中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而永垂青史。它们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而且无疑地将在巩固和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周恩来总理也盛赞这两个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更有力地证实了独立的亚非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团结友好的信念，并且为发展亚非国家的这种团结友好创造了一个新的范例。”

1960年9月28日至10月4日，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金风送爽，果实飘香，花繁似锦，首都人民再次热烈隆重，亲切友好地接待了来自西南邻邦的友好使者——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的由370余人组成的庞大友好使团，这是中缅两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空前盛举。宾主都视此举为“走亲戚”。友好使者走到哪里，哪里就洋溢着友好情谊。10月1日，吴努总理和吴奈温将军同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庆新中国成立12周年。当日下午，中缅两国总理顺利地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至此，有关中缅边界所有未能解决的问题，在条约中都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决。周恩来总理称赞“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的榜样。”

1961年新年伊始，为了进一步推动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了参加1月4日缅甸独立节活动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毛主席决定，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政府、军事、佛教、体育、文化、新闻、电影、云南省和边界联委会中方代表等9个庞大代表团430余人，前往缅甸庆祝和联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友好代表团。北京的一月，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然而来到缅甸，呈现出来的却是草绿花红，蜂飞蝶舞的春天。各代表团分别到各地参观、访问、演出，同缅甸各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到处是缅甸人民热情欢迎的笑脸，到处是色彩斑斓的友谊之花，真是友情洋溢，盛况空前。“中缅人民是胞波”、“中缅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正如缅甸报纸所说：“缅甸全国人民沉浸在中缅友好万岁的海洋中。”

1月4日，中缅两国总理在仰光成功地互换了《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至此，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圆满解决。在仰光市庆祝互换条约批准书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兴奋激动地宣告：“维护、巩固和发展中缅友好关系，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神圣的职责，我们世代都要友好下去。我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的一致努力下，中缅友好这座壮丽、宏伟的大厦，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永远照耀在辽阔的亚洲大地上。”

(黄里蜀宜)

携手共架友谊桥

——毛泽东与苏加诺

毛泽东在鲜花簇拥下迎接苏加诺

1956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的前一天，四架飞机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机场腾空而起，朝着北京的方向飞去。在一架双引擎飞机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身穿三军最高统帅礼服，头戴黑色民族礼帽，笑容满面地端坐在靠窗的机座上。应毛泽东主席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此次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就要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即将同毛泽东主席见面，他心中充满了喜悦和遐想。

对于中国，苏加诺并不陌生，两国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着极其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两国人民具有长期交往的历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印度尼西亚政府就力排众议，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苏加诺十分珍视两国的友谊，关心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他曾先后派出多批代表团来华参观访问，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在印尼的土地上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派去的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中国客人。只是一直没有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相见。苏加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使六万万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生，指导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各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是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此时的北京，秋高气爽，金菊飘香，到处是一派节日的气氛。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正高高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和印度尼西亚独立的红白旗。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用中文和印尼文书写的欢迎标语，就连电影院里也在上映彩色纪录片《印度尼西亚》，介绍这个横卧在赤道上的千岛之国的旖旎风光。北京西苑机场已聚集了万余名欢迎群众。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在机场等候，期待着印度尼西亚贵宾的到来。

下午二时，苏加诺总统的座机在一片欢呼声中徐徐降落。苏加诺迈出舱门，只见机场上鲜花如海，人潮涌动，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苏加诺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向人群频频挥动致意。然后神采奕奕地走下舷梯，向迎面而来的毛泽东走去。毛泽东和苏加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毛泽东把随同前来迎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总统一一介绍。其中周恩来同苏加诺曾在万隆会议上亲密合作，宋庆龄、陈毅曾经访问过千岛之国。旧友重逢，再叙别情，新知相见，互致问候。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融洽，如同一个和睦家庭的兄弟姐妹久别后的团聚。

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身着鲜艳服装的女青年不时把一束束饱含两国友好情意的鲜花送到苏加诺总统面前。苏加诺走上讲台激动他说：“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欢迎，不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以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

“大家对我的尊敬，实际上也就是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尊敬。没有人民，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是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赐予者，独立是人民斗争得来的。我不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父亲，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儿子。各位对我的尊重，我将全部转达给印尼人民。”

欢迎群众对苏加诺的讲话抱以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毛泽东也走上前去，同苏加诺一起并肩走向欢迎群众。顿时彩旗招展，欢声雷动：

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

和平万岁！

默地卡（独立）！朋加诺（加诺兄弟）！

一束束鲜花飞向苏加诺，一把把花瓣撒向毛泽东，两位领导人被包围在花的海洋之中。

毛泽东、苏加诺在工作人员的疏导下走出入群，登上敞篷汽车缓缓驶出机场，百余辆汽车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犹如一条长龙，行进在万花丛中。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 公里的道路两旁，数十万人夹道欢迎。毛泽东、苏加诺乘坐的汽车驶到哪里，鲜花就撒向哪里，欢迎声就响到哪里。汽车在鲜花的簇拥下驶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

真诚友好的会谈

初秋的中南海微波荡漾，曲径通幽的静谷，假山叠翠，花艳菊香。金碧辉煌的勤政殿掩映在红墙绿树之中。中南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勤政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开会议会见外宾的重要场所。毛泽东对勤政殿有独到的见解。一次，毛泽东会见外宾后，走出勤政殿，面对门后道光一年清朝皇帝御笔题写的“清、慎、勤”匾额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清，就是不贪污；慎，就是为老百姓办事要慎重；勤，就是不贪懒。可是这三个字，他们一条也没有做到。要做到了，也就不会被推翻了。毛泽东对清、慎、勤的解释，充分反映了他的为政之道和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与苏加诺总统强调一切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把自己溶于人民之中的精神又是那样的吻合。由此可见，苏加诺下榻勤政殿不仅是一种极高的外交礼遇，也是毛泽东独具匠心的有意安排。9 月 30 日下午 6 时，稍事休息的苏加诺及其一行，就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敢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家一向十分尊重。在他看来，苏加诺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领导印度尼西亚人民为结束殖民统治，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团结进行了不屈下挠的斗争，最终才使被殖民主义者统治了 350 年之久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获得自由，为此人民称他为“独立之父”。他在万隆会议上的著名演说“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不仅震动了肚界，同时也牵动了毛泽东的思绪。特别是他不久前在美国国会讲坛上发表的严厉谴责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罪行的演说，更引起毛泽东的赞许和钦佩。因此，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他说：“万隆会议是一次极好的会议。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苏加诺对毛泽东的观点亦有同感，肯定地回答说：“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万隆会议。”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是代表了整个亚洲。”毛泽东对苏加诺的气魄与胆识表示赞赏。

苏加诺自信地说：“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补充说，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苏加诺总统回答说：“一般地说，美国人欢迎得还是相当热烈的。但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不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六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对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早有考虑，也是国际上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毛泽东很想听听苏加诺总统的看法：“你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苏加诺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

毛泽东却若有所思，下紧不慢他说：“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接着两位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真诚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苏加诺认为，联合国没有中国参加，帝国主义会更猖狂。中国参加以后，可以反对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认为，中国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六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中只能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能有两个。如果联合国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毛泽东接着分析说，现在我们是大国，不是强国，人家看不起我们，又何必急呢？我们做工作，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半个欧洲，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毛泽东还认为，解除禁运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有的无非是苹果、花生、猪鬃、大豆。我们可以等11年，到那时，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禁运解除了，进入联合国了，美国人来中国一看会后悔的。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台湾的前途，毛泽东认为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通向北京。根据整个国际局势，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所抛弃。我们要同他们恢复友好合作，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

对于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灵活的斗争策略，深入浅出的精辟分析和幽默风趣的话语，苏加诺深感钦佩。他说：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谈话中，他曾三次称赞毛泽东真是“孔夫子的得意门生”。

两位领导人平等交谈，直抒胸意，越谈越亲切，越谈越接近。会见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共进晚餐。不知不觉间，日落西山，勤政殿亮起了和谐的灯光。

不断加深的友谊

苏加诺与毛泽东的友好交谈，加深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30日晚，毛泽东与苏加诺一同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当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步入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席间，苏加诺按照中国的礼节，高高举起酒杯。热情地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庆贺中国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对苏加诺的良好祝愿，表示谢意，并祝苏加诺总统身体健康，祝

印度尼西亚民族昌盛，繁荣富强。友好之情，溢于言表。

10月1日，毛泽东和苏加诺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阅兵和观看北京50万人大游行。苏加诺站在毛泽东身旁，看着冒雨接受检阅的各军兵种及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广场；看着显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巨大图表和模型从天安门前经过，看到广场上被彩色汽球腾空托起的“世界和平万岁”的巨幅标语，听着广场上各界群众对毛泽东主席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他心情无比激动。

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来访的苏加诺总统。席间，他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歌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毛泽东高度评价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指出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相互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指出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称此次访华确定的增进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个难完成。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后，酷爱京剧艺术的毛泽东又邀请苏加诺总统一同欣赏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采表演，把中国的传统艺术，兴致勃勃地介绍给苏加诺总统。

10月6日清晨，毛泽东通宵达旦地工作了一夜。他走出丰泽园，迎着初升的太阳，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转身向勤政殿望去，下榻在这里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将于今天告别北京，去外地参观访问。几天来，毛泽东在这位被称为印尼“独立之父”的总统在诚挚、谅解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就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毛泽东伸手看了看表，然后转身回屋，换了件衣服，他要亲自去机场，为苏加诺总统送行。

礼宾车从市区到机场，缓缓而行。苏加诺就要离开北京了。几天来，他参加了北京市三万人欢迎大会，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的友好会谈，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宴和宋庆龄的家宴，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参观游览了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热情友好的场面，听到的是友谊万岁的呼声。苏加诺是带着中国领导入深情厚意、带着六亿中国人民的友谊离京的。

机场上，毛泽东、苏加诺热烈握手话别。苏加诺向在场的一万多欢送群众宣布：“我已邀请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毛泽东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他对毛泽东说：“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主席接受了这一邀请，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却始终没能踏上千岛之国那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倒是苏加诺又分别于1961、1964年两次来华访问，同毛泽东这位老朋友亲切会面。

共同建造的桥梁

1956年10月15日，即将结束访华的苏加诺总统在云南昆明逗留，他坐在宾馆的沙发上，静静地思考着……

十几天来，他曾在东北重镇参观，黄埔江边驻足，中山陵前肃立，西子湖畔漫游。他先后参观访问了北京、辽宁、吉林、江苏、上海、浙江、广东、云南等省市，足迹几乎遍布半个中国。此时此刻，他感受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存在。“这是一个友好的民族，好客的民族，努力工作的民族，辛勤劳动的民族，团结一致的民族，热爱独立的民族和充满建设精神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结为一个整体的六亿人民，她将永远屹立在世界上，总有一天，全世界都要承认她。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走到写字台前，庄重地签署了给毛泽东主席的感谢信，并重申对毛泽东访问印尼的邀请。

苏加诺访华的 16 天，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算作短短的一瞬。在评价这次访华时，跟随总统访华的阿卜杜加尼外长说：苏加诺是一个工程师，他没有去建筑钢铁的桥梁。而在中国，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各国友好桥梁的建设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则说：“毛泽东和苏加诺的会见，把 6 亿中国人民和 8200 万印尼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越过高山，越过大洋联结起来，这座人民的友谊桥是推不倒的，万古长存的。”

（方亮文勇）

乐莫乐兮新相知

——毛泽东与尼赫鲁

1954年，尼赫鲁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席十分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盛情款待，坦诚会谈。尼赫鲁先生多次表示自己感动不已，如同遇到了故旧新知。

尼赫鲁说：“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1954年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中南海勤政殿。

毛泽东主席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尼赫鲁总理的手：“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笑容可掬的印度总理连连说：“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

会谈中，毛泽东对于这位来自南面邻邦大国的贵宾，表现得极为真诚和坦率。他回顾了中、印两个泱泱大国，又是世界文明古国，都受到过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欺侮的历史，结论是：决不能再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他对尼赫鲁总理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毛泽东以他的战略思想来说明一个问题：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顶住外来的威胁和欺压，才能赢得和平。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虽然贫困，但团结友好，其力量是无穷的，根本不怕别人瞧不起。

诞生仅仅5年的新中国，继承的遗产无非是贫穷和落后。一个农业国家，几乎没有工业可言。人民群众在改天换地之后，迸发出极大的建设国家、改善生活的热情。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把握和利用好这一点，努力使国家发展壮大，提高人民群众在新国家新制度下的生活水平，是新中国的领导者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和平，和平的时间越长越有利。毛泽东对尼赫鲁总理这样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一目标的，我们就能与其合作。”

征战二十多年，经受二万五千里长期磨难的毛泽东以及其他新中国领导人，为争取和平而不懈努力。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的友好关系。同时，中国团结一切不以中国为敌的国家和力量，尤其注重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团结。

1954年6月，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与印、缅总理联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印、中缅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五项原则，后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承认，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准则。

中国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中印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奉行睦邻政策的重点。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毛泽东的激情感染了尼赫鲁，他与毛泽东产生了共鸣。这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为使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921年到1945年，曾10次被捕入狱，尝尽铁窗生涯之苦。他深知维护和平的重要。只有和平，才能保卫和巩固胜利果实；只有使国家强大，才能永远摆脱受欺侮受凌辱的境地。创造和平的机遇，寻求发展的有利条件，成为这位印度总理的奋斗目标。他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第一次提出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他又成为万隆亚非会议和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在访华前一个月，在印度国会的发言中，尼赫鲁总理说道：“印度的政策是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和平地区，假若可能的话，也在其他地方建立一个和平地区。”无疑，搞好与中国的关系，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访华前夕，他在勒克瑙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很高兴他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了。”他指出，如果所有国家都承认印中两国总理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么目前世界上的恐惧，疑虑和互不信任就会力较好的，较健全的关系所代替。”

中国和印度，自远古以来，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文化和经济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印度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印建交初期，双方不仅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看法，而且在不少外交斗争场合互相配合，积极合作。例如，中国声援印度收复果阿，印度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不赞成联合国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中国基于对印度的信任，曾通过印度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后来又建议由印度担任朝鲜中立国遣反委员会的主席。中国还曾委托印度协助处理在美国的中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中印之间的关系，是友好、和平、相互充分信任的。

围绕着和平与友好这一主题，在中南海勤政殿里，毛泽东主席与尼赫鲁总理的会谈，进行得相当和谐融洽，他们的观点十分一致或者非常接近。大国、穷国以及有许多共同点的两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本国的利益，从世界局势和地缘战略出发，切磋交流，谈笑风生。

毛泽东提醒面前的这位印度朋友，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美国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战争。对此，毛泽东虽然在战略上采取藐视的态度，但在战术上是绝不大意的。

尼赫鲁说，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象一切既得利益者一样，美国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辛辣指出：“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微笑着点了点头，显得温文尔雅。

毛泽东强调，要专门谈谈战争；尼赫鲁认为，谈战争也是为了和平。

这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下午，首都北京中山公园内张灯结彩。两万多名北京市民，参加在这里举行的首都人民欢迎尼赫鲁总理访华大会。

尼赫鲁总理在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陪同下，信步来到音乐堂前。音乐堂里传出悠扬悦耳的中国歌曲和印度歌曲，使尼赫鲁总理欣赏到异国情调又感受到家乡气息。他停住脚步，转身向欢迎他的人群招手致意。此时，尼赫鲁先生内心激动不已，深为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所感动。音乐堂门前悬挂着中国和印度国旗。入门，巨幅深绿底板镶着白字的标语，分别用中文和印地文书写着“中印友好万岁！”“和平万岁！”

“和平万岁！”尼赫鲁仔细端详这幅标语。和平当然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是国家利益所在，是人民利益所在。望着这幅标语，他内心涌上一股喜悦的情绪。关于和平，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他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共识。他想，印度需要和平，中国也需要和平，没人需要战争，因为那会遇到很多危险。然而，就是这位毛泽东，却提议要专门谈谈战争。尼赫鲁先生迅速地开动脑筋，对将与毛泽东进行谈话的思路加以清理。他明白，谈战争，也是为了和平。这一点，他相信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显得有些拥挤的书房里，要和尼赫鲁总理谈战争问题。上次会谈快要结束时，他向尼赫鲁提出专门谈一回战争的建议。打算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进行探讨，向印度总理阐述关于殖民主义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二战后谁受益了谁受损了，战争应该避免，但并不可怕，侵略者早晚要受到削弱，受到惩罚等问题。

当两国领导人面对面坐下来，毛泽东向尼赫鲁询问与周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尼赫鲁总理说：“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好象没有多少架好吵。”然后，他马上转入他早已准备好的谈话主题。

律师出身的尼赫鲁，是圣雄甘地的忠实信徒，曾坚强不屈地执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对与毛泽东谈战争问题，他饶有兴致，愿与毛泽东共同讨论。他称毛泽东是这方面的专家，其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尊重。

在毛泽东的眼里，战争并不那么可怕。他深信，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因为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力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先生的思维有着严谨的逻辑性，并颇具人道主义色彩。他认可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战争的后果，那就是战争给人本身造成的影响。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但战争也

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说，“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挥洒着他的幽默与机敏：“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十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良好的永久和平的愿望：“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无意让谁担保，这样的事，怎么担保得了呢。他只是坚持一点，战争会削弱侵略者，而中国，并不害怕战争。

“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推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这场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里进行的。毛泽东和尼赫鲁深邃精辟地谈论着这个残酷的话题。他们谈得很投机，很愉快，表现得很投入，又很超然。

毛泽东引用屈原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为尼赫鲁送行

依依惜别情。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千古绝唱“相见时难别亦难”来形容毛泽东与尼赫鲁的告别，是恰如其分的。

对北京一个星期的访问结束了，已赫鲁总理将到华东、华南等地参观后回国。现在，尼赫鲁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一位印度未来的总理，以及其他随同访华的印度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主人告别。这里是尼赫鲁总理与毛泽东主席首次见面的地方，如今又成了他们分别的场所。来辞行的尼赫鲁总理感慨良多。他说：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大的友情。他深情地表示：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中国了。

充满激情而又才学渊博的毛泽东，此时引用中国古代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诗句，赠予尼赫鲁。他吟诵道：“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尼赫鲁非常欣赏毛泽东所吟诵的诗句，认为太适合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了。不仅如此，他又进行了升华，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也许谁都会如此联想，两个人，两个国家成了朋友和相知，那么存在其间的任何困难和障碍，都不会成为什么问题，都会容易解决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感人的场面。尼赫鲁在即将完成对中国的友好、愉快的访问的时候，向主人话别，宾主情真意切，恋恋不舍。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玄奘法师，曾经千辛万苦，到西天（印度）取经。而今中国主人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来自佛教发源国的总理尼赫鲁先生，从中印两国友好与和平出发，继礼仪之邦之传统，尽东道主之所能，为其访华顺

利、成功，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临行的尼赫鲁总理自然会记得，当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盛情和友好包围了。来京前，在广州和武汉，中国地方领导人非常隆重地欢迎他。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等党、政、军许多高级领导人和全国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界人士组成一支庞大的欢迎队伍，前往机场迎接。沿途是20多万人的欢迎人群以及无数的鲜花彩带。几乎所有在北京的中国省部级以上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参预了尼赫鲁总理访华的接待工作。毛泽东主席3次与尼赫鲁总理会谈，并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使这位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总理先生感慨不已。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的深刻广泛交流和讨论。令尼赫鲁终生难忘。中国领导人谦虚的态度。坦荡的胸怀，独到的见解，给尼赫鲁留下了深刻印象。尼赫鲁先生曾经多次表示，来到中国，就生活在友谊、款待和热情中了。他说：“我感动极了”，“我无法告诉诸位我受到多深的感动。我认为这种热烈欢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访问者的表现，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不难理解，这种象征意义的内涵，当然就是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

在北京机场，飞机就要起飞了。尼赫鲁先生神采奕奕，与到机场送行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作最后的告别。他是那样热情洋溢，以致讲话时声音部有些颤抖。他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了，我满怀着良好的记忆和我对于你们的谢意而离开这里。我将牢记不忘这一切。我相信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更加接近。我相信印度人民非常感激你们对于作为他们代表的我，所给予的光荣。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 and 人民，我愿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激。”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距离后，渐渐离开地面，然后傲然翘首，直冲云天。尼赫鲁先生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把印度人民的友谊留给了中国。

（树国）

同心栽培友谊花

——毛泽东与斯大林

两位伟人的历史性会见

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车站建筑物上挂满了鲜艳的中苏两国国旗，威武雄壮的三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依次排列在车站的广场上。不知是东道主的有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一列专车刚刚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大楼里的钟声就“噹噹噹”地响了起来，时针正指向中午12点。

一位身材伟岸的人走下车厢。他就是莫斯科今天要迎接的尊贵客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罗申等到车站迎接，他们由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介绍，同毛泽东——握手。

由于气候寒冷，欢迎仪式一切从简。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检阅了仪仗队。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随后驱车前往代表团下榻的斯大林别墅。

一个伟大的时刻来到了！当日下午六点整，克里姆林富斯大林会客室，苏联党政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走进门来，正式会见中国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从未晤过面的伟人相互之间对视了片刻，他们不经介绍，就互相迎上前去。

“您好！欢迎您的光临！”斯大林亲切地问候。

“非常高兴见到您！”毛泽东热情地回答。

两双扭转乾坤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莫斯科会晤，不是一般性的外事会见。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中苏两国本身，这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情。会见的一方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之一，领导两亿苏联人民前进的最高统帅；而另一方是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的伟大领袖。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会晤。毛泽东深知，这次会晤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英勇抗敌，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见，让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之震惊和恐惧。

历史的回顾

凝视着这位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人，斯大林赞不绝口，由衷地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听到这儿，毛泽东万般感慨地答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泽东言犹未尽，斯大林却迅速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即使不知情者，大概也能从斯大林的话中多多少少听出点弦外之音。的确，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深深打上了斯大林的个人烙印。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同苏联领导人节拍之间的不和谐，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位外国记者曾不无感慨地说，毛泽

东与斯大林确实是一对不打不相识的“冤家”。

说冤家无疑是过分了。无论是毛泽东也好，斯大林也罢，他们都是矢志终身为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在中国革命如何搞的具体问题上，他们之间就不那么吻合了，甚至有过严重的分歧。有分歧就必然有矛盾和斗争。毛泽东从来不否认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但这位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革命家，无疑比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更清楚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历史上，共产国际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集权性。只要越雷池一步，轻则罢官免职，重则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与共产国际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少数，而毛泽东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却一错再错，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等人，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妥协，退让，因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敌人的枪弹之下。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败了。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做法深为不满。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得革命力量不断壮大。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这时竟派来一个既无革命经验，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者王明，让他执掌党的领导权，排挤毛泽东，免去其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中国革命在上明和共产国际所谓的军事代表李德的错误指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失败，红军队伍损失90%，白区力量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危难中拯救了中国革命，尽管‘斯大林对于毛泽东这位从山沟里出来的革命家是否能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仍抱怀疑态度，但终究看到王明等人确实不争气。斯大林默许了毛泽东未经他同意而获得的领导权。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和斯大林再次发生意见分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担心：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会导致中国的分裂。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回电斯大林，阐述了我党对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表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贯彻“国际路线”，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曾经规劝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而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夕的几次国际性会晤上，同蒋介石达成的秘密协议，更是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

然而，斯大林到底是一个知错认错，有错能纠的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7月，在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一再表示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错误。他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回答：“没有。”斯大林诚恳地感慨道：“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这时的斯大林一点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态度十分严肃，深感内疚。他还对客人不住地称赞，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都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

当着客人的面公开承认自己有错、赞扬别人有水平。这对处于权力巅峰的斯大林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乘车进京。他一脚刚踏入车门，一只脚还在地上，就扭头望着周恩来，幽默他说：“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心领神会地微笑着点头：“我们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很清楚：这可不是一次容易通过的考试，失败了没有退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接管的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经济衰败，百业凋敝，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人们忍饥挨饿，社会百孔千疮。另一方面，美国同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采取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的敌视政策。国民党残余势力盘据台湾，随时配合两方势力，兴风作浪，妄图把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新兴国家怎样生存、发展，成为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结盟，这是中国政府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决策。

1949年10月初，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来到北京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中国建设表示热烈欢迎。

1949年12月，建国才一个半月，毛泽东就把一大堆国内事务留给刘少奇处理，自己率团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进行最高级会晤。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充分肯定，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中加重了砝码，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斯大林转而关切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毛泽东以他那惯有的幽默和诙谐回答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尽管中方翻译作了较灵活的翻译。然而，直率有余的东道主们还是被毛泽东那看似具体、实有所寓的暗示给难住了。贝利亚竟不知深浅地笑出声来。而斯大林却在仔细琢磨毛泽东的话，并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他想让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仍未解其意，反问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想：无论苏中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理应由他这位苏联统帅和另一个代表中国人民的首领毛泽东来亲自签署。至于签订什么样的条约，苏中双方可以商谈。在历史教训面前，苏方不愿再犯以往的错误。而毛泽东对此则有着他周密的考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这是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让周恩来这位卓越的外交家，自己的亲密助手来苏，可以在起草中苏条约的过程中，更好地同苏方打交道，同时也给自己与斯大林最后定夺留下回旋余地。

1950年元旦，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他的首次访苏目的：商谈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讨论对华贷款、两国贸易等问题。毛泽东在招待会上的谈话，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震动很大。

斯大林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让周恩来来莫斯科，着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外长级会谈。周总理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字、逐句的研究、斟酌和修改，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出发，仔细推敲。

中国共产党十分珍视中苏之间的兄弟友谊。祝贺斯大林的70大寿，成为毛泽东访苏的另一重要目的。为了表达对斯大林的崇高敬意，在访苏之前，我国就准备了丰盛的礼物。毛泽东亲自起草给山东分局的电报，要求调购山

东出产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梨共两万斤作为寿礼。并从江西、湖南征调湘绣、瓷器、茶叶、竹笋等大量土特产品，装满了一节车厢，运往苏联。值得一提的是，为此，当时还出了点小小的插曲：“东北王”高岗、中南党政军首领林彪，为了争宠斯大林，自作主张，张罗了好几车皮礼物，准备运往苏联。毛泽东发觉后，制止了他们的做法。把礼物退回沈阳。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之日，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兄弟党的领导们纷纷前来祝贺。毛泽东紧挨着斯大林坐在一起。怀着对这位领袖的深深敬意，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在观看文艺演出时，两位伟人同坐一个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起立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和毛泽东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充分体现出中苏两国人民的真挚情谊。

1950年2月14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方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等领导人参加。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等党政要员。同时签署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条约。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随后，站在最中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耀眼的闪光灯下紧紧握手，互相祝贺。

历史证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它不仅对于巩固中苏邦交，促进两个大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使中国获得了苏联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坚决支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孤立中国的反动政策。就连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及新闻机构也惊呼：中苏条约“必然会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强有力武器”。它“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美国“国务院伤心地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噩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奠定了中国50年代前期外交政策的基础，为甲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总的来讲，在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的建设帮助是巨大的。斯大林派了大批专家来华，给予中国大笔贷款，帮助中国的各项建设，其中有48个工程项目都由苏联方面提供无私帮助。可以看得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诚恳的。

毛泽东主席离苏前夕，王稼祥大使为毛泽东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贵宾的尊敬，斯大林率领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破例应邀出席招待会，客人们都惊呆了。连苏联官方都承认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仅有的一次。毛泽东在事前就关照过斯大林，如果身体不支，可以随时提前退席。然而，斯大林还是礼貌地坚持到底，斯大林的这一举动，使世界舆论和西方政界人士从中看出毛泽东和中国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

苏联之行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出访，也是他与斯大林的唯一一次会晤。当毛泽东的专列就要驶入中国境内时，历史已经为这次关键性的访问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开始了中苏友好关系的蜜月时期。

战火的考验

几十年的战火硝烟结束了，该是共和国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的时候了。然而，无情的现实又一次打破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招牌，纠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美国同时派第7舰队进入我国台湾海峡，插足我国领土台湾。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与李承晚军队配合，对朝鲜人民军南北夹攻，越过三八线，侵占平壤，战火很快蔓延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朝鲜形势急转直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毛泽东、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当美李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严正声明：中国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对自己邻国的侵略行为，决不会坐视日益紧张的朝鲜局势。10月1日，金日成给毛泽东发来求援电报，请求中国特别援助，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作战。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苏联也十分关心朝鲜局势。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询问我在东北边境兵力部署情况，能否出兵助金日成一臂之力。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中国的国家安全考虑，毛泽东复电斯大林：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作战，以支援北朝鲜，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

在当时现实情况下，对毛泽东来讲，作出参战决定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满目疮痍，百业待兴，饱经几十年战争之苦的劳动人民渴望和平安定，以恢复和发展经济，过上幸福生活。另外，党和政府又不能不正视另一种现实，既然中国要派兵在朝鲜同美军交战，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有可能成为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因此，出兵朝鲜必须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当机立断，派周恩来秘密前往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探询苏方的态度。

对于朝鲜问题，应该说，斯大林和苏联是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的。在联合国安理会，苏联拒绝参与对朝鲜问题的表决，以示抗议。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亮出了苏方对待朝鲜战争的底牌：苏联声明过苏军已全部从朝鲜撤出，再派兵有困难，这等于直接同美国交战。我们可以在中国派兵的条件下，给中方供应武器装备，同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毛泽东明白了：在朝鲜问题上，斯大林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不愿出兵，归根结底，还是怕苏联卷入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担心酿成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而毛泽东估计，5至15年内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才发觉毛泽东的预言是对的。

决心已下，管它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我们偏要摸摸它的屁股，中国人民就是有这种气魄。1950年10月25日，毛泽东命令彭德怀率领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同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决一雌雄。到1951年6月，先后发动5次重大战役。美军被赶到三八线的南侧，双方战略成对峙状态。美国侵略军猖狂气焰遭到中朝军队的沉重打击，傲慢的杜鲁门到底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只好求助于斯大林，要求双方停战，签订协议。斯大林请求毛泽东给美国一个体面台阶。

抗美援朝的目的已经达到，毛泽东同意停战。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蜜月之后的中苏关系也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毛泽东沉痛悼念斯大林

生老病死是人类生命运动的必然规律，尽管个人崇拜的狂潮一直把斯大林当作神来敬仰，但他是不可能“万寿无疆”的。1953年3月5日，从遥远的莫斯科传来了令千百万人震惊的不幸消息：斯大林逝世了！

毛泽东在获悉斯大林不幸逝世的当天，立即率领朱德、周恩来等党政主要领导人，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对斯大林的无限沉痛悼念和崇敬之情。毛泽东还亲自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哀悼期间，全国所有部门、单位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并下半旗致哀。毛泽东随后派周恩来代表他前往苏联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为表达对斯大林的怀念，毛泽东在3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最伟大的友谊》，对斯大林的一生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崇高的智慧。我们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最真挚的朋友而感到无限悲痛。毛泽东坚定地表示，要把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永远保持下去。

3月9日，在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追悼大会的同一天，北京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60万人的追悼大会，并要求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悼念活动，以哀悼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对斯大林的逝世，毛泽东是十分悲痛的。尽管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几十年的中国革命中。对毛泽东存有不少的怀疑、误解与不信任，甚至有过压制和排挤。但毛泽东早已摆脱了这些历史的恩怨。随着1949年底的那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会晤，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敬仰斯大林，斯大林也很敬重毛泽东。斯大林一向比较傲慢。而对于毛泽东，他则完全不同，他很尊重这位东方大国的领袖，重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尤其是俄文版的发行，同斯大林的关心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斯大林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凡是涉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事情，无论巨细，他都亲自过问，亲自处理。这充分表现出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敬重，对中国的重视。

（唐海军）

从友好走向破裂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夕阳近黄昏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毛泽东曾经引用过的一句唐代诗句。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同苏联新领导的相互往来仍很频繁。但是，中苏之间的这种亲善，已似“夕阳近黄昏”。

中苏友好是中国 50 年代对外政策的基础，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密切注视着苏联政局的变化。情况很快明朗化：10 天之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53 年 9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成为苏联的领导者。

毛泽东希望中苏之间的友谊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作为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也希望如此。赫鲁晓夫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怀有浓厚兴趣，他很想了解中国。毛泽东也想让赫鲁晓夫来中国看看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在中国国庆 5 周年前夕，赫鲁晓夫被邀请来华访问。

1954 年 9 月 29 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率领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官员乘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我国国庆庆典。这毕竟是自苏联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访华。中国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贵宾，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赫鲁晓夫的到来为舆论界所注目。第二天，毛泽东主席率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出席了国庆庆祝大会、阅兵式、宴会等一系列活动。中国方面始终把赫鲁晓夫安排在毛泽东身旁。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的会谈，一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诚恳地对苏联领导人说：我们之间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应多加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国内事务和经济建设上，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毛泽东兄弟般的一片肺腑之言，使赫鲁晓夫十分赞赏。

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是富于成果的。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联合宣言》、《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各股份公司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等 8 个文件。同时，苏方给予中国 5.2 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赠送中国一批农业机械设备。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兄弟友谊在两国领导人的关怀下仍在开花结果。

光阴荏苒，伟大的十月革命 40 周年到来了。苏方邀请中国领导人前往参加庆典。出于对中苏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巩固和发展不易得来的中苏友谊这一大局考虑，1957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登上了飞往苏联的专机。

毛泽东对那一套繁琐的外交礼仪总不大习惯。他对于 8 年前在莫斯科车站的欢迎仪式仍记忆犹新。毛泽东在这次出访前，特别让人提请苏方，最好免了那一套。可是，到 11 月 3 日，当毛泽东走下飞机后，看到的是：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依次列队迎接，仪仗队整齐以待。毛泽东有点不满地责怪主人：为何还是搞得这么隆重。殷

勤的东道主赫鲁晓夫耐心地解释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象毛泽东您这样的客人来了，礼遇是不能简化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庆典期间，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68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相继召开。各国党的领袖签署了著名的《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毛泽东在随后的酒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对这一形象的比喻，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借助于莫斯科大学的讲坛，毛泽东精辟地表达了他对国际共运形势的看法。这位中国领导人声称，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两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标志着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发生转折，新世界的力量超过了旧世界。坚信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对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的激情演说，深深感染着革命的后一代。大礼堂的气氛是热烈而欢快的。面对着在场的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心潮滚滚，即席发表了一段至理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风趣而深邃的话语，博得留学生阵阵笑声和掌声。毛泽东慈祥、和蔼地望着这批年轻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希望啊！确实，我们的现任的不少中央、省部级领导以及各条战线的许多骨干，当时不就是在场的一员吗？

半个多月的访苏活动结束了，毛泽东一行启程回国，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几百人到莫斯科30公里之外的伏努科夫机场送行。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苏关系。但明摆着的客观现实是，必须妥善地处理同苏联领导人，尤其是同苏联的第一把手赫鲁晓夫的关系。赫鲁晓夫，1894年生于俄罗斯的一个矿工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未受过更多教育。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显得愚昧无知，粗鲁野蛮，莽撞无礼。失态之时，甚至会在联合国的讲台上，脱下皮鞋，敲打桌子，与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应有的风度和修养实不相称。当然，也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头脑反应还灵敏，善于思考，点子不少。但作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有一个致命弱点，他容易感情冲动，浮躁轻率，信口开河，只凭主观臆想办事。这不知伤害了多少兄弟党领导人的感情，也使与之打交道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大为惊愕。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有几面之交，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一些了解。赫鲁晓夫执政前期，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毛主席曾诚挚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上台，我们很高兴，觉得他有希望”。“1954年第一次会晤，就很谈得来。”

出于对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尊重和爱护，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时曾语重心长地提醒赫鲁晓夫：对兄弟党不要干涉太多，会束缚人家的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赫鲁晓夫皱起眉头，听了几句翻译，不入耳，就不耐烦地把手一挥：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赫鲁晓夫尽管不耐烦，毛泽东仍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各国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毛泽东的这些逆耳忠言，赫鲁晓夫是听不进去的。

毛泽东是好心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对于赫鲁晓夫的弱点是不怀善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人士、新闻记者利用一切机会、场合，抓住赫鲁晓夫的缺点，讲话的漏洞，失态丢丑的举止大做文章，广为散布，乃至挑拨离间，制造紧张气氛，唯恐天下不乱。毛泽东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赫鲁晓夫这个人确实能捅漏子。自他上台以来，国内风云变化自不必说，国际共运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各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日子也弄得实在不好过，象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苏关系也日益紧张起来。

慢慢撕开的裂痕

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关系的蜜月随之成为历史。狂风与大浪，不时地向中苏友谊之船阵阵袭来。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他以一副慷慨大方之态，主动问及中方：“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我们也不想搞核武器试验。毫无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这一要求给惊呆了，片刻后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有苏联这个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毫不掩饰地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又是占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经常用核武器进行讹诈，如果没有核武器是要吃亏的。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尽快搞出自己的核武器，这是中国党和政府的美好意愿。毛泽东没想到，赫鲁晓夫如此冷漠地拒绝了。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肆意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做法，他指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56年4月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批评了他的错误。对斯大林作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于澄清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然而，赫鲁晓夫认为，中共是要和他对着干，毛泽东要同他唱对台戏。

赫鲁晓夫在寻机“回报”毛泽东。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赫鲁晓夫故作为难似地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困难不小，技术人员不足，所以想撤回我们的专家。毛泽东吃惊了！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科技力量的苏联，难道就缺少在华建设的几千名专家吗？赫鲁晓夫是靠不住的了！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

在国际形势的认识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是有看法的。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期间，你美国等是纸老虎，不可怕。赫鲁晓夫困惑了，毛泽东是不是太轻敌了，美国怎么会是纸老虎呢？它可是拥有导弹、原子弹，能吃掉成千上万生命的真老虎呢！

从维护国际共运团结和中苏关系的大局出发，毛泽东一直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他多次向苏联领导声明：在国家关系上，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只要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在1957年访苏期间，毛泽东尽量多做兄弟党领导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坚持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支持苏共做大家的头。在68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谦逊他说：“赫鲁晓

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用这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了深刻的思想，从而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告诫他的助手：现在球在赫鲁晓夫手上，他要怎么抛，我们是无法左右的了。

“好斗的公鸡”不好惹

赫鲁晓夫来过中国三次。如果说，第一次来华是轻松，愉快的，并得到中国高规格的接待，那么，后两次的来访，气氛则大变，充满了迷漫“硝烟”的争执。

1958年是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一年。7月中旬，美国军队侵占黎巴嫩，英军进攻约旦，中东局势陡然紧张。同时，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叫嚷“反攻大陆”，蒋介石派机窜扰大陆。美国还命令其驻日本、南朝鲜的军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制造远东紧张气氛。

打着对付美国的牌子，而对此早自有打算的赫鲁晓夫认为机会来了，突然飞往北京，同中国领导入就中苏军事合作、台湾海峡等问题进行会谈。赫鲁晓夫一行于7月31日抵京，由于是秘密访问，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加上事先已知谈话的主题，气氛大不如以往，严肃沉闷。毛泽东没有像上次那样拥抱赫鲁晓夫，只是握手致意，互相寒暄。

由于急事在先，赫鲁晓夫一行未作任何休息，便驱车驶入中南海正式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开门见山询问苏联人：“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尤金在7月下旬曾向毛泽东转达苏联领导人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组建共同舰队的意图。面对毛泽东的责问，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意思解释清楚，然后自己慢悠悠地表白了一番：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将会出现的反应估计不足，正不着边际地谈论时，毛泽东突然抬头做了个打断的手势。显然，主人已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便语锋急转，直戳要害。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赫鲁晓夫吱吱唔唔，难以出口。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仍紧抓要害追问。赫鲁晓夫还是在漫无边际地解释：“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起身，责问赫鲁晓夫：“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作为客人的赫鲁晓夫脸立刻涨红，很不自然地答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怒气未减：“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赫鲁晓夫嘟囔地争辩说。毛泽东立即反驳：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明明是搞共同舰队！”赫鲁晓夫不厌其烦他说：“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解。”这是误解吗？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呀！

赫鲁晓夫不甘心空手而归，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严厉他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赫鲁晓夫这次也够沉得住气，表情恢复平和，不甘罢休：“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做基地。”“不要！”毛泽东态度强硬：“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

望着赫鲁晓夫那不能理解的目光，毛泽东像教小学生似的告诫他：“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绝望了。可以想象，他是带着许多的蓝图、设想而来的，自以为能满载而归。因为，从他的价值判断、思维逻辑而言：苏联可以在东欧其他的兄弟国家派军队、设基地，以保护他们。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同样需要苏联的保护和帮助。在中国建基地、组舰队、搞电台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另外，西方阵营中的美国，不也一样在各国中派兵、建基地吗？中国有何理由不答应呢？

只能说，赫鲁晓夫大大的错了，他不了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几乎都在中国派了兵，占了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也不例外。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压迫与欺凌。为了赶走外国占领军，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1949年，才最终赶跑了所有的外国军队，赢得了中国人民盼望多年的主权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

赫鲁晓夫不明白，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再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别国压力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会作主，也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打自己的主意。

毛泽东的敏感，毛泽东的愤怒，毛泽东维护主权的坚定立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而绝非赫鲁晓夫所言，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忘恩负义”。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前途，毛泽东确实表现出好斗、敢斗。这种斗，是必要的，也是任何时候所不能少的。当然，毛泽东也同世界上许多友好人士一样，爱好和平、向往和平，但争取和平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的。在中苏关系上，毛泽东一再声明：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不予支持。如果中苏双方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没有什么好谈的。

赫鲁晓夫“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在第二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再不敢谈共同舰队问题，话题转向国际形势方面。他有点讨好毛泽东似他说：中苏两国能否作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

睿智的毛泽东没有买赫鲁晓夫的帐。中肯地劝说他：“这样分工不行，各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

涉。”话语不多，但毛泽东的态度却十分明朗，我们决不去插手别国的内部事务，但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中国的内政。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这位苏联领导：“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最后，赫鲁晓夫只有败兴而归。

毕竟内外有别，也是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大局，中苏高层领导的争论没有公开比。赫鲁晓夫离京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公布了中苏首脑“会谈公报”。表示中苏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公报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中苏两国人民对此欢欣鼓舞。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为了粉碎美国染指我国领土台湾。8月23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赫鲁晓夫深恐这一举动会妨碍“苏美合作”，要求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这是中国的内政，毛泽东严正拒绝。

赫鲁晓夫似乎不计“前嫌”。一年后，即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之际，这位苏联领导人风尘仆仆地从美国华盛顿赶往北京，又同毛泽东会面了。

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名义是来参加庆典，实际上，赫鲁晓夫充当了西方的游说者和宣传员。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苏美戴维营会议的重大意义，把美国吹捧成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声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重视应当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同一年前访华时对美国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位苏共领导人还一个劲地夸赞美国是如何的富裕，工人也很富、很富。其羡慕的程度犹如一个小孩梦幻着遥远的地方那一片美妙无比的童话世界。毛泽东深沉而冷峻地望着得意洋洋的赫鲁晓夫，中肯他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并且怀疑地反问：“访问美国只带回这样一些东西”？只是被和平幻想所陶醉的赫鲁晓夫已听不进毛泽东的忠告了。他反而以一副封建家长式的姿态，责怪中国领导人，一下子抱怨中共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一会儿又埋怨我们在1958年8月炮击金门、马祖，这么大的事，没有事先同他招呼，造成世界局势紧张。赫鲁晓夫太健忘了，炮击金门，中方事先是对苏联打过招呼的。心血来潮的赫鲁晓夫又转而批评中国同印度总理尼赫鲁闹僵了，埋怨中国不该为那块不毛之地而大动干戈，不值得。“这是原则问题”！毛泽东愤然反驳。

碰壁后，赫鲁晓夫拿出所谓王牌来压中国了。在天安门城楼庆典休息时，这位苏联领导突然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撤回苏联核专家。在此前几个月，苏联已单方面宣布中苏核协议无效。毛泽东冷冷他说，由你们考虑就是了，撤回也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搞。

毛泽东明白，几次交往后，与赫鲁晓夫的共同点越来越少了。中苏关系的友好要寄希望于苏联这位领袖是不可能的了。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很难说什么时候又会突然作出影响中苏关系的断然行动。从赫鲁晓夫的举动中显示，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山雨欲来风满楼，摊牌的时候到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受了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大减产,国家经受暂时困难,人民生活艰难。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赫鲁晓夫落井下石。1960年夏天,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的近万名专家,并撕毁了343个专家援助合同,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还大量减少了对中国的成套设备中的关键部分的供应。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举动,使中国的科研、生产中途停顿,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建设正常进行。更让人撕心裂肺的是,赫鲁晓夫翻开旧帐,要求中国在三年内还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给予中国的武器、物资及其他款项……

困难是压不倒我们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再也不会屈服任何外来压力的。毛泽东告诫人民:“他(赫鲁晓夫)越压我们越要顶”!并对其身边工作人员郑重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这种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象一块强大的磁铁,对全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团结一心,一致对外。毛泽东向苏联宣布:三年的债务,我们一年还清。当时,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毛泽东与民同心。爱女李讷,经常饿得发慌,想多吃块馒头,也被毛泽东制止,决不让特殊。毛泽东并严厉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别人的孩子也是人,别人的孩子能做到的事,我毛泽东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做到?!

1960年11月,苏联召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散发各种材料,攻击、诽谤中共,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周恩来率团愤然退场回国,毛泽东特地到北京机场去迎接周恩来,这是毛泽东极少有过的举动,表示对周恩来的坚决支持。

对抗在步步加剧。1962年4—5月,苏联公然煽动几万中国公民跑向苏方边境,并策划新疆伊宁的武装暴乱。更让毛泽东愤慨的是,同年秋,赫鲁晓夫公开袒护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毛泽东领悟到,赫鲁晓夫已决意同他决裂。

随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全面争论走向公开化。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人所共知的“九评”。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到60年代末,中苏双方甚至发生领土冲突,从而大动干戈。亲者痛,仇者快。中苏之间闹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决不是两国人民所愿意看到的,这完全是苏联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造成的。

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源

无意去评论赫鲁晓夫的个人功过大小,历史学家自有一番公论。应当提及的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源,主要在于苏联领导人(自然包括赫鲁晓夫)头脑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霸权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赫鲁晓夫的悲剧之一在于:在中国问题上,他曾激烈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可最终又重蹈斯大林的覆辙。

毛泽东曾经同苏联两任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尽管同斯大林只有唯一的一次会晤,可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赫鲁晓夫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指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

对于中国问题，虽说斯大林也做过一些伤害中国共产党人感情的事，但毕竟到其晚年，他有勇气公开向中国领导人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努力改正，中苏友谊之花，到底还是在他临终前几年同毛泽东共同栽培起来的。而赫鲁晓夫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是更多的遗憾。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转眼已是 1964 年。赫鲁晓夫的种种做法和举动，不但为许多兄弟党人为之伤心，而且更为苏联党内的高层领导所无法容忍。10 月 15 日，赫鲁晓夫被党内同僚勃列日涅夫、谢列平、苏斯洛夫等人赶下了台。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西方舆论界声称这是对毛泽东的双重胜利。多少重胜利且不去管，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已有很大的改变，他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对华政策的一举一动。

（李文晶）

志同道合有隐忧 ——毛泽东与尤金

《毛选》之缘

1950年2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中，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视，斯大林主动向中国客人建议，把毛泽东所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正好毛泽东也有此意，他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功底强的同志来帮助完成文稿的编辑工作。热心的主人立即答应派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来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此后的岁月里，尤金，这位苏联理论专家同中国领袖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半年之后，奉斯大林之命，尤金来到北京，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与审稿工作。这位哲学家承认，他对中国问题了解不多，但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研究后，增加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历史、理论、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东方文化颇感兴趣。尤金很推崇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看得入迷，赞叹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理论家，视毛泽东为学术知音。欣喜之余，尤金请求主人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被誉为最权威的理论家，国内外政界的多少政论文章，他瞧不上眼，但对于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认真阅读后，他折服了，并把它交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该杂志先后予以公开发表，在苏联引起很大轰动。毛泽东对此也很高兴，专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时的尤金，已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尤金的工作。两个月很快过去，而尤金的使命还未完成。为此，毛泽东专门给斯大林致电，要求延长尤金在华的工作时间，同时希望让这位理论家到中国的部分大中城市，给中共干部做政治理论报告和演讲。斯大林十分爽快地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让尤金留到年底。上海、杭州、广州、西安等地都留下了尤金那风尘仆仆的身影。《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论苏联逐步到社会主义》、《东欧和中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篇篇出自尤金之手文章，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

好朋友回国，少不了主人的热情欢送。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同尤金进行了一次长谈。无疑，主题就是双方都关注的《毛泽东选集》问题。尤金告诉毛主席，他对《毛选》评价很高，认为有许多独到之处，俄文版的发行，肯定会引起轰动。只是这位一贯以严谨著称的哲学家对毛泽东那生动、形象，具有大众特色的词句，诸如：“一屁股蹲下，坐在坑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云云，多有微词，担心难登大雅之堂，并解释说外国的读者是很难领悟其真正含义的。至于毛泽东最后如何采纳，他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对这位学者颇有好感，毛泽东希望尤金再次来华工作，客人愉快地答应了，并打算携带家眷来华长住。

毛泽东忘不了，尤金返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时，说了我们的许多好话，

声称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来猜疑心重的斯大林，在尤金这位诚实的学者的赞词之下，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信任。

尊贵的客人

毕竟是知音难得，仅仅离别半年，毛泽东就又邀请尤金访华。1951年7月，尤金携夫人季娜再次访华，受到超规格的接待。热情的东道主把尤金夫妇安排在景山后街。这原是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时期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内有花园，小游泳池，环境幽静。

作为毛泽东的尊贵客人，尤金并不是苏联政权的显贵，可能大部分中国平民百姓对之陌生。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1899年生于俄罗斯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列宁格勒的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他长期在苏联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并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还任职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尤金再次来华，任务有三：一是到东北、华北各地向党政干部作讲演；二是帮助中国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情况；再就是审阅《毛选》的一些文章，指导翻译工作。为了方便客人，毛泽东专门指派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陪同客人讲演、参观。毛泽东还亲自安排尤金夫妇去青岛疗养。旅行回京后，这位勤勉的学者忘不了把自己的观感印象汇报给毛泽东，使主人大为愉悦。

与后来当大使时相比，尤金的这次来华工作是轻松、愉快的。

好客的毛泽东完全把尤金夫妇当作自己的私人客人，经常抽空拜访他们，并陪同他们散步。当然，更多的还是趣味相投的广泛交谈。哲学自然成为谈论的主题：辩证法、物理、生理学现象、原子、中子、质子、电子之源……两位哲人侃侃而谈，津津乐道，甚至在宴席上也交谈不断，似有说不完的话题。此时，他们的关系已十分融洽。对尤金来说，真是异国遇知音啊！

“书生”大使

怕当“官”，这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人数不少，毛泽东的常住客人尤金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很多事情，不一定都能随自己意愿。

1953年12月2日，苏联任命尤金为苏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接替前任大使库兹涅佐夫。

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这确实出乎尤金本人和毛泽东的意外。当大使，对尤金这个书生来说，无疑是秀才挂帅。他既不懂多少外交，又不善于处理国事。然而，白纸黑字的任命书就在眼前。这一主意无疑来自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新领导者明白：尤金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同中方打交道，派毛泽东不熟悉的大使，办事不方便。这样，从1953年到1959年，尤金开始了他长达6年的大使生涯。

对于尤金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清楚的。我们欢迎他，支持他。就任大使后，尤金本应住在大使馆，但他希望仍住在景山后街，中方破例同意了请求。

1953年12月14日，这位新大使到外交部拜会周恩来外长。第二天，他又第一次以官方身分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在给毛泽东的致颂词中，大使表示：他将不惜自己的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伟

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毛主席在热情洋溢的致答词中告诉大使：中国一贯十分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充当大使后，尤金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仍是三句不离本行。有一次，尤金同毛泽东谈完公事后，毛泽东专门把他留下来，还是老话重谈——哲学问题。在谈到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若有所感他说：“现象与本质有时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现象常常掩盖着本质，使人们不易洞察其真实面目。”已经作为大使的哲学家，这次不知有没有察觉毛泽东的话外之音。

尤金是诚实而直率之人，他没有一般外交家那种狡黠圆滑与察颜观色，他坦荡实在，毫不做作，这一点倍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

50年代初，高岗权力欲膨胀，以功臣自居，突出自己，搞独立王国，并同饶漱石结党营私，搞地下活动，对抗中央。毛泽东早已洞察其奸。1954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尤金大使时，有意识地透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重要情况，目的是暗示苏方要有思想准备。高岗同苏联关系密切，毛泽东是很清楚的。客人的这次来访，主要是高岗陪同。尤金感觉出中共党内可能有些问题，但由于主席并未点名，使得不知内情的大使还是如坠云雾。直到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周恩来召见尤金时，憨厚的大使才恍然大悟。

尤金的大使任期经历了中苏关系由亲善向不和，又走向破裂的时期。从个人私交来说，尤金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是亲密的，特别与毛泽东，更是亲密。然而，作为大使，他的使命，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必须按莫斯科的旨意行事，服从上级的命令。固然，后来赫鲁晓夫对中方的种种异常举动，不但让中国领导人大大为愤怒，而且也使这位大使甚感困惑。到他大使任期的后期，尤金感到的不再是作为中国客人时的那种愉悦、欢心和无忧无虑，而是不尽的烦恼、无奈和不安。这时大使的使命成为单纯的苏中首脑信息的传递者。就是这一差使，赫鲁晓夫还怨尤金不称职。

1958年7月下旬，尤金奉命求见毛主席，转达苏联领导人想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组建共同舰队的意图。毕竟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当毛泽东听完翻译后，顿时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好几秒钟后，突然严肃地问大使：“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毛泽东遏制怒火：“你讲不清，让赫鲁晓夫自己来讲！”第二天，毛泽东召见尤金，阐述问题的严重性。他沉重地告诉大使：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所以，再请你们来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睡觉吃饭了。并自嘲地羡慕尤金：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老朋友交谈，坦荡无遮，毛泽东诚恳地要尤金把话原原本本地转给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相同。但是，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我们名义是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赫鲁晓夫感到事情不好办，立即秘密飞抵北京。这位苏联领导人来华后，首先埋怨尤金没有明白苏联领导的意思。在同毛泽东的交锋中，赫鲁晓夫把尤金当“替罪羊”，一再责怪这位下属办事不行，没向中方解释清。这次中苏不愉快的首脑会晤后，尤金在赫鲁晓夫眼中已是印象不佳，但为了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到底还是没有撤换他。直到1959年，尤金大使任期届满，才调回国，继续当他的科学院院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尤金郁郁而归。应该讲，毛泽东并未责难这位大

使。《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及俄文版的发行，凝结了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理论家的心血。他曾经作为中苏友好关系的使者，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他个人的突出贡献。这一点，毛泽东不会忘记。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更清楚，尤金无须为中苏友好关系的逆转负什么责任。因为，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尤金本人也同毛泽东一样痛心，作为一个大使，他是无法扭转乾坤的。

（冷述梅）

有朋自远方来 ——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

满城花雨迎贵宾

1957年4月15日的北京，艳阳当空，和风轻拂，红桃绿柳，春意盎然。在南苑机场，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政军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欢迎群众数万人等候在这里，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机场上，人头攒动，彩旗翻飞。15时许，伏罗希洛夫主席乘坐的图104喷气式专机，划破一望无际的碧空，徐徐地降落在停机坪的跑道上。顿时，仁候在机场上欢迎的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挥动着手中的鲜花、彩带和中苏两国国旗，热烈欢迎来自远道的苏联贵宾。

飞机停稳后，舷梯很快靠了上去，铺上了红地毯。片刻，76岁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出现在机舱门口，白发银须，神采奕奕，他挥帽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并缓步走下舷梯。这时，毛主席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主席热烈握手。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都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毛主席热情他说。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送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伏罗希洛夫主席风趣地回答着。接着便同前来欢迎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一握手问好。在毛主席的陪同下，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主席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致答词，然后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北京市近百万市民的夹道欢迎。当车队行进到天安门广场时，两位领袖乘坐的汽车被数万欢呼的群众围住将近一刻钟。17时10分，车队才驶进中南海的新华门，到达勤政殿。伏罗希洛夫主席将在这里下榻。

中南海在天安门和中山公园西侧，始建于金代，成于明清两朝，历来为皇家禁苑，与北海合称西苑，又名西海子。中南海占地1500亩，其中水面为780亩。湖水荡漾，岸树成荫，楼台殿阁，错落其间。民国初年曾在此设总统府。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此办公，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居于此。勤政殿就座落在南海西岸，距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和景色奇秀的“静谷”不远，这里是中央议政和接见外宾的重要场所。现在，将勤政殿作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下榻之地，足见毛主席对伏罗希洛夫主席这次访华的重视，其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隆，实属空前。

伏罗希洛夫主席在京期间，毛主席多次亲自陪伴他出席各种欢迎会、宴会、庆祝会、游园会等活动，并肩而行，亲切交谈。伏罗希洛夫主席去外地参观访问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领导人也分别陪同前往。全国报纸用大量篇幅来报导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访问，无线电广播一次又一次地播送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实况录音，全中国人民都被卷入到这个中苏友好的高潮之中。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重视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这次访华，不仅因为伏罗希洛夫主席是苏联的国家元首，是一位年高德劭、战功显赫、受人敬仰的革命领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这次访华，还可向世人表示中苏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毛主席在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国宴和群众大

会上，不止一次他说：“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友，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伏罗希洛夫主席也反复强调：“全世界都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已进一步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在发展和加强，苏中的友谊也更加巩固。”

吐胆倾心贵相知

5月17日晚，雄伟壮丽的怀仁堂门前，车水马龙，华灯高挑。在北京的所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府各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相继来到这里，出席毛主席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访华举行的盛大国宴。宴会大厅里，灯火通明，气氛热烈，在主宾席的大圆桌的正中，摆放着芳香四溢的鲜花。18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主席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副主席的陪伴下，从勤政殿漫步走到怀仁堂，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在门前迎接。当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主席谈笑着走进宴会大厅时，乐队奏起了欢乐乐曲，大厅里的人们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宴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席间，毛主席，热情赞扬伏罗希洛夫主席，说他“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毛主席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当毛主席结束讲话和伏罗希洛夫主席于杯时，伏罗希洛夫面含微笑对毛主席说：“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毛主席幽默地回答。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伏罗希洛夫主席动情他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毛主席若有所思地回答。

“对呀，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主席挥动了一下手臂，坚定地重复了毛主席的这句话。

两位领导人会心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毛主席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未有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借反对个人崇拜，全盘否定和诋毁斯大林、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内政的作法很不满。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个秘密报告把苏联和东欧搅得沸沸扬扬，全世界为之震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共产党人之间，造成极大的混乱与迷惑。在它的影响下，6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波匈事件”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安，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受到影响。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毛主席的主持下，《人民日报》于4月5日和12月9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提出了防止产生个人崇拜所采取的措施，并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入情入理地对斯大林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这不仅对澄清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巩固团结、稳定队伍，起到了很好作用，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这当然为赫鲁晓夫所不悦。

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伏罗希洛夫主席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他在离开中国的前夕，曾同毛主席谈及这个问题，认为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称赞《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太好了，并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敞开心扉动情他说：我真感谢你们，我的好朋友，这是我们自己人在一起这样讲。斯大林在此时一再他说，只要有中国同我们在一起，一切都有保证。

毛主席不仅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而且对赫鲁晓夫集团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粗暴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也是非常反感的，对此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在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就曾严肃地对苏共代表米高扬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貌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1957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也曾善意地批评了赫鲁晓夫集团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并警告说，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毛主席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尽管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中苏两国的友谊，回击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污蔑和挑衅，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魄和胸怀，从大局出发，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也必须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如果没有头，力量就会削弱。”“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要帮助苏联，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所以，对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这种超常规的接待就不难理解了。

依依惜别友情深

一弯新月，斜挂在西边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彩，显得分外明亮。海子里的一池清水，像横躺在绿荫丛中的一面镜子，将岸树楼阁全映在里面。整个中南海是那么的宁静、安谧。南海西侧的勤政殿却灯光明亮，身着灰色西服的伏罗希洛夫主席早已起来，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衣兜内，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等待着最亲近的人到来。这时已是 5 月 6 日凌晨 3 时 25 分左右。突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在夜阑人静中听得格外清楚。伏罗希洛夫主席用手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这是毛主席特地从丰泽园赶来，与即将离开

中国动身前往印尼等国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主席话别。

毛主席见伏罗希洛夫主席走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问：“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伏罗希洛夫不安他说。

“我应该来看看你。”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停下来，左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你先走。”毛主席对着伏罗希洛夫主席一笑，谦让他说：“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客厅陈设得朴素别致，中间摆放着三张小茶桌，不远处是几把紫红色的沙发，靠右墙的书柜里摆着毛主席阅览过的书籍。伏罗希洛夫主席知道毛主席吸烟，把茶桌上的烟碟拿过来，放在毛主席坐的沙发靠手上，亲切他说：“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洋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毛主席没有顾得上吸烟，握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问道：“二十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伏罗希洛夫主席轻轻拍着毛主席的手，感激他说：“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伏罗希洛夫主席说着，不禁回想起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时的动人情景，又一一浮现在眼前。在鞍钢，工人们考虑到伏罗希洛夫主席年事已高，车间的铁梯太滑，为了安全，工人们用锯末把铁梯的油腻一点一滴地擦净，使伏罗希洛夫主席参观时行走方便安全；在上海，园艺工人为了表达上海市600万人民的一片情、一片爱，精心准备了两万束鲜花和80多斤鲜花瓣，让人们把鲜花献到伏罗希洛夫主席的手上，把花瓣撒在他的身上；在杭州，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为了表示全体社员的深情厚意，特地从650亩茶园中所采集的12斤“明前”龙井茶中挑出3斤，赠给苏联贵宾，据说这种茶叶只是在清明前二、三天茶树上发出第一叶时就摘下来，所以特别清香可口，是最名贵的特级茶。总之，在参观访问中，不仅看到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真挚友情，而且也看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从而对毛泽东主席更加尊敬了。

伏罗希洛夫主席很快从记忆中回过神来，自己笑了一笑，侧过头看了毛主席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非常关心他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办事。”毛主席笑着回答，接着又说：“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伏罗希洛夫摇着两只大手认真他说。他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起身到茶桌上拿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主席，诚挚他说：“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如果你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并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

“我深深地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毛主席对伏罗希洛夫的盛情

邀请表示感激。

毛主席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谈得是那样的吐胆倾心，好像有许多话还没有说完似的。这时天边已渐渐现出微曦，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也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主席送行。

毛主席陪着伏罗希洛夫主席走到门口，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然后把伏罗希洛夫主席送上汽车，目送着伏罗希洛夫主席的车队在晨曦中渐渐远去。

（刘懋）

滴水穿石 ——毛泽东与施密特

1975年10月底，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夫人应邀访问中国。

施密特总理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先后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联邦国防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长等职，1974年5月担任联邦总理。施密特主张建立一个联合而强大的欧洲，力主同中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早在1971年担任国防部长时就敦促当时的勃兰特总理同中国建立两国外交关系。施密特担任总理后仅一年多，便应邀来中国访问，这是联邦德国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晚年的毛泽东主席一直致力于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他在大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同时，积极做被称为“第二世界”——即美苏以外发达国家的工作。毛主席不顾年迈和体弱多病，会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国际友人。1975年初，他刚刚会见过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当施密特总理到中国后，毛主席尽管已重病缠身，但仍会见了这位力主发展两国关系的总理。

10月30日，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施密特总理和夫人一行。施密特总理虽然是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但这时周恩来总理已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中方参加会见的有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及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等。德方参加会见的有：交通、邮电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国务部长卡尔·默尔施、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夫人等。毛主席尽管身体很虚弱，行走困难，连坐下都需要人扶着，但他仍同施密特等联邦德国客人们一一握手。

毛主席同施密特总理的谈话，从一开始就充满友好的气氛。

毛主席说：“德国人好。”然后更精确地用英语说：“西德人好。”施密特谈到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接着谈到玛丽·施莱夫人特别喜欢毛主席的诗词。

毛主席回答说：“成就大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

毛主席接着问王殊：“你怎么样？”王殊答：“很好。”毛主席转向施密特问：“我们这个大使怎么样？”施密特回答说，希望他对两国关系作出贡献。

王殊原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首都波恩分社的记者。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西方有“祸水东移论”，王殊在研究了各种材料后，认为苏美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他的这些报道，毛主席十分赞同。毛主席认为，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苏美争夺的重点仍然在欧洲，而且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散、太弱，易受两霸争夺的威胁。西欧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在1972年中德建交谈判时，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选定王殊担任谈判代表，并接见王殊等人，听取汇报。事隔三年多。毛主席对王殊仍有很深的印象。

施密特原以为毛主席重病缠身，这次会见只是一种纯粹的礼貌姿态，连翻译的欢迎词，他也认为是事先编好再装模作样地翻译出来。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施密特不得不改变他最初的看法。

毛主席谈话已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主席精神集中，思路敏捷，双方谈话非常活跃。

欧洲和国际形势自然是双方讨论的重点，双方坦率地介绍了各自的观点，有时还展开辩论，但双方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

毛主席同施密特还花了 10 多分钟讨论了德国哲学。毛主席说，你看来是康德的学生，唯心主义不好。我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生物学家海克尔感兴趣。他们还谈到了克劳塞维茨。

毛主席独特的谈话方式也深为施密特称道。由于毛主席说话困难，有时需要把他的意思先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然后再译成英文。当翻译没听懂时，有时几个人便商量一下，或请毛主席再重复一遍，而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主席就把他的话写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为了便于表达和翻译，毛主席特别注意讲短句，说话不用华丽的词藻，但谈话仍然诙谐幽默，大家毫不拘束，整个会见气氛十分欢快。有时毛主席一句笑话、一个形象的比喻，还引起女士们的哄笑声。

毛主席还同施密特总理讨论了战略问题。毛主席认为，防御战比进攻战好。并举例说明美国进攻越南、德皇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都是进攻者遭到失败。

双方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告辞时，施密特握着毛主席的手说，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回答：“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毛主席幽默他说：“我这个水不行。靠你们。”话一出口，在场的中德两国人士都哈哈大笑起来。

施密特没有想到，他是毛主席会见的最后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

同毛主席的会见给施密特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 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书中详细地记述了他同毛主席会见的情景。施密特称毛主席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左军）

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

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

50年岁月，斗转星移，戎马一生的蒙哥马利元帅，于1958年9月脱下披挂了半个世纪的战袍。在这位六旬老人的心中，令人眩目的战绩与胜利带来的不羁的狂喜已成为过去，和平之光掩盖了战争的回忆，此时，他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亚洲，投向了遥远而又陌生的新中国。

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的召唤？还是中国新政权强大的吸引力？抑或是对住在昔日皇宫紫禁城里被西方政坛众说纷坛的中国领袖毛泽东的神秘感？蒙哥马利从大洋彼岸向毛泽东提出了友好访问的要求，毛泽东很快答复，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蒙哥马利对中国新政权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他曾经强调指出：“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政府在北京，人口近七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政府在福摩萨（指台湾），人口只有一千万的蒋介石的所谓‘国民党中国’，后者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资格可以冒充中国。”

1960年5月，蒙哥马利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国的国土，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了面，新中国沸腾的建设热潮和人民振奋的精神面貌深深地吸引着他，于是1961年9月，他又一次来到中国，不仅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从内蒙古向南，经过华北、华中、华南，接连访问了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10个大城市和许多城镇、乡村。从政治、经济、文化到风土人情，蒙哥马利兴之所至，都一一进行了考察，并在他的著述《三大洲》中得出了结论：“从我的旅行中我清楚地看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可能造福人类，并可能缔造各国普通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世界。”

蒙哥马利看中国

蒙哥马利元帅是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武装部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任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1942—1943年以指挥北非战役击溃隆美尔的德军而闻名遐迩。北非战役结束后，他进军意大利，以后又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参加诺曼底登陆，转战西北欧，直到盟军击败德国法西斯军队。蒙哥马利指挥战伞以沉着稳重，头脑清晰著称，他被评价为威灵顿以来英国最优秀的将领。

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开始致力于在阴霾弥漫的世界政治海洋中寻找解决东西方冲突的途径，他认为西方的领袖们往往过分专心注意欧洲的事态，而没有觉察非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事态对西方政策的影响，这是他们的偏颇和失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蒙哥马利元帅决定访问亚洲，他带着一大摞英文版的《活的中国》、《为亚洲而战》、《红星照耀中国》等书来访问中国。

蒙哥马利在他约一万英里的中国之行中，最感到不习惯的是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竟然只使用一个时间，这对足迹遍及欧洲战场的蒙哥马利来说是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他离开北京去包头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表问陪同他的人：“在包头需要把表拨到几点？”

在场的人因为在国内没有时差的概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蒙哥马利再次问：“难道中国只有一种时间？”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蒙哥马利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么大的国家，东西有 45 个纬度，居然只用一个时间。”

不过，他的注意力很快被飞机掠过的景致所吸引，飞机正飞过他前一天曾登临的长城，从飞机上往下看，长城如一条巨龙，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愈发显出了它的雄伟与壮观，令蒙哥马利叹为观止。

令蒙哥马利感到惊讶的另一点是中国服装的统一，蒙哥马利来自讲究服饰的绅士之邦——英国，英国人以穿着考究，款式典雅而著称，中国人则不然，即没有普通礼服、燕尾服，也没有早礼服、婚礼服，在中国，几乎每个人的衣服款式都大致相同，颜色也局限于灰、蓝、棕、黑几种。

如何看待这种统一呢？

多年带兵打仗使蒙哥马利认识到集中统一的可贵，因此他认为，中国人统一的衣着自然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了。

作为一名军事家和政治家，蒙哥马利深知领袖权威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访问中，毛泽东是蒙哥马利最常谈起的话题。

一次，蒙哥马利访问一个拥有一万户左右农民的公社，与 30 多岁的公社社长就公社制度进行了长谈，憨厚朴实又不失聪明的年轻社长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如果你是毛泽东，你对于这种公社的想法和对于你的公社会采取什么变革或改进？”蒙哥马利出其不意地问年轻的社长。

社长没有想到蒙哥马利会提出这个问题，一下窘住了，过了一会，他摇摇头说：“因为我不能设想我是毛主席，所以我回答不了您的问题。”他的话将屋里的人都逗笑了。

“请你设想一次。”蒙哥马利坚持要他回答。

“那当然是毛主席的公社的想法是最好的，这是为日益增加的中国人口迅速生产粮食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年轻社长肯定地回答。

无论是在工厂、农村、部队还是学校，蒙哥马利常常会突然问他的谈话对象：“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指挥？”

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学生都会立即回答：“毛主席。”

蒙哥马利看得出，他们的回答是由衷的。

中国人高度统一的信念令蒙哥马利感叹，也令他对毛泽东折服，因为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和领袖在他的人民中会有如此高的威望。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更多地看到中国人民，就更加喜欢他们，他们落后而贫穷，但他们勤奋忠厚，富有幽默感。”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期间，正是中国经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蒙哥马利的想象中，这样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在连续三年歉收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物质极度匮乏，人们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局面，可是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蒙哥马利亲眼所见与他的想象恰好相反，中国人民愉快、平和、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直感染着他，他觉得同中国人在一起交谈，会让他的心年轻，他迷恋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纯朴的

人民。

人类每：一次革命都留下了一些足以作为人类历史里程碑的地方，如法国的巴士底狱，俄国彼得堡的冬宫，美国的福去谷等。中国的圣地在延安，延安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与坚强意志的象征。作为军人，蒙哥马利特别想去延安亲眼看一看，这是怎样一片土地，在这里怎么能够以弱小兵力战胜数十倍的敌人？于是他来到了延安。

走进延安城，蒙哥马利以他军事家的目光环顾凤凰山和清凉山，称赞这是个有着天然屏障的理想的好战场。在那排中国军事家居住过的窑洞面前他驻足良久。走进了毛泽东的故居，窑洞里的一切都令蒙哥马利兴致盎然，他拿起了毛泽东办公桌上的一架古老的手摇电话，放在耳边听了许久，沉思了许久，放下电话，蒙哥马利对陪同的中国官员感慨道：“不可思议！毛泽东带领你们经历了常人生活不了的生存状态下的革命，诞生了不可想象的人类精神。西方人假若曾经看过中国的古代文明和早期工艺，那现在垂涎的应该是这种现代精神。神奇啊！真是神奇的土地和人民！”

那天正逢集市，熙熙攘攘的农民带着准备出卖的农产品从四面八方赶来，集市立刻喧闹起来，叫卖声此起彼伏。蒙哥马利也走在赶集的人群中，饶有兴致地东张西望，不时间一问价钱。开始，人们面对这个不知身份与国籍的外国老头都很腼腆，只是呆呆地瞅着他，但不久便因他友好的微笑而活跃起来，纷纷与他打招呼。蒙哥马利从集市上买了一杆朴拙的木制圆珠笔，一路爱不释手。

从集市上回来，已是暮霭沉沉，晚霞将延安巍峨的宝塔染成淡紫色，犹如一幅凝固的画面，而不远处窑洞里升起的袅袅炊烟，又使这画面活跃了起来。蒙哥马利一行踏着延安的黄土路往回走，路过一家窑洞时，蒙哥马利提出进去看一看。窑洞的主人热情地将他们让到炕上，端来热腾腾的茶。蒙哥马利同窑洞的主人随便地聊起了庄稼收成以及生活情况。这时，主人家的小男孩从外面跑进来，一看到有客人，便赶紧站在了门边。蒙哥马利把小男孩拉到跟前，看着他虎头虎脑的样子特别可爱，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塞给小男孩。小男孩赶紧推过他的手：“不，我不要别人的东西！”

窑洞的主人赶紧过来推让。

“送给你做纪念的。”蒙哥马利真心诚意地坚持要送。

小男孩仍把手背在身后摇头，蒙哥马利有些尴尬地揣回硬币。

在广州，蒙哥马利临走前将一个装刮脸刀片的空盒子放在宾馆的桌子上，当火车快开时，一个气喘吁吁的小伙子跑来：“元帅，您的东西。”蒙哥马利接过来一看，哭笑不得地摇摇头，正是他扔的那个空盒子。不过，他面对着满脸汗水的小伙子，又怎能不感动呢？

蒙哥马利在他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中幽默地写道：“如果你打算丢失一些东西，你就不要把它们带到中国去，那里永远也不容许你遗失东西。”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初次见面

汽车缓缓驶进了昔日的皇宫“紫禁城”，与外面熙攘的长安街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里安静肃穆，五月和煦的微风徐徐吹来，湖水泛起阵阵涟漪。走进绿荫掩映的庭院时，蒙哥马利的心情是既兴奋又迷惘的，来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了解毛泽东，因为西方世界很少有人同毛泽东谈过话，但尽管如

此，许多人都在描写他，他通常被描写成一个残暴的统治者。

正是这些描写，更加引起了蒙哥马利的好奇心，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在蒙哥马利的印象中，毛泽东是站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面带微笑地向他的百姓招手致意的形象，从照片上看，他的身上的确有一种非凡的气质。

当蒙哥马利走进门槛时，毛泽东正从一个宽大的沙发中站起来，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蒙哥马利还未走近他的身旁，就感觉到毛泽东的身上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身材魁梧，目光深邃，很有个性，正如印度总理尼赫鲁向蒙哥马利描述的那样，象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伯伯。

“你知道你是在与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是在与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毛泽东非凡的幽默感以及他闪动的目光一下吸引住了蒙哥马利。

当蒙哥马利回答说“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时，毛泽东朗声笑了起来，毛泽东的笑声具有一种穿透力和感染力，蒙哥马利也跟着笑起来，这笑声缩短了“东西方距离”，两个人很快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从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到中国人与外国人每个星期休息的天数的不同，几乎无所不谈。

毛泽东的健谈与幽默是令每一个与他会面的人都难以忘怀的。从谈话中蒙哥马利发现，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从不把他的思想意识强加于其他国家。

在谈到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时，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已迸发出来了，并找到了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出路，伟大的力量正在推动中国迅速前进。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 10 亿人口和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早在 1958 年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在远东，倘各国恐惧外来侵略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并据此推行健全而一贯的政策。”

听完译员的翻译，毛泽东抬起头看看蒙哥马利，略带嘲讽他说：“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进行侵略了？”

“我并不愿意这样设想。”蒙哥马利耸耸肩接着说，“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它就要向国外扩张领土，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中就包括我自己的国家。”

毛泽东吸了口烟，缓慢而审慎他说：“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他说它就会出现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可能知道了，因为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那时会有新的领袖出现。但是我活着的年代我会坚决使中国不超出它合法的边界。至少 50 年以后，玉皇太帝所管辖的范围还是 960 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了人家一寸的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了。在一切边界纠纷中，我们主张采用谈判方式，决不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

停顿了一下，他又深情他说：“中国自己遭受过如此深重的外国侵略和剥削，今天的中国无意使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屈辱，中国只要求别人不干涉它的事情，让它从过去受别的国家侵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遭到攻击，它将以一切力量保卫自己。”接着他又补充道：“中国愿意和西方国家友好相处，尤其是同英国人民的亲密关系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蒙哥马利饶有兴致地听着，赞同地点点头。与毛泽东谈话，蒙哥马利时能感觉到他卓越的才智和他那非凡的幽默。蒙哥马利获得深刻印象的不是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也不是他的思想观点，而是高尚的人格和他的领导才能。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

这是蒙哥马利在 1960 年 5 月访问中国时，与毛泽东一次难忘的会见。

重逢在武汉

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再一次相逢，是 1961 年 9 月。当时中国正在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西方世界描述当时的中国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中国，并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与乡村。蒙哥马利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武汉，并于当晚 6 点半，来到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尽管已到了 9 月，可是武汉的天气仍很热，但进入林木茂密、鲜花盛开的庭院式宾馆，却象进入另一个天地。东湖如同一块润泽的碧玉，湖中古木横沉，湖水晶莹透明，湖四周长着葳蕤的芒草和婆娑的绿树，浓淡相宜，错落有致，更有绮秀的珞珈山倒映在湖水中，静影沉璧。这明山秀水，旖旎风光令足迹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蒙哥马利也不由地连连称赞。

走进会客厅，毛泽东立刻迎了上来，微笑着用英语说了句：“您好！”虽然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趣非常浓厚，但他的发音并不好，不过蒙哥马利听来却很亲切，如同是又见到了久未谋面的老朋友。蒙哥马利握着毛泽东的手，感觉到一年多的时间似乎未在池脸上留下痕迹，睿智的额头上仍不见皱纹，深邃的双眸炯炯有神。

蒙哥马利拿出来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一盒英国的“三五牌”香烟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香烟，又用英语说了句谢谢，然后两人坐下开始喝茶。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提出的“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的“三原则”予以高度赞赏，感谢他为中英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促进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

蒙哥马利也兴致勃勃地给毛泽东讲他的访华观感，赞扬了中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勇气，毛泽东饶有兴致地听着。

蒙哥马利真诚他说：“主席先生，你的人民是这样地拥戴你，你的共和国成立了 12 年，从战争的废墟和混乱的局面中崛起，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摇摇头说：“中国有句老话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能顺利地闯过这两关，就能活到一百岁，不过我不想活那么久，我最多活到七十三岁，那么我还能活四年。”

“为什么？您至少可以活到八十四岁。”蒙哥马利很惊讶，“这太悲观了。”

“不，我要去见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我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同他讨论。”毛泽东认真他说。

蒙哥马利叹了口气说：“哎，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一定找到他，同他谈一谈这个问题，告诉他中国离不开你。”蒙哥马利和毛泽东的活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

与毛泽东谈话始终让人感到轻松，令人愉快，他是一个具有精神力量的

领袖。

“主席先生，您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却从来不提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吗？”蒙哥马利对此一直心存疑惑。

“不是”，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并解释说，目前我们从事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各按其所劳与所能进行分配，所以是社会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是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以后的事。

“当我 1947 年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时，他对我的解释与你完全相同。”接着蒙哥马利对毛泽东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

蒙哥马利接着问：“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要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

“因为我们喜欢把名称与最终目的联系起来。”毛泽东的回答令蒙哥马利觉得有趣。

话题转到了战争，蒙哥马利说：“作为军人，我对主席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很有兴趣，看得出您对战争——冷战和热战——有丰富的了解，不过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蒙哥马利觉得这句话大有军人专政的意思。

毛泽东脸上浮现出沉思的神情：“这句话还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讲的；现在已记不起确切时间了。这句话是说革命中不能没有战斗，有战斗就需要枪杆子。”

“那么在现在所谓的和平日子里，这句话是否仍然有效呢？”蒙哥马利饶有兴趣地追问。

“当然。”毛泽东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令蒙哥马利既感到有趣，又有些不满。

夜已深了，谈兴正浓的蒙哥马利不得不站起来告辞，并希望第二天晚上再谈一次。

毛泽东告诉他因为第二天要离开武汉，回北京参加十月一日举行的国庆庆祝活动，不能与他谈了，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蒙哥马利有些失望。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机智与幽默，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长江之约

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通常在早上 5 点左右才睡觉。这天早晨 4 点多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通知陪同蒙哥马利的中国官员，他要请蒙哥马利吃午饭，傍晚还将一起去游泳。

这消息令蒙哥马利振奋，他知道毛泽东已将他作为真正的朋友了，因为毛泽东很少这样安排与外宾的活动。

这天吃早饭时蒙哥马利的心情特别愉快，他说：“毛泽东说过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下午 2 点，蒙哥马利又一次来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两人接着前一天的话题继续讨论。

在谈到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时，两人有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人民群众，蒙哥马利认为应该是领袖，因为人民并不知道什么是对

他们最有利的，因此决定权在于领袖。

“革命当然需要一个贤明的领袖，但人民的意志是最重要的，当人民信赖你时，他们就会接受你的领导和决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抽着烟缓缓他说。

“这一点我同意，这正符合我自己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注视着蒙哥马利，微微一笑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主席先生，据我的经验看来，国家领袖们对于指定他们继承人是很反感的，比如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德意志联邦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他们都很讳言谈继承人，在中国呢，中国的继承人是否已确定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蒙哥马利关注已久，他在访问中国几大城市与乡村的途中，曾对陪同他的中国官员熊向晖说过：“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而且多半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我们国家常为争夺王位打仗，现在有了王位继承法，内部就平静了。可是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也许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在郑州，蒙哥马利又就这一话题谈起：“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乏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攫取了政权，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当熊向晖将这些话转述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突然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

“Successor。”熊向晖回答，并在一张纸上写出来。

毛泽东看了一会：“‘Successor’这个词我知道，是‘成功’的意思，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他抽了口烟又说：“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可是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词，“接班人”翻译成英文还是“Successor”。

毛泽东接着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他立得太晚了，而且他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五三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而在于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他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是个十足的两面派。”

毛泽东话锋一转，又回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我们‘八大’通过新党章，里面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条？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

他看看在坐的人，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我们的副主席有5个，排头的是谁？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换成姓刘了，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只是一层纸，一捅就破，这层纸就让这位元帅来捅吧，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都能看清楚。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现在，蒙哥马利憋在心里好久的问题终于提出来了。

毛泽东笑着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是刘少奇。”

“刘少奇之后呢？会不会是周恩来？”

“不知道。刘少奇以后的事我不管，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这条船不能离开你。”蒙哥马利真诚地再一次强调。

“暂时不离开。”毛泽东肯定地挥了一下手，接着他又笑着说：“不过人早晚要死的，死亡大致有五种方式：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撞死，游泳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准备了，我赞成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可是我希望我能活到一百岁，我已经过了七十三岁这一关了。”

毛泽东凝视了蒙哥马利一会，认真他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来到长江边时，已是下午5时，粼粼起伏的江水，被傍晚的余辉涂成耀目的金色，江水涌动，泛起层层白色的浪花，如同一片片白色的云，融进深蓝色的天空。

50名青年男女早已兴奋地等候在那里，毛泽东顺流而下，漂游了大约一个小时，并不时地和身边的青年们交谈着，笑声一直回荡在宽阔的江面上。

蒙哥马利因为旅行中肠胃功能不好，不能与毛泽东一起劈波斩浪。回到汽艇上，毛泽东望着蒙哥马利说：“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

“好，我们比赛。”蒙哥马利高兴地接受了挑战。

“什么时候再来？”

“1964年吧！”

“好，一言为定！”

“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电视公司的大好机会。”

夜晚，蒙哥马利在下榻的宾馆里正伏案记录来中国的一些观感，第二天他就要回英国了。这时毛泽东来了，蒙哥马利非常感动，因为毛泽东从不到宾馆拜会外国来宾——就是国家元首也不例外。

“为你送行，送你一件礼物。”毛泽东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幅由毛泽东创作并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这是毛泽东早晨4点钟特意为蒙哥马利写的。

送走毛泽东，蒙哥马利捧着还散发着墨香的遒劲词幅，思绪万千。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

蒙哥马利想：毛泽东也同样是个渴望恬静的遁世者。

（高玉琪）

一首动听的歌 ——毛泽东与蒙博托

7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中国当时虽然仍处在“文革”时期，但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对外交事务的处理已逐步正常起来。在这一阶段，先后有2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访华，其中有一位两次来中国访问，这就是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蒙博托有一个长长的名字，全称是：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意思是“扎伊尔河边一位不可战胜的勇士”。据说，若以正确的宁加拉（Lingala）部族语读出来，就好象是一首动听的歌。

蒙博托行伍出身，当过记者，深谙文韬武略。1960年刚果（今扎伊尔）独立时，他被任命为卢蒙巴总理府的国务秘书，后任陆军参谋长。7月上旬，比利时当局派兵武装入侵刚果，并策划其代理人冲伯宣布加丹加省（现沙巴省）“独立”，组织分裂主义政府。卢蒙巴向联合国请求紧急军事援助，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并勾结比利时政府和冲伯等，解除卢蒙巴领导的国民军的武装。10月，卢蒙巴被联合国军以“保护”为名软禁，后被冲伯集团劫持到加丹加，1961年1月被杀害。副总理基赞加在卢蒙巴被软禁后宣布代行总理职务，并将合法政府从利奥波德维尔（首都）迁到斯坦利维尔（现基桑加）。我国宣布同基赞加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61年8月，美国支持阿杜拉在利奥波德维尔成立“中央政府”，并诱迫基赞加到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的阿杜拉政府中任副总理。

在“刚果事件”中，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卢蒙巴及基赞加领导的合法政府，谴责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绑架、杀害卢蒙巴。从1961年9月中旬，中国政府召回驻刚果使节，两国关系中断长达10年。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日益扩大。

1965年11月，蒙博托再次政变，夺取了政权，担任了总统。这时蒙博托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1967年5月，他创立人民革命运动，自任主席。1971年10月他宣布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改为扎伊尔共和国，他多次声明扎伊尔不是西方国家的附庸，他不是美国的代理人，强调奉行“不左不右”、“积极中立”的对外政策，“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友好关系”。当他看到有非洲民族运动元老之称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被誉为“非洲贤人”的但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非洲大陆唯一君主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以及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尼迈里等这些政治观点各异的非洲风云人物相继访华并受到毛主席接见时，蒙博托心里既羡慕，又着急；当他看到中国同这些国家友好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发展时，便更加迫切地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

1972年3月，蒙博托请访问扎伊尔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要同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的愿望。6月下旬，蒙博托访问几内亚，派人同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接触，试探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并请几内亚总统杜尔从中说项。

此后，中扎之间经过近半年的接触、磋商，两国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关系

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两国关系正常化仅一个多月，蒙博托便踏上了访问中国的旅途。

1973年1月10日，蒙博托乘坐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面对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和载歌载舞的欢迎人群，蒙博托感慨万千。当他同周总理一同坐上“红旗”轿车时，第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来这里是把扎伊尔人民的和平情谊和善意带给你们”。蒙博托告诉周总理，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和但桑尼亚尼雷尔总统都曾以亲身体会对他说，中国是非洲的真朋友，并几次劝他同中国恢复关系。

1月13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蒙博托。当头戴豹皮帽子的蒙博托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走进毛主席的书房时，毛主席同他们热烈握手。蒙博托对毛主席说：“我为有机会同您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您表示敬意。”毛主席对蒙博托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仅六个星期就来中国访问表示赞赏。

蒙博托见毛主席打量他头戴的豹皮帽子，忙解释说，根据我们党（即人民革命运动）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并指着随行人员头上的豹皮帽子补充道，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的是假豹皮。毛主席风趣他说：“豹皮，吓人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双方的谈话很快便接触到实质问题。

“卢蒙巴，他没有来过。”

“对。他没有来得及。”

“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还支持几个”，“就是不支持你。”

当蒙博托表示，“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时，毛主席说，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

短短几句话，坦诚相见，实事求是，十年的问题一下子就说清楚了。

毛主席赞扬蒙博托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蒙博托事后对周总理说：“我很欣赏毛主席坦率的性格。”

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会见结束时，蒙博托向毛主席赠送了一本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并作了解释。毛主席连声夸奖这个礼品好。

蒙博托访华期间，中扎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中国向扎伊尔提供二亿人民币（一亿多美元）无息贷款，并同意向扎伊尔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医疗队。

从此，中扎关系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4年12月，蒙博托总统再次访问中国，这是蒙博托总统访问朝鲜后的一次顺访。毛主席在自己的家乡湖南长沙会见了蒙博托等头戴豹皮帽子的扎伊尔贵宾。会见虽然仅半个多小时，但双方都对这次重叙友谊感到亲切和高兴。蒙博托对中国给予扎伊尔在农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连声称赞在扎伊尔的中国专家。蒙博托认为中国和扎伊尔对国际问题没有不同的看法，两年来，两国在联合国阐述的观点总是相吻合的。

周总理在医院里会见了蒙博托一行，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了会谈，蒙博托总统对访华结果感到满意。蒙博托在同中国的交往中，深深体会到：同中国的合作更有特色、更富有成果。因为中国“进行合作时没有其他考虑，没有

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唯利是图”。针对西方散布的“黄祸论”，蒙博托说，在扎伊尔，我们清楚地了解，对非洲不存在“黄祸”，而是“白祸”，中国有八亿人口，但有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密度低得多。

蒙博托认为，到中国访问，“能够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从毛泽东主席的智慧源泉中汲取教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象毛泽东主席那样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执政经验、斗争经验和胜利经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斗争经历和深刻思想，使他成为世界历史的伟人。这确实是蒙博托总统的肺腑之言。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编了一本世界一百名人排行录，将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位世界名人排出座次。他将毛泽东主席排在第20位，这个位置远远前于同时代的斯大林（第63位）等人。哈特认为，毛泽东主席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管理国家的时间又较长，从长远看，毛泽东的影响会更持久，所带来的变化会更有意义。

在对毛主席的评价上，西方学者哈特同非洲国家的蒙博托总统是一致的——毛泽东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人物。

（左军）

毛泽东抽烟趣谈 ——毛泽东与新西兰、阿尔巴尼亚客人

香烟里面含有大量尼古丁，抽烟对人体有害，尤其是老年人抽烟，容易诱发各种病症。看来，这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见解。60年代中叶，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世界上的一些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考虑，特别关心毛泽东的健康。一些兄弟党领导人每次见到毛泽东，总是首先问候他的健康情况，劝他戒烟，以利于健康长寿。我在为毛泽东主席会见兄弟党领导人谈话做速记工作的过程中，曾经有幸多次听到主席婉拒兄弟党领导人劝其戒烟的谈话，感到特别风趣，特别幽默，现录几段对话，以飨读者。

1967年3月12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同志。威尔科克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曾经多次来华访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次见到毛泽东，他大步上前同主席热烈握手、拥抱，并关切地问道：“毛主席身体好吗？”

“马马虎虎，暂时还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见马克思了。”毛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非常幽默地答道。

威尔科克斯动情他说：“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让毛主席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吃不消。”

“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体，要是我不抽烟的话，我一定劝毛主席不要抽烟。”

这时，毛主席把头一摇，斩钉截铁他说：“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已经成了习惯，很多年的习惯，要是不抽的话，就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从三十几岁就开始抽，抽了四十几年了。”毛主席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抽烟经历后，对威尔科克斯同志说：“我是学了马克思的，没有学列宁。”

参加陪见的一位中央领导人补充说：“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烟，就是列宁不抽。”

威尔科克斯同志这才明白毛主席的意思，同中方参加陪见的领导人一起大笑起来。这时，主席微笑着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又一口一口地抽起来。

为了进一步说明抽烟的必要性，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联系历史人物，诙谐地指出：“国民党领袖都不抽烟，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不抽，可是他们都不得好死。孙中山得了癌症，要是他抽烟，也许还不至于得。汪精卫当了汉奸。”

周总理说：“汪精卫最后也是得了癌症，死在日本。”

毛泽东主席得意地笑了，似乎他关于抽烟正确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检验。

这时，威尔科克斯仍恳切地对毛主席说：“希望毛主席戒烟，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主席说：“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抽烟，可我偏要抽。抽烟是健康的表现。我有过一年停止抽烟，因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来病好了，又抽起来了。”

最后，毛主席告诉威尔科克斯：“将来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会问：‘毛泽东，你抽不抽烟？’”说完，毛主席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起来，笑得那么开心，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对于威尔科克斯的戒烟劝告，主席就这样应付过去了。

几个月后，即 1967 年 10 月 12 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宾主落坐后，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雅抽烟。

“谢谢，我们都不抽烟。”谢胡、阿利雅同志很有礼貌地对毛主席说。

“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毛主席很风趣他说。“霍查同志抽烟！”周总理赶紧告诉毛主席。

“那就是我的同志！”

顿时，整个大厅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周总理接着告诉毛主席，“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雪前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说着，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火点燃，津津有味地抽起来。灰白色的轻烟，渐渐地在大厅里缭绕，扩散开来。

看着缭绕的轻烟，谢胡同志恳切地对毛主席说：“为了主席的健康长寿，建议主席戒烟。”

毛主席摇摇头，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戒烟不行！我没有那个硬气。”

“如果医生要你戒烟的话，你一定会戒！”谢胡同志似乎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医生比我抽得厉害！卫生人员才不那么卫生呢！”毛主席边说边哈哈地笑起来。

顿时，整个大厅又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对于谢胡同志的戒烟劝告，毛主席又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吕辉祥）

人生乐在相知心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

初识周恩来

朝霞，给古城保安周围的群山，涂抹上一层金色。山下河水泛着金波，绕城而过。7月的陕北山区，清晨空气清新，微风轻拂，凉爽宜人。住在城边炮楼山下窑洞里的毛泽东主席，通宵达旦地写了一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搁下笔，站起来步出窑洞，迎着晨曦，伸了伸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带着芬香的新鲜空气。这时，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急步走来，将一份电报呈递给毛主席，说：“主席，这是东线指挥部周副主席刚发来的电报。”

毛主席很快浏览了一下电文，笑着说：“好呀！那两个美国人已经到了安塞县恩来同志的指挥部了。”说着，在院子里走了几步，略一思索，停住脚对叶子龙说：“子龙，你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来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和采访活动。”

毛主席说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他们是经宋庆龄的介绍，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和联系，于1936年6月从北平出发，经西安、延安，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来到被蒋介石严密封锁，当时称为“未知世界”的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和医生。

斯诺到达安塞后，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温文儒雅，蓄了黑胡子的周恩来。周恩来温和而有教养地用英语向斯诺表示欢迎。这使刚从蒋管区来的斯诺大感意外，在世界的这个边沿地区，一直被国民党宣布为“愚昧的强盗”、“抢掠者”的共产党人竟是这样的文质彬彬，英语讲得这样好。

周恩来同斯诺寒暄后，热情坦率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苏区的情况。”

周恩来这种允许斯诺自由行动的诚意，使斯诺感到有点惊奇和怀疑。他原以为在采访和拍照等方面可能对他会有某些限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余的顾虑。

“我要见毛泽东先生。”斯诺试探着提出他考虑已久的要求。

斯诺来陕北的目的，周恩来是早有所知的。当斯诺提出要采访毛泽东主席时，周恩来便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毛泽东在保安，可以安排他去见毛泽东。这使斯诺喜出望外。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给斯诺详细地拟定了一个92天的建设性采访计划，诚挚地对斯诺说：“这是我的意见。你是否愿意照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将发现这是一次有意思的旅行。”并答应把他来的消息电告毛泽东，同时马上派人送他去保安。

周恩来的坦诚朴实，磊落机敏，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说他“具有一种吸引力”，“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谈吐温和”。“他的行动同他的学识和信念相协调”，“是中国一切人物中极为少有的一个”。

第二天一大早，斯诺便同一支由近40人护送物资的交通队出发，经过两

天多旅途的劳累，风尘仆仆地抵达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临时首都保安，受到保安军民的热忱欢迎。斯诺也未曾想到，他这次陕北苏区之行，将改变他的一生，对他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不仅写出了惊世之作——《西行漫记》，使他成为世界的知名人物，而且，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毛泽东主席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结下了终生的真挚友情。

改变人生旅途的四个月

毛泽东主席对斯诺来陕北苏区采访非常重视。7月16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接见了刚来到这里的大西洋彼岸的客人。

这是一间简陋空旷的窑洞，四壁粗劣，了无装饰，只张挂了一些地图；木板床上铺着简朴的被褥，挂着一顶蚊帐。毛主席身着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佩戴着两条红布做的领章，微笑着在门口迎接客人，热情地和客人握手说：“欢迎，欢迎。”随即将客人让进屋内，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上。警卫员很有礼貌地给客人递上了开水。

毛主席看着还带有旅途倦态的斯诺笑着说：“蒋介石对我们造谣诬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呀！”

“我们一进入红区，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红区的新气象，已经证明了蒋介石的宣传是骗人的、荒谬的。”斯诺发自内心他说。

毛主席点燃了烟，吸了一口，深情地对斯诺说：“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上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提供方便和帮助。”

“我会公正的、如实的向全世界报道你们情况的。”斯诺非常惊喜，站起来激动他说。

“好的，希望你能如实报道。”毛主席也高兴他说。随即也站起来在窑洞里走了几步，幽默地对斯诺说：“不过你的报道蒋委员长看到要大发脾气的。”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这笑声也感染了斯诺和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同志，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接着，毛主席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很能抽烟，他在谈话时，几乎一根接一根地抽。由于毛主席博学多识，精通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和哲学也有深刻的研究；加之，毛主席记忆惊人，讲演才能出众，所以在回答斯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时，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证博引，意趣横生。毛主席对世界政治、军事的熟悉了解，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特别是对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必胜等方面的论述，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论据充足，切中时弊，使斯诺非常钦佩和折服。

“主席，听说你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天明才休息，难道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就不知道疲倦么？”斯诺关切地问。

“这是少年时代经常参加田里劳动，学生时代坚持长跑、爬山、游泳等活动锻炼出来的，不过不是铁打的。”毛主席笑着回答。

斯诺看看毛主席是那样的亲切随和，诚挚好客，毫无国民党官员那种狂

妄自大、使人讨厌的傲慢派头，深感毛主席平凡而伟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截然不同。

时间过得真快，已是星移斗转，银河调角的深夜。斯诺依依不舍地起身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把他送到门口，用英语说：“祝晚安！”

此后的几天内，毛泽东主席还同斯诺进行了几次谈话，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斯诺除同毛主席谈话外，他还在苏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同农民、工人一起，同睡一个土炕、同吃二锅小米饭，了解他们的情况；穿着红军战士的服装，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同前线的指战员，以至被称为“红小鬼”的司号员亲切交谈。广泛地了解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以及他们的文体活动和家庭情况，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材料，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9月22日从前线回到保安。翌日，毛主席又同斯诺谈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斯诺从北平出发到西北苏区时的许许多多当时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全部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非常满意的回答。但是，斯诺还不满足，总感到还缺少什么似的，因为毛主席始终未谈自己的经历和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于是，斯诺再三请求毛主席谈谈他自己的革命经历。毛主席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同意斯诺的请求。

保安10月之夜，是清凉的、甜馨的。微微夜风，送来阵阵糜谷的清香。在这夜阑人静的深夜里，毛主席的窑洞仍灯光闪烁。灯光下，毛主席与斯诺相对而坐，他以浓重的湖南口音，生动风趣的语言，凭着记忆，开始根据斯诺提出的问题，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共产党的诞生、红军的创建、根据地的建设、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以及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斩关夺隘，抢渡天险，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和翻越雪山，跋涉草地，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毛主席侃侃而谈，斯诺奋笔疾书。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持续了十几个晚上，每次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一般都谈到凌晨2点左右。在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主席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为招待斯诺，特地多了一碟有一点肉的菜，这在当时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主席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谈话时，毛主席的态度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谦虚诚恳，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风趣诙谐，久久不倦。斯诺说这是他平生经历过最难得、最宝贵的谈话。毛主席对他个人生平的谈话很慎重，要求斯诺整理成文后，由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经他仔细审阅修改后，交黄华同志退给斯诺。

斯诺在苏区生活了近4个月后，于10月中旬依依不舍地告别保安军民，22日回到西安。11月初返回北平。他不顾数月采访的疲劳，立即昼夜奋笔写作。他用朴实的文字和大量的真实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详细地概述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新的气象。他还用大量的篇幅，生动地、详尽地记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革命活动情况。文章中多处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钦佩、崇敬的心情。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宣传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苦难的中国才能变成光明的新中国。他把这本书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一书问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被世界上许多评论家称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初政治意义的著作”，成了世界上最

畅销的书。

毛主席后来看到《西行漫记》时，十分高兴他说：“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再访延安

1939年9月，斯诺再次来到陕北，这时党中央已迁到延安。毛主席对再次来到陕北的老朋友表示热烈欢迎。9月29日，延安举行欢迎中国和外国朋友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斯诺，尤其是介绍他1936年秋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到边区进行采访的情况。毛主席赞扬说：“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毛主席还再次同斯诺进行长谈，介绍三年来陕甘宁边区和蒋管区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侧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同时，对斯诺此次来边区了解西北发展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予以鼓励。毛主席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内外问题的精辟分析，再次吸引着斯诺，使他对毛主席更加崇敬。

斯诺在延安期间，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对当地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边区军民团结奋斗、誓死抗日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斯诺，更加深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将赢得最后胜利。他第二次从陕北回到北平不久，写了《为亚洲而战》这本书。

斯诺这次陕北之行后，直至1944年，在这段时间里，便再也没有外国记者到延安来采访了。当时，国民党不仅继续加紧反共磨擦，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严禁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所以，外国记者无法进入边区采访。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纷纷谴责国民党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斯诺也于2月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触怒了国民党蒋介石。不久，斯诺便被国民党政府赶出了中国。后来，尽管斯诺于1942年两度回到他工作和生活了13年的中国，但两次逗留的时间都很短暂。自1942年第二次离开中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竟使他在相隔19年之后才旧地重游。但时过境迁，这时已是“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了。

旧貌换新颜

物换星移，时光流逝。新中国诞生已经整整11个春秋了。

北京的中南海，林木葱郁、碧波粼粼。在中海西侧的颐年堂里，毛泽东主席正同阔别21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亲切交谈。斯诺是1960年6月28日应邀来访的，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来华。昔日的旧中国，如今已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对于在旧中国曾生活了13年之久的斯诺来说，感慨良多。他多么希望能再见到毛主席，把他的感受以及这21年来世界的变化同毛主席交谈。他的希望没有落空。10月22日，毛主席把他请到中南海来共叙旧谊。

毛主席仔细端详着斯诺说：“一隔就是21年。”这句话包含着多少含义

和感慨。21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却又是漫长的时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世沧桑”，过去破国民党层层封锁、仅在西北贫瘠的陕甘宁边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而今已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无怪乎斯诺感慨他说：“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毛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问道。

“我是指的全中国”，斯诺幽默地回答说。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主席说着，吸了一口烟，关切地问斯诺：“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她今年9岁了。”斯诺说。

“怎么才9岁？”毛主席不解地问。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斯诺解释说。“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毛主席回忆说。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斯诺说。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毛主席略一思索，从斯诺这次来华的曲折经过，联系到目前的中美关系，他说：“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不是还没有解决吗？大概要过一时期才能达成协议。”

“我希望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斯诺充满希望他说。

毛主席和斯诺这对老朋友，因阔别多年，所以这次重聚，倍感亲切。谈话兴致极高，内容涉及广泛，既有老朋友的述旧抒怀，又有对感兴趣问题的共同探讨；既回忆根据地的艰苦岁月，又畅谈新中国的种种变化；既谈到中美关系目前的僵局和对未来的展望，又谈到对苏联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的不同看法。他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谈到高兴处，不禁开怀大笑。

谈到中国的变化时，斯诺深有感触他说：“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40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了。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

毛主席对斯诺的这种心情完全理解。但是，对中国目前的状况，特别是由于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以及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误造成的经济困难，斯诺可能感受不深。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变化在革命方面，在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所以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斯诺转了个话题，问毛主席。

“我今年67岁了。如果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接着毛主席

阐述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认为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中国，不管中国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是要担负的。中国不会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象孙行者大闹天宫那样。他以坚定的口气表示：“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是我们要坚持的。”毛主席这种鲜明的观点和坚定的立场，再次给斯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0年11月15日，斯诺又带着丰硕的成果，即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和参观访问的笔记和照片离开了中国。1962年，斯诺以这次访问为基础，写出了著名著作《大洋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一书。

中美两国总有一天会接近的

1964年10月8日，斯诺再次访华。这时中国已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各条战线都呈现出勃勃生机。1965年1月9日晚，毛主席在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了从上海、南京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的斯诺，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斯诺每次来访，毛主席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见老朋友，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而斯诺也从同毛主席的交谈中，得到启迪，开扩眼界，增长知识，受到鼓舞，更加崇敬和钦佩毛主席。斯诺由衷地对毛主席说：“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毛主席这次同斯诺交谈，也和往常一样，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无拘无束，无所不谈，从中国的计划生育谈到宗教信仰，从中国革命谈到第三世界，从中苏论战谈到越南战争，从纸老虎谈到原子弹，从裁军谈到联合国，所谈内容广泛深刻。

斯诺谈到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时激动他说：“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毛主席问。

“1936年。最集中的是与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2年半学到的还要多。”斯诺感慨地说。

毛主席赞同地点了点头说：“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提到保安，许多值得卧亿的往事又一一浮现在眼前：那简朴紧张的生活，真诚质朴的边区军民，低小简陋的窑洞，油灯下与毛主席促膝的长谈，这一切，对斯诺来说是那么的亲切难忘，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热爱中国人民，热爱毛泽东主席。他始终想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竭尽所能，想通过自己的纸和笔来沟通两国之间的交往，缩短两国之间的距离，消除两国之间的隔阂，传递有利于改善关系的信息。他对目前中美两国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他内疚地对毛主席说：“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毛主席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你认为中美关系真有改变的希望吗？”斯诺征询地问毛主席。

“是的，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毛主席肯定地回答。

“我并不认识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

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斯诺善意地提出这个问题。

对斯诺的提议，毛主席是欢迎的。但对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对世界形势了如指掌的毛主席来说，绝不会在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时，冒然采取任何不切实际的行动和步骤，所以，对斯诺的提议，毛主席只用两个字来回答：“没有。”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法国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日本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也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却未予登载，这说明约翰逊政府没有丝毫改变对华政策的迹象。斯诺回到美国后，经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总统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估计，国际交往，性急不得，只能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时，才能有积极成果。

在天安门城楼上

10月1日，北京秋高气爽，菊茂花香。

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红旗似海，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的斯诺夫妇，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对于斯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斯诺是时隔5年之后，于1970年8月14日偕夫人洛伊斯·惠勒再次来华访问的。到京不久，就前往陕北志丹县，即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保安。旧地重游，思绪万千。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谈的地方，感到特别的亲切。昔日的古城，而今已“旧貌换新颜”。30多年的巨变，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周恩来总理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斯诺深情他说。

“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周总理诙谐他说。

昔日的情景，唤起了不少难忘的回忆。斯诺激动他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你现在是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周总理真诚地说。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主席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主席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主席说。

毛主席一眼就看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热情地和斯诺握手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欢愉之情，溢于言表。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他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主席关切地问。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主席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主席：“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2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说着，毛主席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主席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毛主席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动人情景，万分激动，眼睛也湿润了。毛主席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这张照片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出来。这是周恩来总理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含蓄的信息。可惜的是，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顾问当时都没有理解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微妙的作法，而被忽略过去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中美关系的重要信息

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宽敞明亮。四周靠墙处竖立着高大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靠窗的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放着书刊和手稿。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庭院景色，老槐苍柏，在冬日里依然苍绿。毛主席和斯诺坐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促膝长谈，气氛和谐亲切，感情真挚诚恳。斯诺是他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会见后，毛主席于12月18日一大早，又把他接到这里，再次同他谈心，这次谈话和往常一样，是两个老朋友的感情交流，是一对知己的倾心叙怀。从“文化大革命”谈到反对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从中国的建设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这是毛主席晚年同外国友人谈话最长的一次。

毛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和斯诺交谈。当斯诺谈到5年前毛主席同他谈话曾说过中国确有人崇拜时，毛主席感慨他说：“现在崇拜得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说着，带着征询的口气问斯诺：“你对这些事怎么看？”

“我认为有点过分。不知那些搞得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想这样来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泽东主义者。”斯诺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严肃他说：“就是，假的。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你没有受这一套骗是对的。”

这时斯诺想起两个多月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曾告诉他对目前的情况“不满意”，于是请毛主席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毛主席心情沉重他说：“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说着，用脚比划了一下。“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用各种虐待方法，非常落后。”毛主席愤愤他说，这些人“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说到这里，毛主席显得有些激动，用手指了指斯诺，又指了指自己说：“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听了毛主席的肺腑之言，斯诺也很激动他说：“我很感谢你。”

“我不喜欢人家世故，我喜欢把我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毛主席动情他说。

毛主席一直视斯诺为知己，对他极为信任，这次请他来，除了解答他所提的问题外，还希望他在沟通中美两国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毛主席对美国人民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所以应改变过去的作法，左中右都让来。特别是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毛主席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胸襟，高瞻远瞩，幽默地对斯诺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

“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斯诺问。

“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说着，毛主席望着吐出的冉冉青烟，陷入了沉思，希望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斯诺回国后，相继在1971年4月18日、25日、5月9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他这次访华的观感；4月30日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毛主席对他的谈话，透露了毛主席愿意与尼克松总统面谈的信息，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了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尼克松总统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我希望，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本政府若干时候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斯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重望，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斯诺病逝前后

中美在接近。斯诺欣喜异常。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7月15日发表了让全世界都吃惊的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公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中国时，带来了87位新闻记者，可惜斯诺不在此列。本来斯诺是最有资格采访这次历史性会见的，但他却早在1971年12月15日就躺在瑞士洛桑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在他的腹腔里发现了一个网球那么大的恶性肿瘤，已无法取出。

斯诺一生奔波。他青年时期来到中国，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使他在旧中国一住就是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3次来华，先后又一共住了1年。由于他同毛泽东主席、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交往，使他遭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能住在美国，而侨居瑞士。现在他重病在床，其夫人洛伊斯只好将斯诺的病情电告中国政府。斯诺的病立即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关切。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建议请斯诺到中国治疗。斯诺经过再三考虑，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愿拖累中国。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写信慰问，斯诺极为感动。1972年1月22日，毛主席、周总理派马海德带去一个中国医疗专家小组，要接斯诺来华治疗。这时的斯诺已经不起长途旅行的颠簸。马海德俯身向斯诺转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躺在病榻上的斯诺非常感激，他用微弱的声音，缓慢他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当前的困境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动。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我热爱中国，我不愿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朋友是不能去做违背病人心愿的事的。中国医疗小组对斯诺进行了精心的护理。但是病情在恶化，最后是长时间的昏迷。2月15日凌晨，斯诺在睡眠中平静地停止了呼吸，享年66岁。当晚，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副主席都发来了唁电。毛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的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2月19日，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追悼斯诺先生。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等参加，毛主席、宋庆龄副主席献了花圈，毛主席献的花圈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中国的朋友埃德加·斯诺”。5月16日，斯诺的部分骨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安葬，毛主席送去了花圈。斯诺夫人洛伊斯在回忆这段时间毛主席对斯诺的关怀和情谊时，深情地写道：“他（指毛主席）是酷爱友谊的。1972年初，当他得知我的丈夫病重的消息后，就派遣了一支有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到埃森来（瑞士的一个村庄，洛伊斯·斯诺住在这儿），一直到最后——1972年2月15日，这些医生和护士轮换守护在他的床头，在房间里至少经常有两位大夫和一位护士。这不只是对一个病人的照料，这是对一位朋友、一位亲爱的人的真正安慰。”

毛主席是斯诺大半生所崇敬、宣传的伟大政治家。毛主席一生中所见过的外国朋友难以计数，但毛主席同斯诺的交谈，不管是从时间的长短、内容的广泛和问题的深度来看，都是其他外国人所不能比拟的。毛主席对斯诺的信任和厚爱不言而喻。斯诺通过他的几十本著作，赢得了“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的声誉。毛泽东与斯诺的这种真挚情谊，正如中国古人所云：“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

(袁征万振)

一幅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与三个美国士兵

一幅珍贵的照片

1976年7月的重庆，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季节，骄阳似火，灼热闷人。地处西北郊化龙桥附近的“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周围翠竹林木，葱葱郁郁，在林荫的掩映下，透过山风，给到这里参观游览的中外游客带来一些清凉的感觉。在二楼毛主席曾居住过的一间简朴整洁的房间里，一位身着夏服、头发斑白的外国老者，正惊讶地凝视着墙上悬挂的一幅大照片。这是一张发黄的黑白旧照片，是毛主席30多年前在这里同三个美国年轻士兵的合影照。照片中毛主席面带微笑，一头浓密的黑发向后梳着，身穿一件灰色中山服，显得那么纯朴慈祥，在他身旁并排站着三个年轻的美国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喜悦的笑容，整幅照片是那样的和谐亲切。这位外国老人名叫爱德华·贝尔，他是随美国退伍军人代表团来华参观访问的。这个代表团是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中国驻扎过的老兵以及他们的家属组成的，这次到重庆参观，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回忆过去。贝尔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30多年前和毛主席一起的合影照片。当时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惊喜之余，急忙跑出屋子，找到霍华德·海曼和其他代表团成员，让他们共同来欣赏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其实，贝尔本人就精心珍藏着一张内容完全一样的照片，他曾多次拿出来给亲友看过，向他们讲述这张照片的来历。但此时此刻，中国向公众展示这幅照片，说明对这幅照片的重视，这不仅说明毛主席平易近人，谦虚诚挚的风范，而且也反映出毛主席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寄予深切的期望。

贝尔急切地想知道这幅照片悬挂的经过，他向纪念馆工作人员询问了有关情况。

红岩村原系进步人士饶国模先生“大有农场”的住宅，这里山遮林蔽，很是僻静。1938年底，日寇飞机轰炸重庆，十八集团军在渝办事处的房屋被炸，在饶国模先生的资助下，办事处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将这一住宅改建为一楼一底及隐蔽顶楼的砖木结构三层建筑。1939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迁此办公。当时国民党亦在办事处四周山坡上建立起宪兵、警察和秘密特务机关，构筑机枪阵地和瞭望台等，进行监视。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就下榻在红岩村二楼，在这里休息、看书和工作，平时的接待会客都是在城内张治中将军的“桂园”进行。据曾跟随毛主席赴渝担任警卫的齐吉树同志回忆，毛主席在红岩村会见的客人不多，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会见郭沫若夫妇，一次就是三个美国士兵。1947年3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办事处人员也全部撤离重庆，返回延安。全国解放后，1958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改建为“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按当时原样进行修整复原，就把这幅照片悬挂在毛主席曾经住过的这间房子里。

“北方还有一个中国”

和毛主席合影的三个美国年轻士兵是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

克·埃德尔曼。他们都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军士，1944年派驻我国昆明，此后不久，又调往国民党战时陪都重庆。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中国的黑暗和腐败，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到处是卖淫和死亡的现象。同时，他们也结识了一些有为青年，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和教师，会讲英语，充满爱国激情。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信任和友谊。1944年霍华德·海曼在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就热情洋溢地谈到这些青年朋友。他写道：“我结交了几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的人。他们都很穷，都是从日本占领区逃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遇到这样爱国，这样精力旺盛、充满活力，这样渴望为改善国家状况而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人们。我确信，如果中国掌握在合适的人手里，即使有一半的机会，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家和一个十分美好的生活之地。”这些中国朋友，也向他们介绍了延安的窑洞，著名的长征以及深受劳动人民爱戴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等等令人倍感新奇的情况。从中国朋友的口中，他们始知“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击日本法西斯。同时，据给美国设在延安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美国空军机组人员讲，“另一个中国”里有些不一样，令人感到清新。此外，他们还知道共产党在重庆设有一个办事处，美国和其他外国的新闻记者经常去那里获取新闻等消息。这一切，都使海曼他们对“另一个中国”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很想了解它的情况，到那里亲眼看一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蓄意挑起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为此，玩弄起假和平、真备战的诡计。“假戏真做”，从8月14日到23日的十天内，蒋介石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为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教育国统区人民，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以一个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决然地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共商和平团结建国大计。毛主席的这一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内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鼓舞了山城人民。

海曼他们听说被国民党悬赏缉拿的“北方中国”的领袖已来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真是个好机会。他们三人带着怀疑、好奇、崇敬的复杂心情合计着，要亲自去拜访这位闻名已久的传奇人物，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感觉去领略一下这位“北方中国”领袖的风采。

他们开始着手准备。从传闻的一些情况，他们得知毛泽东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甚至听说毛泽东在延安还自己种烟草。于是，他们从自己配给的香烟中拿出几条美国香烟，写了一封对毛泽东表示崇敬、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前途的短信，把它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同时，他们还通过大学里的朋友，见到了周恩来，向他表达了渴望拜会毛主席的意愿。他们满怀热切的希望，焦急地等待着，迫切地盼望着。几天以后，终于得到回答，毛主席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且还邀请他们到办事处去一起吃饭。这是多么让他们兴奋的喜讯，中国历史上这样伟大的人物，是正在忙于处理世界历史上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大事的人物，愿意抽出时间，同三个普通的美国士兵会见，并一起吃饭，这怎么不让海曼他们惊喜和激动呢！很显然，毛泽东会见美国普通士兵，说明他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何等重视。

和毛主席一起照相

1945年9月16日下午，虽然已是金秋季节，但重庆仍然比较炎热，和煦的阳光，照得人们暖洋洋的。通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红岩村的路上，海曼等三人身着戎装，背着背包，急切地向红岩村走去。在距红岩村坡下不远的黄果树附近，负责担任警卫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的武装宪兵，见三个美国大兵走来，他们一改往日盛气凌人的架式，也不敢上前去盘查和询问，目视着美国大兵从身边走过，登上了去红岩村的石阶。

红岩村是一座三层建筑，白墙青瓦，底层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二楼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地，顶楼是机要室。毛主席抵渝后，就将二楼改作毛主席及其随员的住房和办公用房。

海曼三人拾级而上，走进办事处的接待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整洁朴素，靠里的一端有一扇门，上面挂着一个竹帘子。工作人员笑容满面，热情地迎了上去，“请坐，毛主席马上就出来。”过了一会，竹帘掀动，一个身材伟岸，清瘦有神，面含微笑，身穿一件极普通的卡机布做的灰色中山服的入走了进来。这就是毛泽东！是他们心目中盼望已久的“北方中国”的领袖。海曼等人怀着忐忑不安、紧张、新奇的心情，注视着毛主席。

“欢迎你们。”毛主席微笑着向他们问好，一一同客人握手，并热情地将客人请到客厅。海曼他们打开背包，腼腆地拿出准备好的香烟，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受送来的礼物，向他们致谢，风趣他说：“你们太慷慨了。”

毛主席的亲切随和，使客人们感到毛主席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富有人情味，这与他们过去听到的各种传闻大相径庭。刚来时的紧张、拘束的心情一扫而光，无拘无束地和毛主席攀谈起来。

毛主席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情况和北方解放区的情况，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询问了客人们的身世、家庭和在美国的生活状况以及对战后生活的愿望；而且还向他们了解有关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专心致志地倾听客人们谈的各种问题。52岁的毛泽东和20刚出头的美国士兵成了忘年之交，他们之间谈天说地，无拘无束，气氛和谐热烈，交谈亲切随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太阳也渐渐西坠。

“你们是否想照张像？现在太阳还未下山，抓紧时间拍一张吧。”毛主席饶有兴趣地提议。客人们听了毛主席的提议，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跟着毛主席来到门口芭蕉树下，簇拥着毛主席，摆好姿势，照了几张集体照片，记录下这个愉快、难忘而有意义的时刻。

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主席请客人们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前入座，共进晚餐。周恩来也来作陪。气氛十分活跃、友好。毛主席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好，请客人回国后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民。毛主席认为，中美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毛主席还满怀激情，十分乐观地谈到海曼他们的前途，谈到所有青年的前途。因为毛主席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此刻，海曼等人似乎忘记毛主席是近一亿解放区人民的领袖，是一支拥有一百多万革命战士的最高指挥官；也忘记了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人类少见的诗人，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知心朋友，一位尊敬的长者。这次会见和宴请，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毛主席亲自将客人送出大门。

当晚，爱德华·贝尔回到兵营，按捺不住心中喜悦的激情，打开笔记本

写道：“毛主席个性不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非常谦虚”，“从不高腔大调他讲话，从不激动，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霍华德·海曼在毛主席逝世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深情地写道：“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

毛主席和美国普通士兵的会见，说明毛主席历来就重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重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就更有意义，更令人追思。

（袁征万振）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与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也并不陌生，大多数中年以上的人，都听说过她，不少人都读过这位美国优秀记者的文章；对于世界大多数进步人士来说，其知名度也是很高的。

斯特朗之所以闻名世界，主要是因为她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进行过多次重要谈话。毛主席在同她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斯特朗 1885 年 11 月 14 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08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她曾大量阅读过进步书籍，参与列宁著作的编译工作。1921 年她亲赴苏俄访问，从 1922 年起以国际新闻记者身份常驻苏联，给美国 and 苏联的报刊撰写过不少文章。1925 年，在她 40 岁时来到处于革命高潮的中国。她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之后又深入中国的农村、城市，对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进行研究。1928 年她写出《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1946 年 6 月，她又来到中国，这时，她已是 61 岁的老人。她此行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这也是她首次和毛泽东交往。

当时，正值蒋介石对包括延安地区在内的所有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解放区人民经受着严重的考验。毛泽东冷静而坚定地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边区保卫战。他认定：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

斯特朗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陕北解放区的。

8 月 6 日，她乘卡车前往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可是，天不作美，一阵暴雨，使延河水骤然上涨，路面被混浊的河水淹没，汽车无法过去，斯特朗只好返回自己的住处。第二天，斯特朗又在陆定一的陪同之下，乘卡车来到了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因为天热，毛主席把客人请到窑洞外一个土台上，附近几棵果树枝繁叶茂，使本已十分浓厚的乡土气息更富诗意。

斯特朗是第一次坐在这位举世闻名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面前，她仔细观察着毛泽东。斯特朗后来写道：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行动缓慢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变得生动而幽默。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的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

斯特朗回忆说，毛泽东的思想轻快地邀游了全世界。他首先询问了有关美国的情况。斯特朗认为，毛泽东对美国的了解，比自己对自己国家了解的还多、还深刻。斯特朗感到惊讶。

斯特朗问毛泽东：“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希望没有？”

毛泽东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態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斯特朗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

毛泽东回答说：“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有这样的愿望。”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斯特朗问。

毛泽东坚定他说：“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毛泽东说：“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斯特朗突然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

毛泽东略一思索，以坚定的口气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接着，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队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大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主席同斯特朗的谈话。是由陆定一同志翻译的。因此，在谈话中，有过一段意义深远的花絮。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陆定一同志按照过去列宁讲过的类似的比喻，把纸老虎翻成“稻草人”。毛主席认真地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够好。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版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斯特朗了解到两种译法的差异之后，认为毛主席的比喻既鲜明，又充满诗意。

毛主席在同斯特朗的谈话中，还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作例子，说明一切反动的东西，都会被人民的革命洪流所冲垮。然而，毛主席还作了另一种假说：如果蒋介石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毛主席在同斯特朗进行的另一次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人民的不觉悟。人民的觉悟是根本问题。

毛主席的话富于哲理，内容丰富生动，通俗易懂。使首次聆听毛主席谈话的斯特朗忘掉了一切，谈话结束已是午夜。毛主席一直把斯特朗送到卡车旁。当汽车驶出杨家岭沟口时，斯特朗回头远望，发现毛主席还稳稳站在那里。

斯特朗回忆说，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同她的谈话成为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毛主席还把美国援助蒋介石武器形象地称之为输血。他说，美国输给蒋介石的武器，蒋介石又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斯特朗断言，“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毛主席首先同斯特朗提出的这个论断，武装了中国人民，加强了战胜强大敌人的信心。正是在毛主席的思想武装和鼓舞之下，中国人民及其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是，仅仅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800万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

斯特朗第一次去延安，一住就是8个月。她多次见到毛主席，或者在聚餐会上，或在京戏台子前，或在舞会上。

毛主席在延安指挥着全国各个解放区的人民及其军队的胜利斗争。毛主席、中共中央和延安，自然就成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千方百计予以攻击的目标。蒋介石于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和胡宗南配合，一度占领我解放区240个城市，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之下，不仅收复135座被占城市，更重要地是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71万人。为了战略的需要，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暂时避开入数众多的胡宗南军队，撤离出延安地区。就是在大部分军民撤离延安的时候，于1947年3月之初，毛主席再次会见了斯特朗。

这次会见，周恩来同志也在座。这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毛主席为斯特朗“饯行”，因为第二天，斯特朗将乘飞机飞往北平。

延安尽管已是十窑九空，但毛主席还是镇定自若，瓜子、花生、糖和茶为这次谈话增添了祥和气氛。

毛主席向斯特朗介绍了延安地区形势，并且告诉这位友人：“等到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再来。”毛主席分析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时指出：美国反动派背着沉重的负担。他要豢养全世界的反动派。假如他不豢养他们，他们就会象没有柱子的房子一样倒塌。然而，就象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最后也会证明不过是纸老虎。强大的是美国人民，他们是真正有力量的。

斯特朗说，毛主席的话“就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名言所阐明的就是真理”。

毛主席在延安同斯特朗的几次谈话，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在以后的几个时期，又被他不断完善、不断地补充，使其不断丰富和发展。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毛主席再次提到这一个观点。毛主席说：1946年蒋介石向延安发动侵犯时，“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个美国记者到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他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毛主席说：“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关于纸老虎的思想。毛主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变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

破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 1949 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鼓舞着中国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强大的敌人。

1958 年 9 月，斯特朗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之下，以 72 岁的高龄第六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中国已旧貌换新颜，炮火连天的时代早已结束，社会主义的中国沉浸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之中。

斯特朗，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这次来华后便定居下来，在中国安度晚年。她 1970 年 3 月 29 日在北京逝世之前，又多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武汉东湖宾馆，毛主席几次同她畅谈。

毛主席同斯特朗的交往，是有历史意义的交往。毛主席对斯特朗所阐述的伟大真理，将永远成为进步人类斗争的犀利武器，成为人民战胜困难、战胜黑暗、战胜邪恶的武器。

（袁征）

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与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11时27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76年精神号”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周恩来总理前往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检阅三军仪仗队。然后，周总理陪同尼克松前往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尼克松抵达宾馆，刚刚吃过午饭，毛泽东主席便破天荒地提出要会见他。按惯例，毛主席通常要等到外宾离开中国的前一两天才会见他们。尼克松对这种礼遇由衷的感激。

很快，毛主席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当尼克松走进书房里，毛主席站起来，微笑着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大概两人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过来。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标志着这两个大国结束了将近1/4世纪的对峙与对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尼克松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从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那一时刻起，所有重要活动的场面都被及时传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毛主席同尼克松的会见，被尼克松称作“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的中国之行推向了高潮。

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尼克松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安排。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而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尼克松特意安排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时30分，也即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10时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

是共同的利益把中美联在了一起

中美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将近1/4世纪。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第37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继续扩大侵越战争，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中国领空、领海。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边境冲突白热化。

美苏均以中国为敌。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召开。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报告认为，美苏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们决不可以忽视美苏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尽管如此，但毛主席仍然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当时，中国同美国、苏联的关系，远远不如美苏之间的关系。如何改变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夹击之中的处境，是毛主席苦苦思索的问题。“九大”刚刚结束，毛主席便指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师进行国际形势座谈，由

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上报周总理，再转呈毛主席。

自 1967 年因所谓“二月逆流”一直靠边站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毛主席提议，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其中叶剑英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

四位老帅尽管已是古稀之年，但仍个个精力充沛。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他们或是统帅千军万马、所向披靡的主帅，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儒将。建国后，陈毅长期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叶剑英多年主掌军事科学院，徐向前曾任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聂荣臻几乎一直负责国防科研工作。这些经历，养成他们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当他们摆脱了繁杂事务的羁绊，全身心投入到国际形势研究时，智慧的火花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老帅们很快便从扑朔迷离的国际角逐中找到了中国的位置。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讨论，四位老帅于 7 月下旬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由陈毅定稿，上报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

四位老帅在报告中提出了同当前国内舆论截然不同的看法。当时国内舆论宣传给国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美苏一方面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尼克松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因中美距离遥远、美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等原因，美不敢轻易进攻中国。苏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比美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还有很大的顾虑和困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苏扩张是挤美的地盘，“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这一结论勾划出了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中美苏大三角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两个月后，陈毅又向周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一些设想。即：

一、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如果美国提出类似建议，我们应该接受。

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谈，以利保密。

毛主席对这些建议和设想十分重视。由于中美两国多年的隔绝状态，双方互不了解，每天出现在双方报纸上的言论和政界人士的谈话，仍是互相敌对的。毛主席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并经反复观察之后，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

1970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毛主席同斯诺合影的照片很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

紧接着，毛主席于 12 月 18 日再次会见斯诺，作了 5 个小时的长谈，主要话题是中美关系。

毛主席告诉斯诺：“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中的左、中、右都来访

问中国。”

毛主席说，“目前中美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音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这次谈话为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定下了基调。

就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决策的同时，尼克松也采取一系列改善两国关系的步骤。从美国利益出发，尼克松甚至步子迈得更大、表现得更主动。

尼克松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反对新中国的头面人物，但尼克松又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侵越战争的失败，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使他终于明白，美国已经不能完全支配世界了。如果没有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加上苏联利用美国陷于越南战争中的困境，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采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也使得美国不得不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1969 年 7 月下旬，几乎在陈毅等四位元帅提出书面报告的同时，美国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

接着，尼克松利用出访机会，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领导人传话，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安排，希望同中国对话。

12 月中旬，美国两次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并称“希望这些步骤能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12 月底，美国第七舰队开始减少在台湾海峡的舰只和巡逻活动。

1970 年 1 月 20 日，在美方的积极倡议下，在驻华沙中国大使馆内举行了第 135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 2 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2 月 20 日，双方又举行了 136 次会谈，双方就美派高级使节访问中国交换了意见。

就在这时，美国借口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庇护所”，于 4 月 30 日派兵入侵柬埔寨。中国作出强烈反应，取消了原定于 5 月 20 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毛主席在 5 月 20 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美间停止了联系。

此后美方多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并在 6 月底撤出侵柬美军，一度中断的中美联系重新恢复。

8 月 26 日，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美国石油公司给进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这是尼克松政府逐步取消对中国贸易禁运措施的第一项。

9 月 27 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再未举行，但中美之间另外开辟了两国领导人沟通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1970 年 10 月下旬，即毛主席会见斯诺不久，尼克松会见正在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请他向中国捎话，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说美国愿意派一名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至此，中美相互接近的趋势再也无法改变了。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尼克松曾经说过：“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

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小球带动了大球

1971年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这时，中国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绝缘了6个年头，外界要求中国乒乓球队重返世界乒坛的呼声日高，甚至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比赛。

当时国际形势仍很严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同中国接触，但尼克松和美国政界人士仍频频表示“不放弃对中华民国的义务”；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日活动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将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在听取汇报时，周总理当即表示，中国乒乓球队应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当场抽出笔来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写完马上由秘书送去。

毛主席收到报告后，当即批示“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同世界体育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运动员遵照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泛开展“乒乓外交”。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球艺和友好态度广泛影响了各国运动员、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

在同美国运动员接触中，对方几次提出想访问中国，中国队均以“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说词予以婉拒。但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天，中国乒乓球队从比赛馆乘车回旅馆。美国队球员科恩无意间跳上了满载着中国运动员的大轿车。当他发觉上错了车时，有些尴尬。这时，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打招呼，并亲切地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庄则栋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画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当即表达了访华愿望。

因为出发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队员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庄则栋与科恩接触的情况，马上被报告了国内。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运动员接触的消息，马上在当地传开了，并引起西方新闻媒介的普遍关注，甚至连正在莫斯科召开苏共24大的新闻都不如这条消息更吸引人。

深夜，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里。

毛主席正在阅读新华社摘编的反映世界各国动向的“大参考”，他也被西方新闻媒介连篇累牍的报道所吸引。

当毛主席不久前看到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的简报后，就提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国内的电话联系由每天2次增加到4次，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几天前，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运动员要求访华一事联合提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周总理批了“拟同意”三个字，毛主席也画了圈，并由秘书作了传达。

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使毛主席重新考虑起这一决定来。他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来，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此时让就在家门口的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是否有利？现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近尾声，如不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那他们就打道回府了。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容易进入脑细胞的兴奋状态，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在战争年代，部队白天要行军作战，只有到晚上才能架起电台进行联络。各地载着十万火急战况的电波汇集到毛主席这里，往往要马上作出决定，然后及时答复，当这一切完成之后，一个不眠之夜便过去了。久而久之，他体内的生物钟节奏，几乎变成了晚上工作，白天休息。进城20多年了，但毛主席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

此时，毛主席隐隐约约地感到某种时机来了。他仍象战争年代那样善于捕捉战机，如同进行一场战略决战一样，只要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就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者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天蒙蒙亮时，毛主席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天上午，信息传到了名古屋。

三天后，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8人——9名运动员、4名兵协人员及2名家属和3名记者走过了罗湖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来访的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小球带动了大球。

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双方发表了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9月，发生林彪事件，中美关系继续发展。

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为尼克松访问中国作了安排。

1972年1月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做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

这一连串的新闻，使得全世界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國。

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周总理亲切和蔼的笑容，诚挚友好的谈话，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

小球确实确实带动了大球。

建造一座跨越时代的桥

毛主席同尼克松的会见是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美方参加会见的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随员洛德。毛主席谈笑风生、风趣幽默，尼克松妙语连珠，双方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会见是在寒暄中开始的。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

了什么，没什么可学的。”尼克松恭维道：“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主席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主席挥了一下手对尼克松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指双方的会见）”。“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主席叫他做什么？”

当翻译将这个问题译出时，毛主席笑了。

周总理作了回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匪’”，“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主席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主席喜欢海阔天空地漫谈，在无拘无束的漫谈中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同尼克松的这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在毛主席的引导下，从一个问题到一个问题，台湾、印度支那、反霸斗争、扩大中美交流等等，这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主题，在毛主席诙谐随意的谈吐中一展示出来。

当谈到大选的话题时，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同他打交道。”

尼克松说：“这个我们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毛主席爽朗地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

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我喜欢右派。”毛主席说，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有派，说英国希思首相也是有派……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有派。“这些有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社鲁门到约翰逊的这几位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在那段时间，你们也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

尼克松接着想谈台湾、越南等问题，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

毛主席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就谈成了），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2年多了。”

对于扩大贸易和交流，毛主席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对美国的倡议过了2年多才缓缓作出答复。他说中国的做法是“官僚主义的”，一直坚持必须先解决大问题，才能提出贸易和人民交往之类的小问题。“后来我才明白你们是对的，所以，我们打了乒乓球。”毛主席被讨论吸引住了，原定15分钟的会见时间已经超过。尽管很疲劳，但毛主席仍很活跃。

尼克松说：“我读过主席的一些著作，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

毛主席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毛主席探身向前，微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说：“我们大家熟悉主席的生平。主席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位置。我也出身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位置。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当尼克松告辞时，毛主席称赞尼克松《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的书太多了。”

毛主席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然后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我想）一定要谈成”。“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双方已经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会见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但却勾划出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轮廓。

会见完的几小时后，新华社发表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消息，称这次会见是“认真坦率的”。

访华期间，尼克松向毛主席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而毛主席向尼克松赠送了3幅令人费解的条幅，分别书写着“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看花”。

尼克松向周总理献了一份“礼品单”，上面开列的“礼物”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此外，还有2009人的遗骨。原来这份“礼品单”列的是1945年被美军潜水艇击沉的日舰“阿波丸号”所载的货物和乘员。当年，“阿波丸号”满载着这些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回国途中被击沉。美国从卫星上探测出沉舰的准确位置——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岛附近。尼克松把这份资料作为他首次访华的礼物献给了中国（从1977年1月起，中国根据美方提供的资料进行打捞，除金锭、白金未发现外，打捞到的金属数量与“礼品单”上的基本相符。同时打捞上来的日本人员遗骨、遗物，全部送还日本，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代表死者亲属对中国政府深表感谢）。

尼克松还代表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对产于北美寒冷地区的稀有动物麝香牛，而中国人民则向美国人民赠送了两只珍贵的大熊猫玲玲和星星。

2月27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28日发表），在晚上的告别宴会上，尼克松满怀信心地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1.6万哩和22年敌对情绪的桥。”

毛主席同尼克松的会见给双方都留下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对尼克松在中美关系上的突破非常赞赏，尽管因“水门事件”尼克松被迫辞职，但毛主席

认为对“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词了，并自1974年底起，几次通过来访的外国要人传话，邀请尼克松访华。为了表示同尼克松的特殊关系，他还在1975年底会见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这在毛主席晚年同样是件破天荒的事。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4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此时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当年美国总统的显赫地位，但毛主席和中国政府仍给予他“总统的礼遇”。毛主席不顾重病缠身，会见了尼克松，两人象老朋友重逢一样，进行了1小时40分钟的谈话。

毛主席步履艰难、言语不清，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同尼克松互致问候结束，便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尼克松对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十分钦佩。当尼克松引用毛主席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来描述中美关系前景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两人的决心。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一位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外宾，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来自发达国家的客人。

半年后，毛主席与世长辞。尼克松于当天发表声明，赞扬毛主席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是一位“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是一位“完全献身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声明称：“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自罗斯福起，历届卸任总统都建造个人图书馆，收藏任职期间私人文件和珍贵文物等。在尼克松图书馆的陈列室里，竖立着10尊同真人一样大小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人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首相邱吉尔……其中最前排的是身着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由此可见，毛主席、周总理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

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曾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继任的几位美国总统，尽管在其他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但在发展中美关系问题上却有共同的承诺。1979年中美建交，1982年中美就美国售台武器达成协议，使中美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得到了一个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从此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左军）

与神秘使者的会晤 ——毛泽东与基辛格

据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一心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是为了名垂青史，二是为了四年后连任总统。反复权衡后，他选定了同中国改善关系，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这样，主张“均势外交”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博士便成了推行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理想人选。

基辛格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崇拜梅特涅、俾斯麦等擅长均势外交的政治家，加上他熟读毛泽东著作，阅读了大量介绍毛泽东言行的新闻报道，对毛泽东和新中国有较多的了解。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他积极推动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

由于中美两国长期敌对，互相缺乏了解，双方迫切需要直接接触。但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每次都互念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另辟蹊径。为了物色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间人，足足花费了一年半还多的时间，最后找到了沟通双方联系的“巴基斯坦渠道”。此后通过这条秘密渠道，飞鸿传书，彼此逐渐摸清了对方的意图，并达成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备忘录。

毛主席原主张基辛格公开访问中国。他曾经说过，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但尼克松担心消息透露出去，国内政治阻力较大，易造成被动，坚持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6月2日傍晚，基辛格在华盛顿白宫收到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迦·希拉里转交的来自北京的复信。

信中说：“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复信照例是无头衔、无签署的备忘录。

当基辛格把刚刚收到的备忘录交给尼克松时，他们十分激动。尼克松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并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在晚饭后同基辛格举杯祝贺。

当晚9时半，尼克松和基辛格坐在放着1971年4月30日《生活周刊》发表的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和在天安门城楼上照片的案子前。

尼克松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说：“毛泽东去年就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为什么？”

基辛格说：“我懂得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

梅特涅（1773—1859年），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09—1848）和首相（1821—1848）。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和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任首相兼外交大臣期间，经常组织大国首脑会议，维护欧洲封建专制的统治，镇压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使奥地利一度称霸欧洲。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首相任内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巴黎公社。通过与奥、俄结盟，确立了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方面——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

为了保密，基辛格精心安排了秘密访华的计划，并取名为“波罗行动”。意为纪念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

7月1日，白宫新闻秘书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鲁斯磋商。在赴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同印度、泰国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基辛格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先西贡（2日至4日）、次曼谷（5日）、接着新德里（6日至7日），8日到了伊斯兰堡。在叶海亚·汗总统为基辛格举行的晚宴上，基辛格突然伪装肚子痛，叶海亚·汗总统马上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请他到总统的别墅休养。9日凌晨，当人们还在梦乡时，基辛格偷偷登上了飞往北京的波音707飞机。当日12时，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基辛格在北京仅停留了48小时，但他先后同周总理等会谈近20个小时。双方就尼克松访华、台湾问题和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了预备性会谈。通过会谈，“神秘之邦”不再神秘，双方跨过了“最宽阔的大洋”。

毛主席没有会见基辛格，但整个会谈过程周总理都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指示。

当周总理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主席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听到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主席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

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主席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当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主席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双方发表的公告，不过200字，但最初的稿子中，双方有三处争议。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第一点，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毛主席曾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周总理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关于来访时间改为1972年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毛主席对修改的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当基辛格同周总理首次会晤时，基辛格称中国为“神秘之邦”，而周总理称双方的会晤是越过了最宽阔的大洋——“猜疑的大洋”。

这样写好，不然好象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主席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后来事实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经毛主席同意的公告稿，基辛格看后也很满意。认为这一稿中方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双方商定公告于7月15日同时宣布。

基辛格一行于11日午饭后乘原机返回巴基斯坦。基辛格对此次秘密之行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7月15日，公告发表。

公告原文如下：“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说，读这个公告只用了三分钟，但却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它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巨大震动。基辛格说，公告的发表，“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

当各国记者纷纷把注意力投向“巴基斯坦渠道”时，基辛格又在另一条新开辟的秘密渠道——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传递信息了。

原来，基辛格访华时就同周总理商定，中美之间华沙渠道不再恢复，双方确定把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的渠道，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分别为双方代表。

中美双方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了频繁的接触，为基辛格中期访华（即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小组访华直至尼克松总统访华等做了大量联络和信息传递工作。在中美“巴黎秘密渠道”开通近两年的时间里，沃尔特斯将军同黄镇大使会晤40多次，基辛格也曾4次前往巴黎同黄镇会晤。

基辛格每次都是乘军用飞机去巴黎，绕过海关和边防检查，夜里住在沃尔特斯将军家里，不仅美国驻法国大使馆人员不知道基辛格到了巴黎，就连沃尔特斯家的女管家也被瞒过了。原来，沃尔特斯住处的地下室有个汽车间，他把车一直开进去，并马上锁上车库的门，停好汽车，把基辛格带上楼。沃尔特斯向女管家介绍基辛格是他的朋友基尔希曼将军。后来她看见基辛格在电视台会见记者时，产生了怀疑。当时，她对沃尔特斯说她知道基尔希曼将军就是基辛格博士。沃尔特斯忙解释说，那怎么可能，基辛格是位大人物，总统特别顾问，要是他来巴黎，必定住在豪华的大使官邸，而不会住在他这个小小的寓所里。如果把这两个人分开来看，我的朋友基尔希曼将军确实很像基辛格博士，要是他们站在一起比较，两个人就一点也不像了。这一番话，又使女管家信以为真了。

同黄镇大使会晤时，基辛格既不坐带有外交牌照的车子，也不搭出租汽车，而是由沃尔特斯在汽车行租一辆很平常的车子并亲自驾驶。基辛格戴一副黑墨镜，戴一顶普通的法国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就这样，巧妙地躲过

了无孔不入的法国新闻界。

基辛格首次见到毛主席是 1972 年 2 月 21 日，他是与尼克松总统一同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尽管他们是首次见面，但实际上双方早就熟识对方了。

当毛主席同基辛格握手时，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基辛格一番，开口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回答：“我很高兴见到主席。”他还告诉毛主席，在哈佛大学教书时，就指导自己的学生研读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谦虚地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表示，只有毛主席才可以和他谈哲学。毛主席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什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毛主席又把脸转向基辛格说：“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同毛主席的首次见面，给基辛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到：毛主席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实际是线装书——编者），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象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导人的会客室。

基辛格接着写道：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他的地位和声望。毛泽东就站在那里，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这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

这就是基辛格——美国杰出的活动家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

1973 年 2 月 17 日晚，毛主席再次会见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的第五次中国之行了。他们象老朋友那样在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了坦率和广泛的谈话。基辛格还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等举行了会谈，并商定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互设联络处。

1975 年 10 月 19——23 日，基辛格第八次访问中国。这时的基辛格博士已是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了，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作准备。21 日下午，毛主席会见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美国国务院对外计划署主任）、乔治·布什（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毛主席由于疾病的缠绕，几乎不能正常讲话，但是，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这次基辛格访华，是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的。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毛主席了解到基辛格的这种观点，在第二大会见基辛格时指出：“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基辛格亲切地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毛主席用手指指头部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毛主席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毛主席接着开玩笑地说：“我是供来访者参观的展览品。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

帝的请柬。”

基辛格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主席笑了笑说：“好，我服从博士的命令。”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主席把中美军事力量比作小拇指和拳头的关系。熟悉毛主席著作的基辛格立即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主席在纸上写道：“Yes！”

毛主席还对基辛格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喜欢你们三人（指基辛格、洛德和布什）。”

基辛格在会见后谈到对毛主席的印象时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又避开了义务。他的话指定了一个方面，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象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这就是基辛格对毛主席既尊敬又崇拜心情的真实写照。

自1971年7月至1975年12月，基辛格博士曾九次访问中国，五次受到毛主席接见，他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基辛格博士所表现出的远见、智慧及不懈努力，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袁征左军）

苏格拉底（公元前496—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善于进行深奥的哲理争辩，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辩论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得名为苏格拉底的讽刺或反诘法。

满怀信心看未来 ——毛泽东与美国两位总统的后代

毛泽东向来都器重年轻人，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因为正是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毛主席在他晚年同美国一对青年夫妇——戴维·艾森豪威尔和朱莉·尼克松的一次友好会见，就再一次体现了他对青年人的爱护和希望。

戴维·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34届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儿子，而朱莉·尼克松则是美国第37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他们曾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于1975年底访华。12月31日晚，戴维和朱莉在我国外长乔冠华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住所，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当他们来到毛主席面前时，西单电报大楼上的时钟敲响午夜12点，已进入1976年元旦，这是一次“跨午夜的会见”。

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82岁高龄的毛主席费力地站起来。当他独自站稳之后，同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朋友握手表示欢迎。

戴维和朱莉都是首次拜访毛泽东主席。戴维凝视着毛主席，而久已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朱莉，则把目光移向一边，不好意思去仔细端详毛主席，因为她感到，正面凝视德高望重的老人，是一种不恭的表现。中国和美国被广阔的太平洋隔开，但是有关毛主席的书，几十年来在美国广为流传。戴维和朱莉对毛主席的身世和他伟大的人格，早已了解不少。他们知道，毛主席早在十几岁时，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追求自由和民主，立志为解救几万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奋斗终身。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两位美国青年人面前的毛泽东，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安详地坐在沙发里，和蔼可亲。毛主席由于疾病的折磨，讲话已十分困难。但是他的思维仍然敏捷，不时用指头点点翻译的笔记本子，就像老爷爷纠正子孙们所做的作业那样。

毛主席看着这两位尚带稚气的面孔。看到戴维久久不愿把眼光从自己的脸上移开，笑着说：“你在看什么？”

戴维答道：“我在看你的脸，您的前额很出色。”

毛主席笑了笑，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毛主席思维活跃起来，讲话极富幽默感。他接着说：“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平。外国人就做不到，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的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砍去一截！”

毛主席的话引得两位美国客人和在场的中国人一阵笑声，拘谨立即烟消云散。

好奇的朱莉询问他父亲尼克松总统1972年会见毛主席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要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主席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同意他们交换座位，当这个小小的插曲过去之后，朱莉将他父亲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打开信，并且用英语低声读出：“1975年12月23日”时，朱莉和戴维是那样的兴奋，使会见的气氛进一步活跃起来。朱莉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光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让毛主席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给她的礼物。毛主席也显得兴奋，再次同朱莉握手，并报

以微笑。

毛主席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我欢迎他到中国来。”“好多了！”朱莉答道。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来爬长城呢。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毛主席说。

戴维说：“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主席说：“我习惯这样叫他。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这里所说的两卷录音带，是指1974年8月，尼克松手下的工作人员背着美国总统，在反对党的竞选总部（设在水门饭店）安装了两个窃听器。事件败露，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为避免受到弹劾，尼克松于8月8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其实，在西方各大国，安装窃听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哪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深受西方法制熏陶的人们，甚至包括尼克松的女婿戴维，也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见此，便不再强辩了。

毛主席再次转向朱莉：“马上给你爸爸写信，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戴维接上来说：“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毛主席说：“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毛主席的立场绝不是偶然的感情流露，而是对美国虚伪的“民主”和“公正”的批驳和揭露，更是对尼克松的支持和慰问。因为这位美国总统曾冲破反华分子的层层阻碍，在改善中美关系一事上敢于迈开第一步。

戴维和朱莉转而和毛泽东主席谈起在来中南海的路上所听到的一则广播。1976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1965年5月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同年7月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毛主席的诗作，从文学技巧上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内容上来说，充满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催人奋进。戴维说：“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刚发表的两首诗。”

毛主席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成的。”

戴维说：“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

人们还记得，30年前，毛主席曾站在黄土高原上对斯特朗说道：“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毛主席当时曾自信地指着自已说。可是，时至今日，毛主席甚至再不能把自己的手抬到鼻子的高度。

戴维说：“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是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

毛主席说：“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在里头写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戴维记起了尼克松先生的话，便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主席谦逊地予以否认，说：“我没有那个能力，地球那么大，怎么改变得了？”

戴维说：“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40 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毛主席说：“因为加利福尼亚离中国近。”他又指指自己的身体说：“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觉已经谈了一个钟头。乔外长担心毛主席太劳累，曾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但是，谈兴正浓的毛主席两次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谈一会儿。

告别的时间到了。宾主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了数步，送别年轻的美国朋友。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毛主席对朱莉说。

“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10 年之后她将是了不起的！”毛主席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朱莉和戴维乘车来到寂静的长安街上，街上除了微微寒风之外，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朱莉问戴维：“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说：“十里之外，你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朱莉也感慨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主席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安详而健谈的长者。他衣着朴素，住室装饰简单。他从不装腔作势。他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傲慢地、阴险地低声讲话，更不像帕帕佐普洛斯那样，坐在高大的桌子里面，让客人坐在矮凳上，以衬托自己至高无上。朱莉说：“毛主席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历史正在证明这一点。

（ 里程 ）

远隔重洋结友谊

——毛泽东与拉美朋友

对于 50 年代 60 年代甚至 70 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拉丁美洲还是一片十分陌生的大陆。而拉丁美洲人是怎样看待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尤其是怎样看待获得彻底解放的新中国？拉丁美洲人惯常用的一个词是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然而，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友好使者，最早的是那些剧团演员、杂技团演员、新闻记者和外贸人员便开始涉足拉丁美洲这块陌生的大陆；而拉丁美洲的商人、艺术家和政治家也慢慢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友好桥梁，也就慢慢地被架设了起来。这友谊的桥梁，如同彩虹，连结着陌生的两块大陆。

为了促进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身体力行，接待过数不清的拉美友好使者，他们中有演员、记者、律师、议员，更有不少国家的部长、总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以乐乎！”毛主席对远方客人，总是以极为友好、亲切的态度进行接待，因而，所有见过毛主席的拉美朋友，对毛主席的接见和会谈总是念念不忘，有的朋友把会见时的照片，当作最为珍贵的东西，保存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有的友人将这些照片当作“传家宝”传给他们的子女。

毛主席会见较多的是来自巴西的朋友。1961 年 8 月中旬，巴西副总统、执政的巴西工党最高领袖若昂·古拉特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也最多。尽管巴西不少领导主张社会公平，但是巴西仍然是一个贫富十分悬殊的国家，大农庄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很严重，外国垄断财团通过在巴西的企业对巴西资源的掠夺、对工人的剥削都极为残酷。这一切，巴西工党不仅有较深刻的认识，也极力主张改变。所以当古拉特副总统来华访问时，毛主席请他在北京访问之后到杭州参观，因为毛主席当时正在杭州。8 月 18 日古拉特到达杭州，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在自己的住所会见了这位巴西领导人，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的情况，交换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谈到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巴西工党的来往问题。第二天，毛主席又乘车来到古拉特副总统所在的宾馆看望巴西客人。两位领导人一见如故。

古拉特对中国政府、毛主席邀请他访华表示深深感谢。古拉特说：“巴西和中国相隔甚远。但是，这只是地理上的距离，不能妨碍我们互相接近。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伟大民族的访问，将有助于我们两国政府间的良好发展，也将有助于加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古拉特对毛主席的接见十分高兴，他对中国陪同说：“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你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接见了我们。他是现代正在动荡着的时代的人类的最重要、最杰出的人物。他是杰出的诗人、杰出的理论家、革命的战略家。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永不磨灭的记忆。这位学者没有埋没在书斋里，而是走上街头和人民一起向中国旧的政治势力进行斗争。”

古拉特访华是在中巴尚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冲破了巴西右翼势力和台湾蒋帮的阻挠而成行。由于古拉特在回国后出任了巴西总统，由于他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限制外国资本对巴西的掠夺，于 1964 年 3 月 31 日被军人推翻，被迫流亡国外，最后于 1976 年 12 月在他流亡的阿根廷北部偏僻的农村寓所里默默辞世。

毛泽东主席还在 50 年代未会见过访华的巴西著名革命者普列斯特斯。普列斯特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即在 1924—1927 年领导过由青年军人组成的“普列斯特斯纵队”，进行过长达两万多公里长征，因此被称为“希望的骑士”。他也会领导过 1935 年 11 月巴西东部沿海数城市的武装起义，因此被政府关押达 9 年之久。他 1959 年 9 月以巴西共产党总书记名义率团访华，前来参加中国国庆 10 周年纪念活动。在华期间，毛主席几次会见巴西这位传奇式的革命者，双方就革命道路和方式进行过探讨。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普列斯特斯同中国一度疏远。1980 年普列斯特斯不再担任巴共的总书记职务，但他对同毛主席的会见，对访华仍记忆犹新。他甚至在 1988 年近 90 岁高龄的时候，还准备再次访华。终因年高体衰，未能成行，于 1990 年 3 月与世长辞。

巴西著名革命者若昂·阿马佐纳斯也曾两次会见过毛泽东主席。阿马佐纳斯从 1962 年起担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他 1963 年、1965 年访华时，都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63 年 3 月 6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马佐纳斯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和经验，介绍了共产党人要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意义。毛主席同阿马佐纳斯的交谈，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交谈，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一片真诚。

尽管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极为丰富，但毛主席却劝告巴西同志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照抄会吃亏的。阿马佐纳斯高度评价毛主席的谈话和同志式的和蔼的态度。阿马佐纳斯后来于 1976 年底再次访华，但毛主席已不幸作古。1992 年 4 月他再次经过中国首都北京时，他深情地凝视着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不作一语。

毛主席接见过的其他巴西友人还很多，凡是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巴西朋友，他们都会对毛主席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60 年代伊始，巴西朋友阿马里略·瓦斯贡塞洛斯和夫人戈索伊便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当专家。1961 年 11 月毛主席接见了他们。他们二人和毛主席合照的像片便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挂在他们客厅最显眼的地方。1978 年他们离开中国，之后相继去世，这张照片一直伴随他们渡过后半生。

毛主席在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曾先后接待过好几位墨西哥著名政治家，他们当中有波特斯·希尔。50 年代，希尔曾在中国进行过长达两个月的友好访问，对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甚为赞赏。希尔在华期间曾两次会见过毛主席。在他第二次会见毛主席时，夫人没有来，毛主席关切地问：“你的夫人怎么没有来？”希尔说：“我的夫人患了感冒，现在饭店休息。”毛主席便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安排医生去为希尔夫人看病。当希尔同毛主席会见结束回到旅馆时，发现已有几名医护人员在为夫人看病，希尔深为感动，希尔在同毛主席的交谈中，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建设事业甚为钦佩。他在各地访问中，感觉到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看到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建设热情，促使他在返回墨西哥后，很快写出了《中国》这本畅销书。在毛主席逝世后，希尔发表纪念文章，满怀深情他说：“毛泽东通过他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重要的遗产。”

毛主席与墨西哥另一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也有过十分友好的交往。卡德纳斯曾在 1935 年出任墨西哥总统，1959 年 1 月访华。毛主席曾十分热情地向这位墨西哥活动家介绍新中国的成立经过，也曾仔细询问和听取关于

墨西哥情况的介绍。毛主席在 1973 年 4 月 20 日还接见了墨西哥另一位杰出政治家路易斯·埃切维利亚·阿尔巴雷斯总统。他们就两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并对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埃切维利亚对同毛主席的会见印象极为深刻，他以十分尊敬的口吻回忆说：“毛主席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不仅如此，毛泽东主席“由于对人类事业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毛泽东主席生前还同其他许多拉美人士有过交往，如古巴前总统奥斯特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古巴领导人罗加，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智利的贝特雷加尔等。毛主席同危地马拉前总统哈科夫·阿本斯的交往更是有口皆碑。阿本斯 1951—1954 年出任危地马拉总统，由于他实行土改，尤其是没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庄园主的土地 50 多万公顷而受到美国垄断财团的憎恨，因而被亲美势力赶下了台。后来，阿本斯应邀来华访问，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在 1963 年同拉丁美洲另一位领导人谈话中，还一再提到危地马拉的这位政治家。毛主席说，阿本斯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刚被推翻，情绪上有些影响。毛主席还请这位外宾转达对阿本斯的问候。

毛泽东主席在拉丁美洲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拉丁美洲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珍藏有与毛主席合影的人，将合影拿出来看了又看；许多人著文缅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阿根廷朋友鲁文·努涅斯说，毛主席逝世，“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精神之父和伟大的领袖”；B·J·科恩说，“毛主席无疑将作为全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被人们永远怀念。不同思想意识和各种政治观念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和领袖”。苏里南政治家阿龙说，毛主席的“著作将是万古长青和永世长存的”。秘鲁新闻记者费·阿尔塞说：“毛泽东是少数几位永垂不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该国另一位著名记者路·罗加认为，“毛泽东是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历史中，这位巨人就像他的国家一样，是一位伟大的主角。”正因为如此，自毛主席逝世至今，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来华的人士，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群众一道，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郭元增）

气壮山河哀思悠悠

——国际友人回忆和悼念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位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以他那雄伟的气魄，深邃的思想，谦逊的作风，高尚的品格，影响了整个世界。众多国际友人和知名人士，满怀激情地抒发了他们对这位伟人的由衷敬佩和深深怀念。

一、世纪难遇的伟人

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说：“象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在悼念毛泽东的唁电中，也对这位领袖发出了内心的赞叹：“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从早期走上革命斗争道路起一直到今天，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的业绩”。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施拉姆教授撰文说，毛泽东确实伟大，他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不仅在中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人。

早在 40 多年前，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就断言：“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伴的印象”。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逝世后，与这位伟人政治信仰迥然不同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也承认：“我认为毛泽东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使得好几十年来和好几世纪来一直处于封建状态的国家实现了统一，在他的组织下，他确实结束了一种周期性的饥馑和水灾。他是他的国家的一位伟大的领袖”。

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的回忆，道出了毛泽东在国际友人心目中的形象。他说，毛泽东不但具有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气派。毛泽东的存在和人格似乎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

毛泽东的气魄，毛泽东的胆识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家都非常钦佩和崇敬。

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第 258 页。

1976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01 页。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15 页。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14 页。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69 页。

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称赞：“毛泽东是名扬世界的政治人物”。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颂扬毛泽东“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亨一说：“毛泽东主席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的光芒的巨大红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而自豪的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新生”。毛泽东“在世界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总而言之，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期在历史的轨迹上刻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那末，毛主席的确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 20 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二、中国的心脏，永恒的发动机

本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几乎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寥寥数百字是不能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写清楚的。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作者 30 年代的预言，已完全被今日的现实所证明。

“我一到达中国，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名字：‘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都亲切地提到这个名字。对革命来说，这位领袖是团结的中心，是它的信仰和宗教”。秘鲁记者巴里奥斯几句话述说了他心中的感受。

确实，“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的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 1/3 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注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但是毛泽东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写下了访华之行的上述随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50 页。

1976 年日本《读卖新闻》。

1976 年日本《熊本日日新闻》。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秘鲁《新闻报》。

基辛格：《白宫岁月》。

对于毛泽东，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形象地说：“对毛泽东用的词是大——各个方面都大。他总是建立政策和理论的广泛大纲，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是琐细的，不是平庸的，也不是爱报复的，这在中国是革命性的。他是一个胜利者，他欣赏取得胜利的过程，他的成功大多由于赢得了别人的心”。

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从教育学的角度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她说：“毛的最主要的职责是一位导师。他在延安的领导作用正是体现在当导师上。导师这个词是他的身份最确切的说明，他教育全党、全军、全民。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共产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际，运用在小米加步枪的国土上。1971年毛泽东对他的朋友、作家斯诺说：‘我历来是想当教员。我讨厌那些伟大的字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并且一再说：‘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如果把全中国人民比喻为学员，那么，毛泽东的教员身份是最贴切不过了。”

关于毛泽东，福原亨一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定方向”。“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必然结果，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色彩，充分掌握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了使之奋起和团结而展开了有效的政治宣传”。毛泽东太了解中国了，他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制定了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农民武装斗争，借以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他怀着坚定的信念推行了这种战略。

旧中国被西方强国所瞧不起，而新中国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坛要人刮目相看，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美国哈佛大学副教授谭若恩著文说，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入侵者瓜分的封建的中国的弊病。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列宁，因为他带头造反，以农村象螃蟹一样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政权。1949年以后，他有了第三种身份，成了中国的斯大林，他拿起泥刀和砖瓦，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是中国革命的把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人物”。

“就是这位中国圣哲在当代世界政治斗争中放了反响最大的两炮。他在1960年同俄国决裂。10年后，他向美国开了门。从此，两极世界变成了三角世界”。更应提及的是：“毛泽东还担任了第三世界发言人的角色。中国虽然成了三足鼎立的力量的一部分，但还是领头为重新分配权力而奋斗。毛的中国成了这样一个象征：一个象第三世界一样落后的国家怎样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弹和在联合国内有否决权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强国”。毛泽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的首脑，他使中国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毛泽东究竟给了中国什么，加拿大著名记者盖恩说：“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他教导人民说：只要他们同心协力，他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

海伦·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

1976年日本《熊本日日新闻》。

1976年美国《新闻日报》。

1967年美国《新闻日报》。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333—334页。

这就是毛泽东的动力。

前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撰文说：“如果人们把他看作是新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缔造者，那么，这种评价不算太高”。“毛泽东成功地把他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为外国列强所左右的中国，不仅从政治上统一了起来，而且还使它摆脱了饥饿”。“毛泽东把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动荡不安，饱尝最严酷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国引进了新的时代”。“毛泽东是中国的核心和发动机”。

三、终生献身革命事业的“斗士”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除了舍生忘死，致力于他所追求的革命事业之外，不附带任何的私心。这一点，不用说诸多的国际友人，而且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

韩素音直言：“他是一个完善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毛的生活和中国革命已经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开了。毛已经和他的事业结成一体，他的思想和行动就是革命。如果把毛和革命分割开来，就会使历史失去原有的雄伟壮观，同时也会使这个人物无血无肉，剩下一个空架子。革命就是他的骨肉、心血，就是他生活的意志、力量和前提”。对此，斯诺早已注意到，他声称：不仅毛泽东，其他革命家也都一样，谈起童年回忆，讲的是“我”，但当满怀豪情谈革命时，讲的是“我们”。在充满生活激情的共同事业中，一般的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琐事变得黯然失色，模糊不清，从脑海中消失了。对于毛泽东而言，想的、吃的、喝的、睡的，都离不开革命。

在所有的外国记者中，斯诺大概是对毛泽东的革命斗争历程最了解的。这位作家向世人展现了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的一幅画面：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10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的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10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对于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毛泽东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和美国国务院“中国通”谢伟思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关于毛泽东有许多流传的故事，而且他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一样，多年来头颅上都悬着重

1976年西德《巴伐利亚信使报》。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

斯诺：《西行漫记》。

赏”。但他仍象骡子一样顽强地奔跑着。在他的性格中贯穿着钢杆一般的自豪与决心。“他绝对坚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种信心与那时延安窑洞里的实际环境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尼克松先生的女儿朱莉也深有感触地谈及：“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 82 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的一生，也许超过其他所有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变化，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他的非凡的一生所发生的事件，宛如一系列高大的里程碑矗立在过去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中：参加革命、改信马克思主义、长征、反蒋介石、打日本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半个世纪来，他一直是他的国家的人民的领袖，1/4 世纪来，他一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40 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马克思主义是他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他一生的指导精神。”惠特拉姆对毛泽东的革命历程作了这般简洁的概括。

四、平凡的形象，超凡的魅力

由于时代的诸多因素，使得毛泽东这样一个吃五谷杂粮的人，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毛泽东究竟又是怎样一种形象呢？几乎所有会见过毛泽东的国际友人，都在他们的笔下作了生动的描述：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剧场里”，“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很丰富，不住地变化。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觉得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如此形象地勾画出 30 年代的毛泽东。

斯诺的夫人则从另一个侧面向读者展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风采：“他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应该说，“没有什么可损害毛泽东的，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抗力，是坚韧的材料制成的”。

1946 年，另一位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窑洞里，见到了她所敬仰的毛泽东，她写道：“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而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史沫特莱：《毛泽东会见记》。

1976 年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1976 年《澳大利亚人报》。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海伦·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在那时的中国，能见到毛泽东，那是莫大的荣幸。且听一个外国记者的心声：“几分钟过后，毛泽东出现了。我原以为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进入大厅会象神人出现一般，形成了一个震动人心的场面，实际上，我却在肃静的气氛中看见一位衣着整洁朴素、和我在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的老人走了进来”。“我看清了他的面庞。他的目光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的目光安详而清澈，全身都焕发出谦虚之感”。“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之一。我看着这位 20 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最伟大的领导人、历史上最光华四射的智慧之一”。

伟人就是伟人，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以他那压倒一切的魅力，为世界上许多的知名人士所倾慕。基辛格博士说：“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目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魅力”。

也许在政治立场上，毛泽东是西方许多政治家的对手。在个人私交中，毛泽东却有许多的朋友，而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英国前首相希思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位。他自己的话就是佐证：“当我 1974 年 6 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伟人到底是伟人。

五、最富人情味的老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自古以来莫不如此。就革命事业而论，毛泽东是一位勇敢的“斗士”。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从人性的本身的标准而论，他更属于充满同情心的善良之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农民那种十足的人情味。

史沫特莱深切回忆了她同毛泽东在 30 年代中期一起生活的片断：“毛氏时常来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我们三人吃了简单的晚餐，就花了几个钟头谈天说地”。“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曾经爱上甚么男人，原因是甚么，爱情对我有什么意义。有时他吟一段中国古诗，或者朗诵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是纪念他的第一夫人。她因为是毛氏的夫人，被国民党杀害了”。

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

史沫特莱：《毛泽东会见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述说了他的所见所感。

在 1939 年的《共产国际》杂志上摘录了一位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看法：“他是我们的主要领导者。他领导着政府党和军队。毛泽东是一个普通而热心的人。他的话就连闭塞的人也能理解。他的威望和声誉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一贯关心他人而全然不顾自己。他非常朴素，行军时与红军战士们一起睡在地上，吃得也和大家一样。”有这样一位与民同甘共苦的领袖，还有什么攻克不了的堡垒。

1970 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被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推翻，来到中国。富于同情心的毛泽东立即伸出援助之手，热情接待了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并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位亲王充满感激他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回答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

1975 年 12 月，尼克松先生的女儿朱莉来华访问。尽管毛泽东当时已身患重病，可他却十分关心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朋友的健康。朱莉激动地回忆说：我们大家刚刚坐定，主席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告别时，他还强调地对我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话语不多，其情却深。

在毛泽东的光辉一生中，无疑受过极其艰苦的磨炼，然而，过去的那些经历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怨恨、残忍或忧伤的痕迹。拿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恐怕有些不公平。蒋介石无情、自傲又残忍。而毛泽东则和尼赫鲁相似，富于理想和幻想，都是人道主义者。印度前驻华大使潘尼迦对毛泽东作了上述评论，尽管它不一定那么准确。

六、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特征的人。他有爱、有恨；有欢声笑语，也有孤独寂寞；他诙谐幽默，也精明敏锐；更有谦逊求实的作风。

谦逊是伟人应具的美德。毛泽东为此赢得了众多国际知名人士的称赞。尼克松是这样评述的：“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

斯诺：《西行漫记》。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95 页。

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回忆录》。

《美国妇女家庭杂志》。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379—380 页。

‘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说：‘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1975年底，尼克松的女儿会见毛泽东后，发出了相似的感慨：“毛泽东的举止出人意外的随和。他不装腔作势。他在谈到将于新年发表的一首讲斗争的诗的时候非常谦虚。他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我禁不住把他的态度同我见过的其他权力很大的独裁者的态度相比。勃列日涅夫的傲慢，帕帕佐普洛斯的专横……与此成为对照的是，毛和唐闻生之间的关系犹如祖父和孙女。黄镇大使看来也很轻松。”

在每次同外国友人谈到中国的落后状态时，毛泽东总是发出阵阵疚心的感叹。法国前总理富尔在会见毛泽东之后写道：“毛主席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毛泽东回答说：‘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希思面前，毛泽东也表达了内心的感慨。他对这位当时在任的首相说：“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我们有了进步，但是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无疑，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战略上，毛泽东敢于藐视对手，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他又有自知之明，能正视现实。美国前总统布什叙述了毛同他会见的一个片断：“基辛格点点头，然后转了话题：‘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毛的反应是，举起一只拳头，伸出另一只手的小指。他指着拳头说：‘你们是这个’。又伸出小指说：‘我们是这个。你们有原子弹，而我们没有’。由于中国10多年前已有核武器，毛显然指美国在军事上比中国强大”。

毛泽东的幽默、诙谐，在伟人中是出了名的，诸多同他会晤过的国际友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看看基辛格博士的切身感受：“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毛在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作掩护安排一些秘密旅行。还开玩笑地谈到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对骂时给对方戴的帽子”。毛泽东的幽默，不同于一般人那种饭后的随意闲侃。“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致于有失面子”。

曾经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对毛泽东的这一性格也作了相类似的描述：“基辛格问他身体如何。毛用手指着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

尼克松：《领袖们》。

希腊前总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81页。

富尔：《毛泽东会见记》。

1976年英国《每日电讯报》。

《布什自传》一书。

基辛格：《白宫岁月》。

灵。我能吃能睡’。……‘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毛用一种哲学家的语气说道：‘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说出这种话，真使人大吃一惊。基辛格微笑着说：‘别接受得那么早呀’！毛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只好吃力地在一本便笺簿上写下：‘我服从 Doctor 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

另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国家首脑对毛泽东的幽默也深有同感。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写道：毛泽东对日本问题很感兴趣，“毛主席举出‘I、RO、HA’及‘A、I、U、E、O’（都是日文字母的读音）评价说，创造了这些文字的日本民族是伟大的。他还说他在学日文。可能是半开玩笑，他还说想到日本留学。当我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毛主席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如今，这已成为值得怀念的回忆了”。“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事毫不掩饰，调皮就是调皮，不遮不掩，发出朗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地谈论着”。“在第二次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时，他毫无顾虑地对我说：‘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紧张心情。”

还是作家观察更为仔细，用语准确。韩素音说：“毛的幽默来自辩证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一眼看到事物的对立面。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的语言的特色，也是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特点。他的幽默有时真是锋芒逼人。他虽极不喜欢杀人，可如要嘲讽起人来，却是入骨三分”。

大凡会晤过毛泽东的国际友人，更不会忘记这位伟人那种超人的敏锐与机警、冷静与沉着、深刻与含蓄，以及他性格的诸多复杂组合。政坛强人基辛格以外交家那特有的适应能力，接近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央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话语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回避了义务”。

事实上，在 40 多年前，谢伟思多多少少也看到了毛泽东性格的另一面。他描述道：“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也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比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而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

爱泼斯坦的洞察力也不一般，要不然，他也很难从毛泽东的身上捕捉到其深沉的另一面：“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刺激你和他辩

《布什自传》。

1976 年日本《读卖新闻》。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

基辛格：《白宫岁月》。

1976 年美国《纽约时报》。

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毛泽东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

海伦·斯诺从她的观察角度概括了毛泽东的复杂性格原因：“毛泽东年老时被神化是有各种原因的。他把‘新中国’人格化了，既有他的灵机，又有它的限制。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一个辩证的头脑”。“在他的整个时代，他是最乐观的人，可他也是愤世嫉俗的人，对于愚人，即使他相信，也是不愉快的。他比中国任何一个象他那样年纪的人，对外来的影响都更为开放——可是他又是能用漂亮的技巧和鉴别真实价值的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

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他本身就是一部书。

七、博学多才，书伴终生

作为杰出政治家，毛泽东誉满天下。然而，不仅如此，如果给毛泽东赐以哲学家、诗人、思想家、理论家、艺术家的誉称，他同样当之无愧。毛泽东一贯聪明好学，勤奋刻苦，书是他永远离不开的伙伴。外国友人对于毛泽东的渊博学识，超常才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素养，“毛主席喜欢读《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一贯采取把这些作品视为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予以尊重的态度。在传统诗同——它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创作方面也显露了非凡的才能。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反映得更加高大，大大有助于铸成他是具体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飞跃的英雄的形象”。福原亨一对毛泽东如是评述。

大平正芳在见到毛泽东的客厅后，也得出了他的观感：“那间接待室兼书斋里摆满了线装书，书中夹着许多白色的书笺。毛主席似乎就在那里度着专心读书的生活”。

许许多多的中外人士都知道，毛泽东是嗜书如命的。在 30 年代的延安窑洞里，王安娜作了她的另一番描述：“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据他说，碰到特别有兴趣的书，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把它看完。深夜两点乃至三点以前他是不睡的，每天工作的时间实在够长”。“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知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有到过国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

斯诺又何尝没有这般体会，他在《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

1945 年 9 月 2 日纽约《下午报》。

海伦·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1976 年日本《熊本日日新闻》。

1976 年日本《读卖新闻》。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地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

史沫特莱的看法是：“毛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却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战争的经验”。“他著了许多书和小册子，因此已经置身于历史上伟大的革命政治家之列。他的《论持久战》、《战争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里程碑，我在后来的岁月中曾在穷乡僻壤看他的著作”。

写诗，是毛泽东的一大爱好，富尔似乎对主席的这一特长也有所感：“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党的教条和辩证法的词藻所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现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代代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毛泽东就是有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与风度。1974年5月30日，毛主席亲自请教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李教授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一见到我，竟直言问起物理学上的对称问题”。“根据韦伯氏大辞典，对称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者指平衡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形式美”。“我们之间摆着一张小平台桌，上面放着一叠纸、几根铅笔和两杯绿茶。我拿起一根铅笔放到纸上，用手指朝毛的方向弹去，随即再把铅笔往回弹了一下。铅笔滚向一边，又滚了回来。接着，我指出这个过程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毛泽东很欣赏这个实验演示，于是他想知道对称的深层意义，仅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真的能够表达宇宙法则吗？”

“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的对称，以及由此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对称的美如此简单，其结果又具有极其深远的普遍性，毛泽东似乎陷入沉思。他说非常遗憾，没有时间去研究科学。但毛泽东仍回忆起年轻时读过的一些科学书籍，如生物学家丁·亚瑟·托马斯的著作，当时他入了迷”。

毛泽东那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使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受到启迪和教益，惠特拉姆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这位澳大利亚前总理追忆：“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到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史沫特莱：《毛泽东会见记》。

富尔：《毛泽东会见记》。

1988年《科学博览》。

又明晰”。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神态，令我记忆犹新。——
毛泽东是一个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于一身的少见的当代伟人。

八、唱不完的赞歌

毛泽东这位世界伟人，尽管功高德劭，受人敬仰，但他毕竟也是一个血肉之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生老病死，当无情的帕金森症状在他身上不断蔓延时，当他同别人谈话的口齿越来越含糊的时候，他老人家也知道：马克思的请柬已经向他发出了。生老病死，这是几千年来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对这位伟人也没有例外。

1976年9月9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山河在，人已故，千秋功业，自有他人评说。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知名人士，对于毛泽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被毛泽东会见过的国际友人，更对这位伟人的离去表达了深切的怀念。

布托·阿里立即发表了沉痛的声明：“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我的思想和感情，象我的同胞一样，极为悲恸沉痛。这位人物的谦虚和幽默，他的光荣和伟大，他的英勇和胜利，将永垂青史”。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惠特拉姆也在《澳大利亚人报》上撰文道：“我本人的看法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他是当代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有一切证据表明，他不仅为他的人民所钦佩和追随，而且真正为他们所爱戴。他的政府是简朴的，但却是诚实而有效的；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受到国际的尊重，国内实现了多少世纪所没有过的稳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这位与毛泽东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朋友，在毛主席逝世的当天，就向中国共产党发来唁电，表达了朝鲜党和人民以及他本人对故友的深切哀悼之情，对毛泽东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毛泽东同志为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里。”

毛泽东是伟大的，他一生不朽的业绩，将永为世人所传颂。

《澳大利亚人报》1976年。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58—259页。

1976年《澳大利亚人报》。

197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唐海军)

建国以来毛泽东外事活动大事年表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 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以此奠定了五十年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

10 月 1 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发布公告。公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周恩来外长将公告通知各国政府。

12 月 16 日至 1950 年 2 月 17 日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庆祝活动并同斯大林讨论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1950 年 1 月 20 日，周总理也抵达莫斯科。毛主席、周总理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举行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这次访问加强了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0 年

10 月 8 日 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952 年

5 月 23 日 会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和朝鲜人民访华团全体代表。

6 月 29 日 会见英国坎特们雷教长约翰逊及其夫人等。

9 月 29 日 会见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泽登巴尔访华期间，中蒙两国缔结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 月 6 日 会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洪诺夫等。

1953 年

3 月 5 日 发布命令：为悼念斯大林，7—9 日全国下半旗志哀。6 日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9 日发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7 月 26 日 会见印度艺术代表团。

11 月 13 日 会见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中国政府决定将 1950 年 6 月 25 日至 195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中国援朝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赠给朝鲜政府，并再拨人民币 8 万亿元无偿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的费用。中朝两国还签订了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

1954 年

8 月 24 日 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9 月 19 日 会见保加利亚人民军迪亚科夫中将等。

9 月 30 日 会见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

同日 会见前来参加我国庆 5 周年庆典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及其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周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联合公报，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和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联合公报。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分别会见了参加我国庆 5 周年庆典的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文化部长柯别茨基；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阿波斯托尔；匈牙利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农业部长赫格居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博尔兹；越南宣传部长黄明鉴；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达米扬诺夫；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阿尔巴尼亚外长什图拉及由他们率领的各国政府代表团。

10 月 11 日、29 日 会见罗马尼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博士。

10 月 19 日、26 日 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

12 月 1 日 会见缅甸联邦总理吴努。

1955 年

1 月 28 日 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发表了题名《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的谈话。

2 月 14 日 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5 周年举行的宴会，并讲了话。

4 月 7 日 发布关于结束中国同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

4 月 29 日 会见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

5 月 20 日 会见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

5 月 26 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期间，两国总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实施办法在北京互换照会。

6 月 25 日 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6 月 30 日 会见印度文比代表团团氏、印度副外长钱达和夫人。

10 月 2 日、14 日 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等。

10 月 3 日 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同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

10 月 5 日 会见缅甸联邦武装部队司令奈温及其率领的军事代表团。

10 月 15 日 会见上林山荣吉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10 月 27 日 会见卡普尔为团长的印度电影代表团。

10 月 28 日、11 月 28 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

12月9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和夫人。期间，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12月21日 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

1956年

1月22日 会见南斯拉夫通讯社社长维科斯拉夫·皮尔皮奇为首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1月24日 会见越南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2月10日会见乃贴·触的努七为团长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团。

2月15日 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及其率领的国家代表团。这是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应邀访华。西哈努克1955年9月出任首相，新政府宣布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希望发展中柬关系。访华期间，我给予隆重接待，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发表联合公报。

3月13日 前往波兰驻华大使馆吊唁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为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等举行的宴会。3月29日会见印尼共总书记艾地。

4月6日 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会见时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价等。

6月10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特别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

6月18日 分别会见拉波欣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和内奥里契奇为首的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

6月27日 会见芬兰议会议长苏克舍拉宁及其率领的议会访华代表团。

7月1日 会见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冯·萨巴。

7月14日 会见以教育、卫生、地方自治政府大臣巴·夏尔马为首的尼泊尔文化代表团。

同日 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

8月6日 在北戴河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沙多诺及其随行的国会议员。

8月21日 会见老挝首相富马亲王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期间，周总理同富马首相发表联合声明。

9月21日 会见以库斯南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

9月26日 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尼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周总理同阿查里雅首相发表联合声明。

9月29日 会见比利时众议院议长胡斯曼及其率领的国会代表团。

9月30日、10月4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10月7日 会见以科斯塔，纳季上将为为首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

10月11日 会见以乔社里中将为为首的印度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

10月19日 会见人民院议长阿延加尔及其率领的印度国会代表团。

同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期间，两国总理签署联合声明。

11月4日 宴请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和夫人。

11月6日 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

11月11日 会见阿里·佐布为首的叙利亚议员访华团。同日会见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德。

1957年

3月9日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22日在杭州再次会见西罗基一行。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保健合作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

4月8日 会见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茨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4月21日 会见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访华团。

4月至5月 多次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5月3日 会见以波奇瓦罗夫中将为为首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

5月4日 会见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肖恢塔。

5月12日 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康·帕伏列斯库及其率领的大国民议会和市加勒斯特市人民议会代表团。

同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及其率领的人民议会代表团。

5月18日 会见以苏布罗托少将为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5月25日 会见应邀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的苏联、越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匈牙利、印度厄西亚、阿尔巴尼亚、法国、南斯拉夫、蒙古、英国、日本等1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团。

5月30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6月26日 会见以穆·拉赫曼为团长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

7月5日 会见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

7月6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

8月2日 在青岛会见以缅甸联邦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为团长的国会访华代表团。

9月18日、23日 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9月24日、10月2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博士。

9月27日 会见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9月29日 分别会见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及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

9月30日 会见以阿里斯托夫为团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同日 会见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10月2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将军及其率领的军事代表团。

10月25日 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

11月2日至21日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14日至16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16日至19日举行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字。访苏期间，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还先后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英共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

高兰、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印共总书记高士、法共书记杜克洛、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等。

12月2日 会见前来参加中国工会“八大”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7日 会见以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12月14日 在杭州会见缅甸联邦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

1958年

1月2日 在杭州会见北也门副总理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期间，两国签订友好条约、商务条约及科技和文化合作协定。

1月27日 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布克。

4月2日 在武汉会见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

4月5日 在武汉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期间，周总理和斯托伊卡主席签署了两国政府共同声明。

5月4日 会见以易卜拉欣中将为团长的阿联军事代表团。

5月23日 会见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团。

6月30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

7月12日 会见非洲青年代表团。

7月31日至8月3日 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就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在会谈中严正拒绝了苏方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8月15日 会见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20日在北戴河再次会见。

9月6日 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10月2日 会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6国代表团。

11月25日、26日 在武汉会见并同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12月6日，同访问越南后再次抵达武汉的金日成首相会谈。周总理同金日成首相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强烈谴责美国继续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侵占台湾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双方表示互相支持对方实现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12月4日 在武汉会见朝鲜艺术团。

12月11日 在武汉分别会见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

1959年

1月12日 会见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长桑巴约及夫人。

1月21日 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卡德纳斯将军。

1月27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2月8日 会见阿曼伊斯兰教氏国副教长哈尔塞亲王。

2月10日 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2月12日 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

2月14日 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

2月21日 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

3月3日 在郑州会见拉丁美洲12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同日 在郑州会见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同日中日两党代表团签署联合声明。

3月13日 会见美国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和夫人及美国记者斯特朗。

3月18日 分别会见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和印尼共总书记艾地。

4月19日 会见以中央书记巴叶塔为首的意共代表团。

4月26日 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

4月30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

5月6日 会见匈牙利、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蒙古等11国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36个代表团团长和部分团员。

同日 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期间，两国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友好合作条约。

5月10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及其率领的人民议院代表团。

5月13日 会见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

5月15日 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学生代表团及其政界人士。

同日 会见智利激进党主席奥特加和夫人，智利社会党中央委员和全国纪律委员会主席、社会党前副总书记阿尔瓦莱斯和夫人等。

5月22日 会见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斯基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

6月11日 会见以埃尔内斯托·莫雷为团长的秘鲁议员团。

6月17日 会见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

6月18日 会见智利前副总统贝特雷加尔和夫人。

9月8日 会见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亲王。

9月30日至10月上旬 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在此前后，还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我国庆10周年庆典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长、政府首相金日成；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总统诺沃提尼；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老挝人民党主席凯山·丰威汉；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匈牙利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斯特万；巴西共产党总书记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及由他们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拉丁美洲14个共产党的代表团（代表）；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代表团等。

1960 年

1 月 18 日 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对外与东西德贸易部长海因里希·劳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

3 月 18 日 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期间，两国签订了边界问题协定和经济援助协定。

4 月 15 日 会见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扬勒·贾尔赛汗。

4 月 29 日 会见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和夫人。

5 月 3 日 会见拉丁美洲、非洲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

5 月 8 日 会见拉丁美洲 8 个国家的外宾。

5 月 10 日 会见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夫妇。

5 月 17 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姆·贝勒卡塞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5 月 27 日 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6 月 7 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

6 月 21 日 在上海会见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

7 月 13 日 会见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

7 月 24 日 会见在北京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各国外宾。

9 月 1 日 会见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

9 月 7 日 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威廉·皮克总统。

9 月 12 日 会见几内亚总统、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杜尔。期间，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

9 月 29 日 会见非洲和拉丁美洲法律工作者。

同日 会见参加我国庆 11 周年庆典的缅甸总理吴努和夫人及女儿、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等。

9 月 30 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

10 月 20 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及其率领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

10 月 22 日、27 日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

10 月 27 日 会见正在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 12 个国家的文化代表团和代表。

11 月 2 日、12 月 3 日 宴请参加苏联十月革命 43 周年庆典途经我国的越南劳动党主席、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11 月 19 日 会见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少校及其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11 月 30 日 会见古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英属圭亚那、海地、墨西哥、巴拿马、萨尔瓦多、厄瓜多尔等 12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宾。

12 月 17 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期间，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联合声明，两国政府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12 月 24 日 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

12 月 29 日 会见也门穆斯林代表团。

1961 年

1月3日 会见古巴哈瓦那市市长利亚努萨。1月24日 会见喀麦隆、北罗德西亚、葡属几内亚外宾。同日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国会议员黑田寿男。

2月8日 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4月1日 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

4月13日 会见委内瑞拉参议员、左派革命运动主席安东尼奥。

4月19日 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

4月24日 在杭州会见老挝首相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阵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期间，周总理同富马首相发表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决定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月25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议会副主席凯莱齐及其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4月27日 会见几内亚、约旦、南非、塞内加尔、北罗德西亚、乌干达、肯尼亚外宾。

6月13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6月15日 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6月16日 会见以艾地主席为首的印尼共代表团。

7月13日、14日 在杭州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同朝方举行会谈。两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发表中朝联合公报。

8月16日 在杭州会见加纳总统兼政府首脑恩克鲁玛。两国签订友好条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文化合作协定。刘少奇主席和恩克鲁玛总统发表联合公报。

8月18日、19日 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

9月23日、24日 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9月28日、10月2日 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斯科。

9月30日、10月5日 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期间，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10月7日 会见以日本社会党顾问、众议员黑田寿男为首的日中友协代表团和来华接洽《毛泽东选集》第4卷日文版出版事宜的日共中央书记安斋库治等。

10月12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和第一书记黎笋。

11月14日、17日 先后会见参加苏共22大后途经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和印尼共代表团团长、印尼共中央主席艾地。

11月24日 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土歧强、安斋库治。

12月25日 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

1962年

1月3日 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

1月12日 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为首的访华代表团。

1月14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及其率领的政府经济

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五项协定和议定书。

3月30日 会见古巴军事代表团。

6月21日 会见朴金喆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8月7日 在北戴河会见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巴拉圭、巴两外宾。

8月8日 在北戴河会见厄瓜多尔众议院前议长、前内政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曼努埃尔·阿劳霍·汗达尔哥。

8月31日 会见英属圭亚那人民进步党总书记贾根的夫人简奈特·罗森堡。

9月7日 会见古巴旅行团。

同日 会见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波多黎各等国家青年和学生代表及阿根廷民间艺术团。

9月18日会 见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并为代表团题词。

9月21日会 见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阮维桢。

9月23日会 见老挝爱国阵线党主席、老挝临时团结政府首相苏发努冯亲王。

9月28日会 见阮文孝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9月29日会 见印度尼西亚哈蒂尼·苏加诺夫人。

12月2日会 见以洛夫林主席为首的挪威共产党代表团。

12月3日会 见巴西阿马里奥夫妇。

1963年

1月5日 在杭州分别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1月6日 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

2月15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3月3日 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

3月7日 会见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首相梭发那·富马。

3月13日 会见古巴、委内瑞拉、巴拉圭外宾。

3月18日 会见非洲外宾。

3月22日 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阿塞·费尔南德斯少校。

4月24日 在上海会见阿联部长会议执行主席萨布里。同日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陆军司令亚尼少将率领的军事友好代表团。

4月25日 在上海会见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塔。

6月16日 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期间，刘少奇主席、崔庸健委员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完全一致。

6月24日 会见古巴科学院代表团。

7月26日 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

8月8日 在会见作洲外宾时发表声明，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

8月9日 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博士。

8月25日 会见朝鲜科学院代表团。

8月29日 会见阮氏萍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8月30日 会见马格拉威·穆罕默德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

- 9月3日 会见印尼共总书记艾地。
- 9月5日 会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
- 9月6日 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
- 9月9日 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斯。
- 9月30日 会见副议长、印尼共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及其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合作议会代表团。
- 10月1日 会见参加我国庆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的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
- 10月2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 11月2日 在上海会见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和夫人。

1964 年

- 1月12日 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 1月17日 会见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李敦白等美国友好人士。
- 1月19日 会见希腊文比代表团。
- 1月27日 会见日中友协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铃木一雄等日本朋友，并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
- 1月28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及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 1月30日 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
- 2月9日 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 3月10日 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政治局委员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
- 3月19日 会见波多黎各学生代表。
- 3月20日 会见朝鲜外务相朴成哲。
- 3月23日、4月10日 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
- 4月15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
- 4月16日 在长沙会见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
- 4月28日 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
- 5月7日 会见布隆迪国民议会议长西里乌尤蒙西及其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 5月15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
- 5月18日 会见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将军。
- 5月28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党第二主席维尔多约。
- 6月2日 会见意大利参议员维托雷利等。
- 6月9日 会见阿拉伯也门总统萨拉勒。期间，两国签订友好条约及文化合作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刘少奇主席和萨拉勒总统发表联合公报。
- 6月10日 会见以中央书记格鲁巴为首的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
- 6月14日 会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期间，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 6月24日 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
- 6月30日 会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
- 7月9日 会见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
- 7月10日 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
- 7月13日 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
- 7月27日 会见越南外宾。
- 8月20日 会见肯尼亚友好代表团。
- 8月25日 会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
- 8月29日 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
- 9月4日 会见坦桑尼亚广播代表团。
- 9月13日 会见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

9月底至10月上旬 先后会见参加我国庆15周年庆祝活动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马里总统凯塔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及他们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 10月1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 10月16日 会见以伊西多罗·马尔米埃尔卡为团长的古巴党政代表团。
- 10月29日 会见西南非妇女代表团。
- 11月1日 会见阿富汗国王查希尔。
- 11月8日、16日 会见朝鲜首相金日成。
- 11月29日 参加首都各界支持刚果（利）人民反美斗争大会，并发表了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 12月24日 会见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作家。

1965年

- 1月9日 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 1月27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期间，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贷款协定。
- 2月10日 参加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大会。
- 2月11日 会见访问越南后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 2月19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 3月4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
- 3月14日 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
- 3月23日 会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
- 3月24日 会见艾哈迈德·舒凯里主席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 4月11日 会见阿联总统外事顾问萨布里。
- 5月12日 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的声明。

6月9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
7月14日 会见乌干达总理奥博特。
7月16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文欢率领的国会代表团。
7月23日 会见索马里总统欧斯曼。
7月26日 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奈温。
8月3日 会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
8月5日 会见印尼共主席艾地。
8月8日 会见几内亚教育部长塞杜率领的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
8月22日 会见农业部长穆登达为团长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
8月25日 会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苏米亚洛。
8月26日 会见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
8月27日 会见国务部长比塔特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8月28日 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比斯塔。
9月3日 会见墨西哥哈拉将军。
9月5日 会见邮电部长迪奥普为团长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和几内亚民主党政治局委员、卫生与社会事务部副部长马拉·洛福夫人。
9月17日 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和日共中委、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
9月28日 会见内务部长哈兹比乌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和科技代表团。
9月29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9月30日 会见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鲁尔·萨勒及其率领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
10月6日 会见泰国前摄政王比里·帕依莱。
10月19日 会见阿联副总统萨布里的夫人。
10月20日 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11月24日 会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祝贺其80寿辰。

1966年

3月28日至29日 会见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共代表团。
5月10日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6月10日 在杭州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
7月11日 在杭州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
7月31日 会见出席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科学家代表团和科学家。
8月13日 会见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贾巴尔·汗及其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8月21日 会见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期间，两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8月25日 会见尤素福·希米德为首的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
8月26日 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8月31日 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书记格鲁巴。

9月3日 会见刚果（布）国民议会议长穆亚比·安德烈和夫人及其议会代表团。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

10月25日 会见巴基斯坦外长皮尔扎达。

1967年2月4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2月15日 会见以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为首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合作协定。

3月12日 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5月16日 会见以米歇尔·宾迪为首的刚果（布）保安代表团。

6月9日 会见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世界各国作家和朋友。

6月24日 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9月30日、10月12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10月3日 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及其率领的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同时会见了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青年组织代表团。

同日 会见以新闻和广播部长夏哈布丁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10月5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黎清毅，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及由他们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10月7日 会见正在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卢森堡朋友。

10月23日 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同日会见以藤川夏子为团长的日本齿轮座剧团。

11月27日 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

12月18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委、不管部长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

12月22日 会见阮春龙率领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

1968年4月16日 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5月24日 会见几内亚外长贝阿沃吉和马里外长乌斯曼率领的几内亚马里联合访华友好代表团。期间，中几马三国签订了关于修建几内亚——马里铁路协定。

5月28日 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

6月21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8月3日 会见以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

8月5日 会见巴基斯坦外长侯赛因和夫人。

8月13日 会见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和政治局委员迪诺·迪尼组成的意共（马列）代表团。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以总统顾问哈桑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10月5日 会见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11月10日 会见以陆军司令叶海亚·汗上将为为首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

11月28日 会见澳共（马列）主席希尔。

1969年

2月28日 会见由贸易、运输和邮电部长恩法马拉为首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

10月1日 会见参加我国庆20周年庆典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委员长崔庸健。

1970年

5月1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是在出国访问时国内发生政变后，3月中旬应邀到达我国的。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民族团结政府，支持国内的武装斗争。直至国内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于1975年9月回国。

5月11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

5月20日 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并出席21日举行的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盛大集会。

6月11日 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

6月19日 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南希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6月24日 会见以财政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为首的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

6月27日 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朴成哲及其率领的朝鲜代表团。

7月7日 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

7月11日 会见以财政部长贾马勒为首的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以发展与财务部长穆登达为首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期间签订了中坦赞三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有关议定书。

7月13日 会见以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安德烈·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代表团。

7月20日 会见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及其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

7月29日 在上海分别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扬·约尼查上将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及由他们率领的军事代表团。

8月11日 在上海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及其率领的南也门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协定并发表联合公报。

8月12日 在上海会见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迈

里及其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和科技合作协定。

9月23日 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阮昆。

9月25日 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中将及随行人员。

9月28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国家计委主席凯莱齐及其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分别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缅甸共产党副主席德钦巴登。

10月8日、10日 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内阁首相金日成。

10月14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

11月13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2月18日 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并进行了长时间谈话，提出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1971年

6月3日 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8月7日 会见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和夫人。

10月8日 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

11月22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1972年2月1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和夫人。

2月21日 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周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6月28日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期间，两国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关于建设棉纺织印染厂的协定。

7月10日 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

8月22日 会见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

9月27日 会见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31日 会见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

11月17日 会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和夫人。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2月29日 会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

1973年

1月13日 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

2月1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和阮维桢。

2月17日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22日发表的公报宣布：经商定，每一方将在不久的将来在对方的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

3月26日 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4月20日 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期间，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6月5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副总理黎清毅。周总理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就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等问题举行会谈。两国签订了1974年中国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6月22日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7月17日 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7月29日 会见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少校。期间，双方签订了向中国向刚果提供一项贷款的协定。

9月12日 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

9月23日 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10月13日 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期间，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11月2日 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

11月7日 会见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博士。

11月12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11月19日 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外交部长阮氏萍等。

12月9日 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

1974年

1月5日 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 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4月18日，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的大会发言中，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2月25日 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

3月25日 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4月2日 会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团长乔森潘副首相、副团长英萨利。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参加会见。

5月7日 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和夫人。

5月11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

5月18日 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

5月25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

5月29日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期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马建交。

5月30日 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和夫人。

9月4日 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将军和夫人。

9月10日 会见尼日利亚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将军和夫人。

9月19日 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和夫人。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9月27日 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10月5日 会见加蓬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

10月20日 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

11月6日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

11月12日 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2月27日 在长沙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和夫人。

1975年

1月9日 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

1月16日 在长沙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约·施特劳斯。

4月18日 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4月20日 会见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和夫人。

6月7日 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等。9日，周总理和马科斯总统签署联合公报，宣布从即日起中菲建立外交关系。

6月12日 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和夫人。

7月1日 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同日，周总理同克立总理签署两国建交公报，宣布从即日起中泰建立外交关系。

7月6日 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

7月21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8月27日 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宾努首相、乔森潘等。

9月21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9月24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10月8日 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和夫人。

10月19日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夫人玛丽亚姆·特拉奥雷。

10月21日 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10月30日 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和夫人。

11月13日 会见缅甸联邦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奈温。

12月2日 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和夫人。

12月23日 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圣普解放运动总书记达科斯塔和夫人。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

12月31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及其丈夫戴维。

1976年

2月23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
3月17日 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期间，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4月20日 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和夫人。
4月30日 会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和夫人。
5月12日 会见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和夫人等。
5月27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30日，在布托总理离开大陆去香港之时，中国政府对外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

（左军 文勇）

注： 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毛主席都要会见大量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来宾和国际友人及外国驻华使节，除身份特殊者外，一般未收入年表。

一般外国党政主要领导人来访。除会（接）见外，毛主席有时还参加迎送，主持欢迎（送）宴会及出席一些重要协定的签字仪式，对迎送、宴请、出席签字仪式等礼仪性活动，基本未收录。

建国初期，毛主席每年要会见许多外国使节（如首任，新任驻华大使等），并参加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一些重要活动。这些活动基本未收录。

